

◎社 論◎

台灣勞工必須 組織自己的政黨！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這幾個特點：

一、美帝國主義為了防衛做為亞太反共軍事基地的台灣，穩定台灣的農村、社會和政局，一方面以軍事協助、軍事援助鞏固台灣的防衛武力，一方面以巨額援助，完成土地改革和各種經濟、財政、公共設施的改革，為台灣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準備條件，並扶助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在五〇年美援和國府財經官僚的指導和協助下，也在六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巨大景氣條件下，台灣被編入美、日經濟圈，達成附庸發展。

三、土地改革，使台灣三百多年來傳統的農業地主階級，做為一個社會階級，完全消滅。

四、部份地主階級，在美國—國府的指導和輔助下，轉化為現代產業資本家階級。

五、肥料換穀、田賦體制和低米價政策，不但使國府成為由無數獨立零細小農的台灣農村社會直接的收奪者，藉以維持龐大的軍、公糧食供應和支付巨大的黨軍政開支，並且實際上從低米價長期維持低工資，使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迅速達成農業的資本積累，擴大其生產與再生產。

六、農村土地零細化和台灣農業的快迅資本主義化之間的矛盾，加上工業和國家機器對農業的收奪，使無數的農業人口流向城市，和台灣資本主義工業化相應地形成龐大的產業工資勞動者階級。

七、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戰後國家分裂、世界冷戰結構、反共國家安全體制分不開。正是在這「冷戰—安全」體制下，美國和國府合作強力壓抑工人階級的團結權、爭議權、及交涉權，使工會虛構化和弱體化，從而使台灣內部國營企業、民間企業和外資企業得以對台灣工人階級遂行肆無忌憚的榨取和壓迫，擴大其超額剩餘利潤。

八、因此，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所謂「經濟奇跡」。是「（國府）國家機器—外來資本—民間企業」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吞吐系統下，經由對台灣的自然、生態、勞動者進行最無忌憚、最不知限制的剝削完成的。

三十多年來，台灣的產業結構，以一九六九年前後為轉折點，從農業部門為主導轉成工業部門為主導，台灣就業人口中有六三%為低層勞動者。台灣工人階級，為台灣的經濟繁榮，付出了這些重大代價：

一、長期僅僅足以維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無成就」、「無前途」、「貧困」、「自卑」、「社會地位卑微」意識，和急速經濟成長社會中「成功」、「立業」、「幸福」、「富裕」、「舒適」標準，形成強烈的對比。

三長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權沒有保障、勞動者缺少社會和生活保障、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觀念和支出的結構下。

四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識和文化上無法進步，並任消費社會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賭博、酗酒……長期摧殘。

近來，王義雄立法委員積極籌組工黨，正是要為在臺灣「國家分裂—安全—依賴」體制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人數最多，犧牲最大的台灣工人階級爭取參與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權利。

在當前台灣的具體條件下，這個將生的工黨，應該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而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中心理念，認真地遵循並發展台灣的議會民主政治。我們希望工黨能發揮如下的作用：(一)爭取台灣工人階級最基本的團結、爭議和交涉權；(二)要求長期被剝奪和壓抑的權益之最低限度、最合理的部份之復權；(三)要求切實實現當前對工人階級而言還不完備的「勞基法」所規定的一切工人合法的權益；(四)要求實現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一切廣泛社會底層人民的民主權利；(五)要求停止長期以來在「安全」藉口下對工人勞動時間、工資、安全和福利的無理壓抑。工黨甚至應該歡迎國民黨和民進黨認真實踐它們對工人階級所做的各項承諾，並願意為實踐它們的承諾而和它們真誠合作。

台灣的工人階級，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沈默地、超額地為一個「依賴—專制—富裕」的社會做出最大的犧牲。

今天，台灣的工人階級不能再繼續做這種不合理、不被賞識和感謝的犧牲。台灣的工人階級應該團結起來，堅強有力地要求他在台灣社會中遠比應得的還要少一些的權利和利益。

我們期待台灣一切先進分子參與或支持工黨。長期以來，主張維護台灣少數民族的權益、為反對環境破壞、為婦女真正的解放、為核能安全和為世界的非核安全與和平的一切優秀的、先進的人民、知識份子、學生、文化和學術工作者，都應該對新生、將生的台灣勞動者政黨的發展與壯大，做出熱情的回應。我們這樣熱切而誠摯的期待。

海峽

雜誌

The Channel

第四期

樓 亮：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社 論：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

——台灣、南韓、新加坡、香港的比較分析

潘素文譯：威權體制下的勞工

陳玉璽：從國際形勢看台灣問題

談台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陳映真：訪劉進慶教授

李遠哲：談科學與教育

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總編輯 孟慶祥

社務總機	王連中	王仁慶	王義雄	李榮武
文書課	林孝信	林宗勇	洪紀水	
採訪課	許達久	葉守堅	陳仲良	
編輯室	黃澤南	蘇德珍	等明杰	
印刷課	蔡文輝	黃芸芸		

社長 王拓

發行人 杜幸仁

編輯委員 本社編輯委員

主編 林新莊

執行編輯 彭知度

編輯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0巷10樓之1

電話 (02) 2612335 (02) 7652635

發行所 台北市士林區德安路199巷5弄7號4樓 111

郵政掛號 1191157 國民郵局誌

本報訂閱費

長期訂閱 本報 全年新台幣960元，半年450元

外埠 郵費在內 全年美金55元

亞太地區美金51元

北美地區美金47元

海外郵費訂閱者 China Tide Association

P. O. Box 1724, New City,

N. Y. 11063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Tide Association

郵政掛號新聞登記證局成空裝字第伍捌伍伍號

承印：龍祥印刷廠 台北市桂林路224巷26號

台北市	聯宏書報社	02-5620282
基隆	宏府書報社	032-316843
內湖	聯華圖書供應局	03-4553456
中壢	志昇書店	03-4251897
新竹	文強堂	035-253101
苗栗	美華書局	037-320210
台中	全元書報社	04-2700617
嘉義	聯聯圖書供應社	05-2354993
台南	永茂書報社	06-2642655
高雄	麗志書報社	07-3849410
屏東	環球書局	08-7323071
宜蘭	民生書店	039-323765
花蓮	花蓮文具店	038-322941
台東	徐氏圖書文具行	089-322267

目錄

海峽〈76年9月號〉

《社論》

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

《特稿》

李遠哲談科學教育

●本社整理

Correction

Page 4

《專訪》

台灣經濟發展的 虛相與實相

—訪劉進慶教授

●訪問：陳映真

●整理：本社

《海峽論壇》 **從國際形勢看台灣問題** ●陳玉璽 25
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樓亮 32

《南韓專輯》 **民主與統一：分裂國家的歷史課題**
—以韓完相、李效再為代表的韓國社會學 ●高崎崇司 / 平民譯 35
核武陰影籠罩下的南韓 ●鄭慶模 / 張君玫譯 45
工運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 ●金文樹 / 張君玫譯 48
—南韓工運領袖的泣血呼籲

《世界體系》 **威權體制下的勞工** ●F. Deyo / 潘素文譯述 52
—台灣、南韓、新加坡、香港的比較分析

《工人廣場》 **罷工有理，先聲奪人！** ●汪立峽 64
—從基隆港理貨工會罷工事件論「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
反對凍結計程車牌照！ ●林賢仁 69

《世界之窗》 美國會實行軍事戒嚴嗎？ ●江海晏 71

《環保運動》 爲了鄉土，只好自救！ ●蕭艾 74
—後勁居民抗議中油污染事件

《香江話題》 香港宜把握台灣開放會親的契機 ●韋名 78

《人物》 張深切與台灣新劇運動 ●鍾喬 80

《歷史》 殖民地的語言傷痕 ●尾崎秀樹 / 洪彰生譯 91

《世界思潮》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Anthony Brewer / 陳宗文譯 98
—導論(下)

《文藝》 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下) ●高準 105

《讀者來函》 核三廠排水管含致命毒物。
熱烈希望中國統一。
期待《海峽》再接再厲 110

讓海峽成爲你和朋友們 共同的精神食糧

透過海峽，你們的友情更踏實翱翔的天地更遼闊

優待本刊長期訂戶：

● 每本訂價90元，全年十二期特價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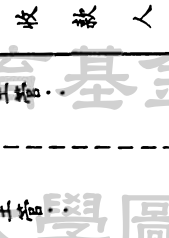
掛號每年另加120元

● 國外一律航空郵寄：

歐美地區 \$U.S. 55元

亞太地區 \$U.S. 51元

港澳地區 \$U.S. 47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1134151-2號	心 局 郵 幣
盧 思 岳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 名	住 址	姓 名	住 址
寄 款 人	寄 款 人	寄 款 人	寄 款 人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手續費	元
次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繳付交換票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元
次	元

主 管： 經 辦 員：

主 管： 經 辦 員：

朋友！你關心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嗎？

請閱讀最具前瞻性、進步性、思想性、批判性的

海峽雜誌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為親友訂閱

《海峽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 新訂戶 續訂戶 電報掛號
 從 年 月起訂閱海峽雜誌，至 年 月止。
 訂閱(購)人(請用正楷填寫) 先生/小姐 電話：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郵區：□□□□□□
 郵寄方式： 平寄 掛號(每年加120元)
 年 齡： 25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職 業： 公教 工商 金融 服務業 製造業
 建築業 自由業及專業 學生 其他
 教育程度： 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此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與郵局另覓。

通 信 欄

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文·鍾喬 圖·蔡明德

他們將冥紙灑向天空
 好似宣告一個夢魘的結束
 這裡是河水的源頭
 據說，整個偌大的風城
 數百萬的市民、學生
 白天吃飯，晚上喝茶
 都靠一瓢清淨的水維生
 如果，消息傳遍大街小巷
 市井的老少都會驚覺
 工廠的廢水污染河川
 也會像他們一樣滿臉憤懣
 或許，不只運來一卡車的冥紙

他們堆起如山的石頭
 將廠房門口牢牢堵住
 這裡是魚米的故鄉
 從初夏到深冬
 每一寸水田，深深地
 都烙下粗厚的足印

世居的叔伯紮下生活的根
 流落都會的遊子
 也選擇清明時回家
 一旦莫名的怪病時而出現
 就像稻穗在一夕之間枯死
 除了秉燭抗議，還能怎樣？

他們在路旁搭起蓬帳
 任風雨飄打過村莊
 他們從遠處運回飲水
 只希望腳上不長膿瘡
 明天，上學的孩子
 能在教室裡安心上課
 窗外不飄進濃濁的臭氣
 至於，向公權力挑戰
 或者所謂「自力救濟」
 收割時繼續早出晚歸
 老人還是默默吸煙，在風簷下
 爭論那年早荒誰損失多？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灰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劃撥 8 折



台北，台北！ 王拓 / 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練，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鬭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劃撥 8 折



金水孀 王拓 / 著

金水孀代表著漁村中張張飽受風霜的臉龐，佈滿了海水浸蝕的痕跡，映射著窮苦歲月的摧殘，給人深刻而強烈的震撼力。王拓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寫照，充滿了對貧困人家的解析，所有豔蝕他們的愚昧、迷信、賭博、疾病和絕望，以及他們強韌的生命毅力。這本書中沒有少年的夢囈、沒有娘娘腔、更沒有自憐的感傷，充份表現了人性在現實中的掙扎與奮鬥，冷靜、客觀地揭開人類底真面目。

「金水孀」早被評論家譽為台灣鄉土文學中最傑出、感人的作品，已由新銳導演林清介拍成電影。

定價 150元

郵政劃撥 0784418~8王拓

◎特 稿◎

李遠哲談 科學與教育

■ 本刊整理

今年4月18日，本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以科學與教育為主題，對留學生團體「箴言社」發表演講。演講中敘述了他個人的求學經驗，對教授治校、科學發展與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等問題多所闡發，關切國家、青年與世界和平之情，溢乎言辭，從中可看出來李先生在科學研究之餘，對促進國家、社會進步的強烈責任感。本刊特據演講錄音，整理成文，以饗讀者。——編者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去年十二月底從斯德哥爾摩返回柏克萊途中，我跟我太太吳錦麗女士在台灣停留了十天左右。在那十天，我講了很多話。平常，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講話的人，但是，很多人一直要問問題，我就說了，報紙上所刊載的並不全是我說的話，有些是記者舉一反三，有些是斷章取義，所以報紙上說的很多事情，不能完全相信。

鼓勵年輕人、尊重年輕人

在台灣的這十天，我跟大學生、中學生有幾次座談。在座談會裡，我還是盡力鼓勵年輕人，希望年輕人要有理想，希望他們不要全盤接受學校、社會給他們的一切，應該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事情，尤其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講了很多，年輕學生有些是能夠接受，有些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當然，我還是希望老師或社會一般大眾要尊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想法，我覺得我們的將來還是要寄託在年輕人

• 李遠哲博士



海峽(76年9月號)

身上，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夠接受年輕人對老一輩所犯的錯誤提出批判，那個社會是不會有很大進步的。

在台灣時，學生問我「李教授唸書時是否曾經翹課？」我聽不懂「翹課」是什麼意思，研究了半天才知道這是個新詞，原來是逃課的美化語，這說辭比逃課好聽多了。我答道：「是的，我逃過課，不過逃課並非跑去玩。」然而報上還是登載「李遠哲鼓勵學生翹課」，這是不正確的。

我一進台大唸書就問學長和老師：「怎樣才能夠做一個很好的化學家？」他們給我很多指示，譬如說化學系裏面的物理課程太少了，像熱力學的教育就不太好，尤其是大二、大三時，也應該唸一些像量子力學這種比較新的學科，所以我在台大時，晚上曾經跟幾位物理系的學長組織討論會，輪流講述一套原子物理的書。我要說明的是，大學時代是逃了不少課，不過逃課主要是因為老師講授太慢，不理想之故。有時候在圖書館讀一本物理化學的書，一下午就可看兩章，但是老師一堂課才上了半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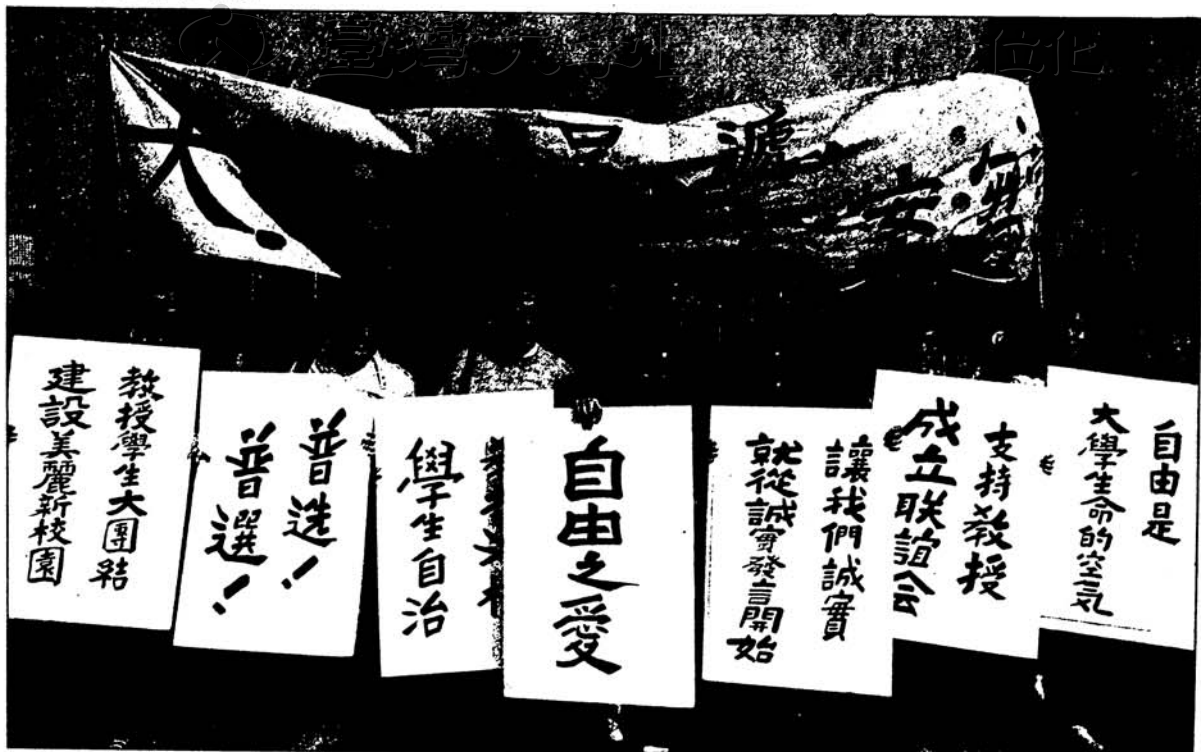
。我就覺得自己唸書快得多，所以也說沒去上課。

那個時候，我每天唸的書不少，其中有很多是關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學的書。記得三民主義第二學期的課，我一堂課都沒去上，期中考和大考都考了99分，考試時寫得長篇大論，所寫有關社會上的東西並不是老師說的，老師稱讚我「是真正懂得三民主義真諦的人」。老實說，這也不是憑空構想出來的。我在中學與剛進台大時，唸了很多這方面的書，譬如有一本德國人Wittvögel寫的「孫逸仙與中國的革命」，讀後確是很有心得。這種書我唸得很多。另外有關中國歷史的或社會方面的書，也涉獵了不少。

兩個星期前，我到台灣還是把事情澄清了一下，說我並不是鼓勵學生翹課，只是提醒大家，有時候學生不上課，並不能完全責怪學生。

要辦好大學教授應負更大的責任

● 台大學生要求自治



還有一件事在我離開台灣之後，引起熱烈的討論與反響，就是有關「教授治校」的事情。我回到台灣，覺得台灣很多大學辦得還是不太理想。要把一所大學辦好，除了校長之外，教授、學生都要同心協力，大家好好努力、好好做。以十二月底我所見到的台大「大新社事件」來說，很多學生在校園裡面抗議示威，發傳單及地下刊物，表達他們的理想，我有很多感觸。每次看到學生抗議或是做些學生運動，我就覺得學生犧牲太大。因為在台灣，一旦被學校開除，就沒有學校唸了。那時遇到很多教授，我對他們說：「你們這樣子是不對的，學生對學校有所不滿，教授應該要挑起來，出面解決才對，但你們並沒有這樣做，總是讓學生自己向學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我覺得，在台灣，大學生並不被社會當做一個完整的個體或獨立的個人。見到年輕人就說，他還沒有長大、還不懂事，還只是半個人而已。很多教授聽我這麼講，還跟我修正說：學生只是三分之一個人，我們當教授的才是半個人。

我在台灣的演講裏說，要把大學辦好，教授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包括學校的行政工作，尤其是訓育方面。現在學校裡頭，訓育工作是由教官負責，很多學生看不起教官，常說我們是考四百分的為什麼要讓考兩百分的來管？像這樣，教官的訓育工作怎麼做得下去？

教授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有人說，台灣的大學教授還不那麼成熟，現在還不能實行教授治校，有些校長認為台灣很多大學已經辦到了教授治校，像台大就有教授委員會對校政提供意見。但是，老實說，真正的比起理想還是相差很遠。當然有些學校做得比較好，比如教授的聘請就經過教授們仔細的討論。

台大孫校長說過，他一個人辦學校，下面只有教務長、訓導長，沒有足夠的人幫忙。孫校長是有苦衷，有些事情他想做，但是礙於種種的條例使他都沒辦法做。兩星期前台大的學生跑到立法院去請願，希望能修改大學法。學

生說和校長講沒有用，只好去立法院。對這件事，我覺得難過，我還是希望台灣的年輕學子能有接受教育的好環境，不要為這些事情花那麼大的心神。但是好像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改善，很多學生覺得如果他們現在不努力的話，將來更年輕的學弟、學妹們就無法接受很好的教育。你們應該也知道台灣最近變得比較快，很多不同的力量在衝擊著，所以學校裡的這些事情，我倒不覺得驚訝。今天在座許多從台灣來的同學對台灣事情非常關心，我非常希望未來有理想的年輕人回去努力。這種事情不是一天、兩天可以達成的，要經過長久的努力。

應加強對科學的投資

換個話題，談談科學方面的工作。最近我常回台灣，除了暑期開班講課外，就是協助設立中央研究院的原子分子科學研究所。當時參與籌劃的人很多，如吳健雄、袁家驊，及已去世的浦大邦教授等人，都覺得多年來台灣的科學發展，好像走得比較慢，大家常常講的科學生根，也沒有落實。

近年來在海外得到物理、化學學位回到台灣工作的人已不下一、二百人了。但是由於沒有好的研究環境，不到三、五年就落伍了。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們希望台灣能夠有個比較像樣的研究所，使海外回國及本土的研究者有很好的研究環境。因此，我們努力在台灣籌辦一個原子分子科學研究所，希望在物理跟化學這個領域裏面，選一、兩個發展比較快的，譬如說雷射、核磁共振方面的研究工作。這個研究所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成立的性質與原分所一樣。我們幾個參與籌辦的人都覺得台灣對科學的投資在1958、1959年這一陣子是不錯的，像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買了一個原子爐，也買了直線加速器，但是此後對科學的投資並不很多，尤其是科學的投資和台灣近期的經濟發展更是不成比例。如果有一個比較具規模而且基礎和應用科學都能夠使用的研究所就好了。因此



● 台灣對科學的投資仍有待加強

我們就有籌辦同步輻射研究所之議。同步輻射中心籌備之初，國科會組織了一個由台大、清大學校的教授組成的可行性研究小組，進行了一兩年相當週密的研究，最後認為台灣有條件建立一個很好的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但這個從提案到決定建造的步驟，在台灣還不是很理想。要政府同意投資建造，須經過十分複雜的說服工作。

這點跟美國還是有點不一樣的，就是人際關係扮演相當重要的成份。

製造良好的科學研究環境

問：剛才提到設置同步輻射研究所，等科學研究計劃，必需由海外的知名學者見最高當局，最高當局同意後政府才肯出錢。但是現在台灣又常常講應該讓科學生根、落實，在這種狀況下應如何做，才能生根、落實？

答：這確實是很不好的現象，事實上在台灣從事科學研究、教育的人很多，他們對高等教育的問題很清楚，根本用不到國外的專家回台灣來說。最近常有人建議我說：「李教授你現在有名了，應回國多多倡議。」這是我所反對的，我想政策的決定應該多問實際負責工作的人，而不是聽海外的意見。台灣、大陸都有同樣的毛病，這是最不好的，如果我要努力的話該是力求改善這種狀況。我回台灣講了很多話，有人

說一點都不新鮮。當然不新鮮，因為這些話在台灣工作的人早知道了，有人不敢說，我就說了。

問：台灣的科學與教育和教授的水準有很大的關係，但有些大學的教授水準並不很高。有些人剛回去的時候，水準還不錯，可是三、五年後可能就跟不上了。請問該如何提高大學教授的水準及研究風氣？

答：這個問題很重要。台灣的有些教授師資不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譬如文化大學，校外來兼課的人很多。

由於國內沒有良好的研究環境，歸國學者沒有進修的機會，常常過幾年就退化了。很多人因為沒有做研究工作，對學問的熱誠也沒有了，教書的時候滿腹牢騷，也沒有什麼熱誠，這確實很不好。

台灣有那麼多的大學，若要將個個大學的設備都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畢竟是不可能的。設立原子分子所的目的正在此。至少讓台灣有一、兩個研究所有一流的設備。

當然有一流的設備還是不夠的，還須負起討論的風氣，例如暑期講學、暑期討論、人才交流、國際交流等工作，另外，常請國外的專家回到本國做些教育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現在經濟比較好，送教授出國再進修應該不會是很大的負擔。例如，原分所聘請某人的話，過一兩年還是要送他到好的研究所進修。我想，每個學術領域都應該多做國內同仁的相互討論，增加到國外參加學術討論的機會，經常邀請外國專家到台灣講學，並且改善研究的條件，這都是很重要的。

此外，社會價值觀念，也很重要。近年來在台灣唸工程的人比較多，而做基礎科學研究的人相對減少，當然這是受了家長或社會上的觀念的影響，認為基礎科學或從事文化工作，都沒多大用，這樣的社會價值也應該改正才是。

問：據瞭解，美國的一般科學與工程科學受美國的工業界影響極大，尤其是工業界在經濟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國內是否有這種趨勢？

答：這種情形，台灣和美國是不一樣的。美國因為國家大，產業力量又雄厚，因此如IBM實驗室、貝爾實驗室的投資相當多，但這個數目和他們的營業額相比的話還是很小的。而台灣的私營大企業不多，比較大的如中油、台電都是國營，但從國際上來看，還夠不上是大企業。所以台灣的科學研究即使和工業界有關係，也不可能獲得太多的金錢支助。

你剛才提到美國的科學研究和工業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工學院是正確的，但是在理學院的物理、化學、數學系倒未必有這種密切的關係。譬如工業界對我們所從事的化學研究工作的投資極少，反倒是對我們的畢業生很感興趣，常來挖角。因為他們瞭解科學技術是跟著基礎科學轉移的，物理系和化學系的訓練是從最根本的問題上來探討科學，在這樣的訓練下，他們要注意到最微小、最精密的東西。因此畢業後到貝爾實驗室或IBM做事，他們才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這樣說，並非指學工程的沒有用。不過我還是認為受過最根本的基礎科學訓練的人，才真正能解決問題。

教授負責，學生就可安心求學

問：如果我們給柏克萊打九十分，請問台大或清大應給幾分？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教授治校」，在座的學生雖就讀於這所以教授治校聞名的學校，但並不明瞭到底教授該如何做，如果返國後任教，該如何負起教授治校的工作？

答：這就得看是那系及那一方面而論。若就校園中的學生生活而論，清大的宿舍就在教室附近，上課方便，這方面就比柏克萊

高明多了！若是講學術風氣跟老師們的討論，那就差很多。我在台灣唸書時，常有這種困難，有些問題無法解答，問學長、老師、教授都不會，問題追究到某個階段，就無法再問下去。但是一九六二年到這來唸書後，碰到實驗上或理論上不懂的問題，問教授，他若不知道就說你找某某教授他一定知道，或說你到山上勞倫斯實驗室找某工程師他大概知道。

至於教授治校，我自己是有經驗的。一九六八年我到芝加哥大學任教，這兩年的美國學生運動非常激烈，芝大的辦公大樓就被佔領了兩個禮拜。芝大的處理方法和他校不同，所有的辦公人員全部撤離，並告訴學生你們要佔領多久都可！兩星期後學生就自動搬走了！

那一陣子學生要求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的意願很高，他們要求參與教授會議、各種委員會會議，及系裡的課程委員會。當時我懷疑學生參加這些委員會有用嗎？我總覺得學生過了四、五年就要離開學校了，在這期間應該好好唸書、做研究工作。但我當時是化學系「課程委員會」主任，我跟系主任說，如果學生對課程的設計感興趣的話，應該讓他們參加「課程委員會」，系主任也同意了。所以，化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各派兩個代表來參加我們的課程委員會討論學生應修那些課程？怎樣考試？如何安排？這些工作相當繁重，譬如，為了決定碩士課程，我們就先調查美國各大學的化學碩士課程如何安排？畢業後的工作情形如何？除此之外，有機化學課程的內容似乎已成定型，我們也討論這些課程是不是合乎一些現代化學進步的需求？這些學生頭兩個禮拜還很認真，四、五個禮拜後，他們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請辭這份工作，並表示他們知道這個委員會爲了學生花了很多心血，真正關心學生的教育，學生也不應該花費那麼多時間去擔心行政工作，畢竟學生還是要好好認真讀書的，

他們很高興看到教授們這麼認真在為學生做事。我相信，在大學裏，如果教授關心學生的教育，真的挑起自己的責任，學生也就不必花那麼多時間擔心實際的行政工作，學生若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只要告訴教授、或委員會，再反應到系上，就可以馬上更正了；而台灣有些不好的現象是因為很多行政命令是從上面一直傳下來，下面的人照辦而已，不是真正為了學生，為教育著想。這是不理想的。

「教授治校」的真諦

問：教授治校有沒有缺點？台灣目前是否有這個客觀條件去實行？

答：上次講到的教授治校因為報紙登的有些亂七八糟，引起很多的誤會，以為教授治校就是教授跟校長對立，教授決定一切，校長只是花瓶上的花供人欣賞而已，這不是我的意見。我是說，教授在大學裏，從事實際的教學工作，是學校的主要構成部份，真想要辦好大學的話，就得尊重教授的意見。

兩個星期前，我回台灣開會，快到台北時，我想一定會有人問教授治校的事，為了避免談話再被記者斷章取義，飛機登陸前兩小時，我寫了一篇教授治校的短文。其中提到，如果我是理學院長的話，為了辦好理學院，我希望能遴選各系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來擔任系主任。但是指派這些志同道合的系主任，並不合民主教授治校的目的。如果從化學系的教授立場來看，化學系教授對如何辦好化學系也有很多理念。但他們所推舉的志同道合的人選，未必就是理學院長中意的人選。要如何協調這種矛盾呢？為了辦好學校，院長跟教授們都應該合作。如果系上要選一個系主任，比較理想的方法是系裡面先提兩三位候選人，再讓院長從這當中來選，使得雙方都認為系主任是由我們選出來的。大家都

一團和氣。院長、校長的選舉也可以比照辦理。

我不贊我從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即由部長指派校長，再由校長聘院長，院長聘系主任，這樣，如有一個在上位者所任非人的話，下級也會有問題。由教授推選系主任、院長，甚至校長，也許可以弄得比較好，但也不是完美的辦法。譬如：教授如果選出一個教育部長或所有教育部辦事人員都不喜歡的人當校長，他不容易跟教育部溝通，教育部不給經費，學校也不會辦得好；學校在社會上有它的責任，還須跟社會溝通，但教授選出來的校長並不見得就有辦法跟社會、政府溝通，所以有些地方還是要調整。

我所說的教授治校的另一個重點是：學校要聘請教授應該讓教授們來做評審的工作，而不是由系主任、院長片面決定。在台灣，有些學校聘用教授是經過教授委員會的同意，但是很多學校却是由系主任、院長、校長決定請誰，聘書就發下來。台大化學系以前也有這種現象，有一年我回國碰到一位系上的資深教授，他在我心目中是系裏最好的教授，問起系上的事，他講得很傷心，老淚縱橫的說道，「早上看了報紙恭祝某人回台大當教授，才知道系裡面又多了一位教授。我在系裡任教多年，難道系主任連聘一個教授都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不過，現在的情形改善了不少了。

我認為行政工作、教育工作，並非全靠校長、系主任來決定，而是應由全體教授挑負起重任。當然最理想的是，包括校長在內都應該由校內的教授提名，提有名望的人擔任。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校內的教授，也可請社會公正人士參加。總之，接受多數教授的意見總是好事情。

問：可否再談教授治校的問題，台灣的教授在缺乏研究風氣的環境下，對本身相關的研究都不太願意做更深入的研究，一套講義

用了十幾年，他會關心學校、關心教育嗎？此外，自古文人相輕，無論主、客觀條件，教授治校這個理念好像很難去推展。

答：教授治校應如何推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在行政上要改革，像教授的聘請與校內行政工作應該讓教授參與；另一方面是教授本身的素質要改善。如果在座對教育有大抱負的年輕人，回到台灣後好好努力，這是最重要的原動力。我對年輕人一直寄予厚望，也有很大的信心，如何使教授治校落實，這就是你們該回去努力的。

問：如果您有機會見到總統先生，是否能像推動同步幅射一樣，介紹「教授治校」的觀念，給總統先生一個深刻的印象？

答：同步幅射是因為我們成立了可行性研究小組，經過兩年的研究，很多科學家認為台灣有能力做，總統才點頭同意的。如果台灣各大學的教授經過多次討論，都覺得應該實行教授治校，且時機成熟的話，大概不要總統點頭也可以實行了。我想，現在這個階段，比較重要的是，教授們應該討論，每個教授怎麼樣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把一個大學辦好。前幾年，台大虞兆中校長，就用了不少年輕教授參予校務工作。從前台大的校園沒有全盤的規劃，虞校長時代就組織了一個校園規劃委員會，委請茅聲濤教授負責，設了很多條例來規劃學校建築與環境。像這類工作並非校長一個人可以做的，而一些年輕的教授貢獻了很大的力量。可見得只要大家努力的話，教授治校是可以行得通的。

問：我非常贊同教授治校這個主張，可是「教授治校」這個名詞是不是太強硬，所以讓真正在治校的那些人感到恐慌。讓他們覺得「教授治校」是要代替高階層人士，所以是不是可以改成教授參與治校？

答：你這樣講是很好的，我剛才講過很多人誤解「教授治校」這四個字，以為教授治校就是把校長趕走。當然學生要自己管理自

己，這是沒問題的。學生的很多意見教授應該要採納，但是學生跟教授在學校行政方面份量還是很不一樣的，我還是希望學生不必擔心學校的行政工作，只要他們可以把意見提上去就好了。

聯考如新科舉

問：您對台灣的聯考制度有什麼看法？

答：台灣的聯考制度並不很理想，但我也提不出更好的辦法。聯考制度對台灣的教育有很大的影響，台灣的教育唯一的目標就是升學。我們的教育不是教導一個人長大成人，而是教育一個能考上大學的人，但是考上大學的人就是真正有才能的人嗎？不是的。這樣的教育方式，非常不好，我覺得台灣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聯考。為什麼在台灣考不上大學就像是前途茫茫沒有希望？這反映了人和制度的關係。譬如說，我們做科學研究的人都覺得，最大的問題往往是學校裏很多技術人員留不住，為什麼無法留住？因為行政院的人事聘任書上規定什麼學歷，拿多少錢。無論他的能力表現再好，學歷不夠就不能多領薪水，也不能被社會所認可。那他當然跑到私人機構了。

可見得台灣還存有科舉時代的觀念，這個新科舉就是學校的文憑！因此考不上大學，好像前途就非常悲慘，所以大家就拚命的考，拚命的補習，補到最後好像天下事和大家都沒有關係，只要會考試就可以了。問題並非聯考本身，而是整個社會的觀念問題，是人在社會的價值觀念要改變的問題。

問：很多家長認為台灣教育不好，因此送小孩子到美國唸書，或者移民來求學，這個趨勢要如何改善？

答：送兒女到美國唸書，確實是很普遍的現象也是很不幸的，希望大家努力改善。我記

得從台北回來的時候，飛機機長的女兒也在柏克萊讀書，她中學沒畢業就到美國來了。因為她中學時候批評老師，學校方面不能容忍，於是無法繼續留在學校讀書，只好離開台灣來美求學。很多人因為沒有受到尊重，看到不對的事情也不能講，講了就受很大的壓制，這很不好。不過只要大家努力的話，還是可以改善這種現象。

我唸中學時的新竹中學比現在好，當時我在新竹中學受的教育比我的孩子在美國所接受的教育要高明多了。

科學家有責任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問：請問您對科學家的社會良心與社會責任的看法。例如剛才提到貝爾、IBM 這些大企業投資科學研究費，其實是為他們自己賺更多的錢。科學研究經費另一方面源自國防經費，如「星戰計劃（star war）」，這與雷根的軍事擴張計劃有關係。美國如此，蘇聯也是花很多錢在國防經費上。您曾經提及，非常欽佩居里夫人追求真理，研究科學的精神。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科學家很受制於整個社會的要求和影響，做為一名科學家，您有何感想？

李：我有很深刻的感觸。二次大戰中兩顆原子彈丟在廣島、長崎後，科學家就曾深刻的討論科學家與社會良心及責任的問題。事實上更早以前就有人討論科學家對社會是真獻抑或破壞。例如工業革命以後，很多人就看出工業革命雖給社會帶來進步，但同時也帶來很多災害。大家在思考：科學的進步真的給人類帶來好處？

目前我最擔心的是軍備競賽，我覺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軍備競賽。你們大概也知道今年全世界花在軍備競賽的錢有七千多億美金，這是很可怕的事情。當然軍備競賽後有各種不同的因素在操縱著。從國



●美、蘇兩國從事軍備競賽，有害世界和平，(右)為蘇聯的SA-1地對空飛彈，(左)為美國飛彈

際競爭的觀點來看，美國人覺得蘇聯在威脅，所以爲了安全要花大錢來建立防衛體系，幾年前雷根就主張發展SDI用以淘汰彈道武器或核子武器，聲稱這樣就可避免戰爭。很多美國人贊成雷根的看法，這是從政治的觀點出發。但是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以目前的科學水準可能製造出這種東西嗎？兩年前我和一些科學家在白宮吃飯，雷根就說，你們科學家很了不起、很聰明，沒有什麼是不能解決的。但是做爲科學家我們有義務、責任說出科學家並非萬能的，並不是像雷根說的那麼聰明，有充裕的經費與時間就能發展出很好的防衛體系。當然，軍備競賽除了雷根所說的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有人將軍備競賽看做是兩國的經濟競賽，就是說，如果美國發展SDI，蘇聯也會在軍備上大量投資，看誰先破產。

此外，美國的工業和軍事工業間有密切關係，他們常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以推動自己的利益。因此SDI並非單純的只是在保衛世界和平而已，軍事工業的利益是更重要的因素。

目前台灣來的優秀青年有不少人參與SDI計劃，像最近SDI在從事以氟化氫雷射打飛機的研究工作，他們就頗有貢獻。

做爲一名科學家，若認識到SDI對人類沒有好處，就應該努力使蘇聯和美國裁減軍備。個人所能做到的，就是不參與SDI的工作。每個科學家應該憑著良心有所取捨。爲了SDI的問題，我也受到了壓力。有一天國防部打電話給我，要我鼓吹SDI的重要性。我說：「不！我不能同意你的觀點。」我告訴他，我已經簽名聲明我不參加SDI的工作。他很吃驚的問，「爲什麼？SDI拿那麼多錢給大學做基礎研究工作還不好嗎？」我回答說，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有些學生也會來問我，對SDI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他們希

望我簽字，不參加SDI的工作。雖然我參與了不少有關科學政策的工作，但是，還談不到進一步影響政府的決策，不過，我想，每個人都應該憑著良心去努力。

台灣的企業規模小，無法做研究發展

問：國科會是現在台灣基礎科學的最大推動力量，你認爲是否應該像美國一樣鼓勵工業界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給予「免稅」的優待？國科會目前扮演的角色是否應修正？

答：你所說的用免稅來鼓勵工業界投資基礎科學一事，台灣的大工業都是國營，民營工業還很薄弱，規模不大，和國際財閥相比，私人財力還是很有限的。像台灣就沒有像南韓「現代」公司那樣大規模的財閥。而國科會扮演的角色一直在變，和主其事的人有很大關係。現在的主委是陳履安，他和上層的關係好，他當了主委後向政府要了很多錢，所以目前國科會的經費比從前多。現在台大、清大幾所好大學的設備比以前改善多了，比如說台大、清大都有很好的核磁共振儀、紅外光譜儀。然而，台灣很多研究室中碩士班和博士班的研究生數目不多，加上每個教授的經費比美國少很多。這可看出以一個教授爲單位的研究工作是不易與人競爭的。最近國科會鼓勵教授提共同的研究計劃，撥給多一點經費，他們就有比較好的設備來做研究，我覺得，這是比較正確的。在座各位如有人想回去做生化的研究，且有很好的提案，我相信會獲得國科會的支援。

●美國「軍事產業複合體」

(Military-Industry Complex) 推動星戰計劃



海峽'76年9月號

問：台灣很少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於是大家只好找機會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聽別人的研究成果，這該如何改善？

答：台灣現在有很多外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能常到國外參加學術會議，這是很好的事，該多鼓勵。國科會似乎也該在這方面多花點錢。你說，「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在台灣沒有開過會，為什麼？你大概也知道所謂國際學術會議，應該是真正的國際性與學術性，和政治沒有關係。如果辦「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的話，無論是蘇聯、中國大陸的學者都不可拒絕他們參加，否則會員資格會被撤銷，以後就不能參與會議了。「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每次開會都附帶說明，如果申請簽證有問題的話，他們會幫你解決。但是台灣目前，自限於三通問題，怕大陸學者到台灣來，如果沒有這層顧忌，讓大陸科學家到台灣參加會議，看看台灣發展的情形，以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很多國際上的學術交流，就是怕大陸的科學家到台灣來做統戰的工作，才成了大問題。

台灣應根據本身的條件做重點研究

問：我是學工程的，我們應如何和基礎科學的人配合呢？在台灣有限的資源情況下，應如何在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上來分配呢？

答：我舉個例子，義大利也不是個大國家，但他們在核聚變的投資相當大，這並非意味他們要和美蘇競爭，而是他們認為核聚變在廿一世紀中將會是人類的主要能源。因此覺得有必要做核聚變的投資。

台灣畢竟是比較小，不可能在每一個的科學領域裡追趕世界的最先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所以要提高科學的水準，應視地方條件而定，譬如說台灣的地震很多，搞地球物理的人可以多從事地震研究，因為台灣的條件是屬一屬二的，這就是視台灣的條件而選擇做那些研究。

學理、學工的該如何合作呢？舉個例說，從前台灣生產電視機，製作影像管時玻璃和不銹鋼無論如何焊接，都會漏氣。可是玻璃和不銹鋼的成份和日本的一樣，為什麼接不起來？工學院的工程師無法解決，但是學化學的就知道是因為金屬表面處理的問題。這並不是說理學院較工學院優秀，而是因為他們研究比較基礎的東西，這常常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不過，如果有處理工程上的問題，他們也是不懂的。

問：剛才有位同學提到工業界對基礎科學和學術界的貢獻，我想到各界校友也是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幾年前，北加州的台大校友會曾想捐一筆錢給台大做美化環境的基金，當時的台大校長說，沒有一個很正當的管道可以接受這筆錢，結果只好捐成獎學金。在美國的大學中校友會的力量很龐大，請問李教授，怎樣能使國內學校把門打開，讓校友更有參與感，貢獻些東西給母校？

答：你說的這件事，很重要。我覺得各校的校友應對自己的母校做一點貢獻。四、五年前，我到台灣，跟一位教授去找當時的台大校友會會長，曾任內政部長的徐慶鐘先生，談到校友應該貢獻一點力量。但徐慶鐘說，在台灣搞校友會的組織很不容易。如你剛才所說，台灣情形比較特殊，不太喜歡有大型的民間組織，好像校友會這種龐大的組織，對他們來說是可怕的東西。你說校友捐款沒有很好的管道，大概是怕捐款成了很大的力量，將來尾大不掉就不太好。

其實這件事我也曾和虞校長、孫校長談過。我們剛才談到教授治校的問題，校長也說，學校裡很多教授沒有辦公室，三、四個共用一間辦公室。法學院的教授很少到學校來，學生見不到教授。到了暑假，學生就代表教授到校領取研究津貼，然後學生和教授就到餐廳去吃一頓，這就是師生們唯一會談的機會。如果要改善這種現象，我建議校長不妨在校內成立一個教

授俱樂部，不但可提供教授們休息、用餐，同時也可共同討論學術工作及校務，我問校長，如果校友捐款蓋棟房子如何？他覺得這意見很好，所以我們協助教授治校的第一步也許是建立一個教授俱樂部，反而能夠真正把學生和學校連在一起。我也跟很多留在台灣的台大校友說，如果他們願意花費點時間，我們在美國的很多校友一定會貢獻力量的。

日本的發展模式未必好

問：最近日本的國力不斷膨脹，美國人發現日本的高中生程度已超越美國的大學生，認為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比美國好。台灣的教育大體上沿襲日據時代，像聯考，重視權威不民主、重視已利……等問題，您曾受過日本教育請教您的看法。

答：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不是那麼簡單。今日日本國力的膨脹，並不是日本的中學教育與一般的科學教育水準比美國高。美、日學生最不一樣的是，美國理工科畢業生，包括得到博士學位的人，有很多人在做與國防工業有關的武器研究。美國常說科學發展不如日本，却不敢面對現實說美國因為耗費太多的金錢與人力在國防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當然日本的教育有它的長處，也有缺點。長處是中學的教育在知識傳授上做得不錯，中學的數學、物理、化學的水準很高，但也沒有高到和美國大學生的程度，其實日本大學生進大學後很容易可畢業，程度不比美國大學畢業生高明多少，只是日本學生的訓練好，又肯聽話，所以汽車工業搞得好好。

但我並不認為日本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好的，其實美日的關係實在很微妙的，日本工業的起飛是因為美國在韓戰花了很多錢所致，就像台灣的經濟起飛和越戰也有關係，這些戰爭跟兩地資本的累積都有關

係。如果比較日本和美國的工業，美國是很大的工業市場。即便日本能賣很多的汽車到美國，不過也只占美國市場的百分之二十幾而已，但是如果美國把牛肉賣給日本，則會影響日本的農業，可見美日關係很微妙，不只是教育問題一項而已。

中國要走更民主的路

問：台灣和大陸的科學和教育的管理上有很多相似的現象，這頗耐人尋味，你曾到過台灣和大陸希望聽聽你的意見，再者，教授治校和治國的關係如何？

答：你剛說的，確是耐人尋味。1978年我隨美國化學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我們總覺得中國大陸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後，在社會主義國家裡長大的人大概和資本主義的台灣很不一樣。但是令我最訝異的是，大家的行為還是很相像的，例如論資排輩，請客時誰坐首位。總之，中國封建社會所遺留的影響仍很深刻。

這和教授治校也有關係，我認為不論是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國或學生治國，或一般人民治國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最根本的還是民主二字。台灣和大陸，這兩字都不夠。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很多年輕人都說中國要富強康樂一定要有民主和科學，這是「五四」運動留下的傳統。中國往這個方向還要走很大的一步才可以。現在講的教授治校在台灣大概引起很多衝擊，這和大陸最近的學生運動有相似的地方。我們要走更民主的路。

問：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和科學發展有多少關聯？您覺得身為一名科學家能夠對中國社會有何貢獻？

答：今日台灣和大陸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常常因為做事情不夠科學。為何不科學？因為我們的社會民主訓練不夠，上下關係太強烈，仍未建立平等的觀念，很多事情應該這樣做，却不能這樣做。身

為科學家，我們對社會上沒有做對的事，有責任把它指出來。例如最近大家所關切的环境問題，我們的工業這樣做是對的嗎？我們應從科學的觀點來看原子能發電是對的嗎？我們有責任指出什麼是不符合科學的，並努力改善這些不合理的現象。

問：您剛才提到台灣現在很關心環保工作，請問台灣現階段有何具體可行的方法？

答：我這次回台的第一天晚上，清大的一位教授就請我參加由清大、交大教授和工研區、新竹人士所組成的環境保護協會，我就交了會費當名譽會員。台灣很多人以很科學的態度在分析環保問題，是很好的現象。

希望幫忙提高中國的科學水準

問：李教授對大陸這一陣子所鬧的學潮看法如何？您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教育是否有其基本缺失？

● 大陸學生運動



海峽(76年9月號)

答：我最近比較忙，對於大陸學生的學潮、示威問題，報紙看得少，瞭解也不夠。一般說來，最近大陸很多政策在改變，譬如經濟責任制，農民在自由市場可賺很多錢，但是在社會的改革過程裏知識份子仍未受到重視，文革時候知識份子臭老九，沒有社會地位，目前的改革中知識份子仍落在後面，例如目前的物價一直在漲，有些到上海做買賣的年輕人可以賺不少錢，開小汽車的一個月就能賺一千塊。但是教授一個月只有兩百五十塊，學生則更少了。學生認為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壞，對未來的前途、出路也感到不滿。因此學生示威可說是知識份子的不滿，再深入的問題，我就不瞭解了。

問：在美國大家常常談論中國統一的問題，你認為對台灣和大陸，我們應持著漢賊不兩立的態度，或本著良心去做到大陸或回台灣的決定？

答：這問題對我來講是比較簡單，因為我有兩個護照，想到大陸或台灣來去自如。做為一名科學家，我真正希望能幫忙把中國的科學水準提高。

在座有些老家在大陸的同學，想回家鄉看看，但是又怕到大陸後就不能回台灣了，這不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想目前最重要的是，中國應繼續走更民主的路，提高科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有一天中國會統一的。要多久呢？我不敢說，你看台灣最近也有很多變動。報上雖不明說，經由香港到大陸的人不計其數，在杭州就可以看到很多台灣的觀光客。在台北的餐廳，也可吃到長江下游的魚，難道說是魚投奔自由嗎？我和政府高層人士談起，他們會偷偷告訴你，這是台灣漁民到海邊用手錶和東西給大陸漁民，換魚到台灣賣的。很多人說台灣的漁民很會詐取，拿工業產品到大陸沿岸做以物易物的工作。所以他們是在做三通的工作，大概政府也是知道的。

◎專訪◎

台灣經濟發展的 虛相與實相 —— 訪劉進慶教授

訪問者：■ 陳映真

八月初，日本東京經濟大學的劉進慶教授返台。劉教授是台灣雲林人，1972年獲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攻低開發國經濟與中國經濟，著有「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一書及「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從中樞衛星關係的觀點看台灣政治經濟的演變與展望」（1983）等研究台灣經濟的論文多篇，論析精闢，卓具洞見。劉教授久居日本，本刊趁其返台之便，特請陳映真先生就台灣經濟發展的諸問題進行專訪，關心台灣經濟者，不可不讀。——編者

今天的台灣經濟已成為美日資本主義的外圍加工貿易基地，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台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經濟。

問：台灣在日據時代通過日本殖民主義而編入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戰後則通過美國而進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目前台灣是在美、日經濟圈中從事生產與再生產。台灣從殖民地經濟轉換到目前「半邊陲」國家的經濟，使台灣戰後經濟呈現那些問題？

答：台灣經濟在日據時代，不用說，完全是一個殖民地經濟。戰後，在美國為首的環球性反共戰略體制下重建它的經濟體制。雖然現在的台灣經濟，政府方面說它是民生主義經濟，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說法，實際上它已經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比如說，民生主義經濟有兩大綱領，一

個是「平均地權」，另一個是「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前面一項只做了一半：農地改革做到了，但城市地權改革沒有做。後面一項更是離譜，二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發展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模式的發展，與民生主義經濟背道而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為台灣經濟受到以美歐日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條件有很大的侷限性。即使是民生主義綱領也抗拒不了世界形勢。既然採取開放政策、引進外資、促進出口，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就難免受到美歐日跨國企業全球性國際分工體制的安排。今天的台灣經濟已成為美日資本主義的外圍加工貿易基地。如果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台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性經濟。所以說，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它的資本主義化具有邊陲性的性格。



● 劉進慶教授（右）與陳映真（左）

問：1950 年開始的冷戰、分裂構造對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和特質？

答：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跟 1950 年的國土分裂、反共政策和東西冷戰體制是息息相關的。戰後，大陸國共內戰接踵而起，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中國存在兩個政府，以台海為界，國土分裂。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馬上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海以防止中共攻台，從此台灣與大陸分隔的局勢固定下來。台灣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單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在此以前，台灣光復之初，日人在台財產全歸國有，當時全部產業的八成是公營，貪官污吏橫行。日帝戰時的統制經濟，國民政府全盤繼承下來，在經濟體制上，可說是開倒車，實質上它既不是民生主義經濟，更不是資本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經濟，而是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的半封建性經濟。到 1949 年這一段期間，台灣經濟與大陸連在一起，因此不斷地受到大陸政經混亂以及軍事財政負擔的影響，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苛求誅斂。原來是一個農業資源非常豐富的寶島台灣，變得民不聊生，這一段期間毫無經濟復興或經濟發展可言。

1950 年代，台灣在東西冷戰體制下，一方面依靠作為美國在遠東圍堵中共陣線的一環，徹底採取反共政策，接受美國援助；同時快速回復與日本的經貿關係，重整台灣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一面受到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力，另一面為要保護大陸流轉來台資本的活動以及台灣內部地主階級的要求，開始採取扶植私人企業的政策，給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契機。

1980 年代以後， 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 政治體制的落後， 成為台灣工業升級、 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問：台灣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在美國援助、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強制指導下，國民政府製造了有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的環境，哺育了台灣的資產階級，結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外資、政府與資產階級的三角聯盟，因而台灣缺乏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這如何影響了台灣的民主運動？而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導致政治的進步？

答：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國家一般是透過工業化來達成，而工業化與民主化或者政治進步的關係，有它的兩面性。在一般的情況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會促進政治的進步，使社會更加民主化。但是從歷史、經濟的教訓來說，在某些情況，工業化不一定會促進政治進步。比如說，帶動工業化的資本家勢力和政治極權互相勾結起來的時候，工業化的進展和專制政治的存在則是同時並行。在這種情況，經濟發展却與政治獨裁相輔相成，工業化並不會促進政治進步；但到了某個階段，政治獨裁體制本身又會成為工業化的絆腳石。

台灣私人企業從 1950 年代以後，在政府

優厚的保護下茁壯成長。1960年代，政府開放外資，獎勵投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促進工業化，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私人企業在廉價勞力的基礎上，加速其資本積累，促成財團企業的出現。同時，農業逐漸衰退，農民走向沒落之途，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資本家和勞工成爲新的兩大社會階級，台灣資本主義初具模型。

然而，由於私人資本在政府以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卵翼下長大，台灣資本家勢力與國民黨獨裁政權不能不相互結合。因此，過去二十餘年來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沒有給台灣的政治帶來進步，沒有做出正面的積極作用。不過1980年代以後，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落後，慢慢地成爲台灣工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問：台灣目前面臨產業升級的問題，但企業界投資意願普遍低落，不願做長期的投資，原因何在？

答：現在台灣企業界，不敢做大量投資及工業升級，這與產業結構、政治因素都有關係。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企業組織不夠現代化也有關係。先說企業組織，台灣的企業大都停留在家族企業。現代企業應該是社會化及大衆化，經營權與所有權要分開，不應該由一個家庭或一個人來掌握經營，應該是由專業人才來支配經營。目前台灣的企業尚未到達這個水平。所以企業家對尖端的投資很怕，風險太大，不敢將自己辛辛苦苦所賺來的錢拿去冒大風險，去追求尖端的技術，這是一個因素。

其次，產業結構影響投資升級是什麼意思呢？金融機構以及基本工業，不給私人企業掌握，他們的經營基礎就不能多樣化和全面化。這表示如果他們要投資尖端科技的時候，風險和代價會很大。因爲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其他部門的利益來彌補，也無法找到一個可靠的金融機構長期輔助尖端



● 台灣的經濟走香港模式，韓國的經濟接近日本模式

科技的投資，這是他們在客觀上無法下決心升級的原因。

第三是政治因素，台灣政治前途不明朗，「信心危機」是造成他們不敢做長期投資的一大原因。而短期的投資，一定是技術水平低的。不做長期投資的指標，可以從研究發展費用的負擔比率看出。台灣的研究發展費用占國民所得的比率，不到1%，大概是0.85%，而發達國家大概都到達3%，我們只有人家的1/4，是不夠的。同時它又偏重於政府機構，民間的開發費用很少。所以，經濟發展的實相與虛相的分別是很重要的。我認爲台灣的消費水平，已經很接近發達國家的國際水平，我們

日本、美國海外回來的人，常覺得在消費生活的享受上，比不上台灣，自己是土包子。消費水準跟得很緊的現象不僅止於台灣，是世界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都有這種現象。問題是這種表面上的消費生活是屬於經濟的虛相的一面，實相在於它背後的生產力水平。

我們從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商品及質量來看，台灣與美國、日本的差距相當大。二十餘年來，這個差距雖沒有擴大，但也沒有縮減多少，這可以表現在國民所得的水平上。例如，去年年底台灣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是 3700 美元，日本是一萬六千美元。我們差日本 4 倍，這個差距二十餘年一直沒有多大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才是經濟實相，而剛才我說的消費層面是一種虛相。

台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太脆弱

問：台灣資產階級一般說來缺乏自主、紮根的主體性，這如何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答：剛才已經談過，以下的話可能有些重複。代表台灣資產階級的資本家、企業家，他們的階級性，剛才談過，由於私人資本是由國家資本把他們養大，所以他們對專制的政權雖然不喜歡，但也不敢太反對。正如陳先生剛才所說，他們要求的是局限於經濟層面的“相對的自主”，而非“普遍的自主”。這種性格和台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是有關係的。如果我們拿他們跟日本、韓國的企業家相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台灣企業的主體性質實在太脆弱了。所謂主體性，從經濟觀點來看，要不要在台灣經濟紮根就是主體性的一種表現。但是看起來，台灣的企業家、資本家沒有如此的心態與打算。這與政治權力的性格又有一定的表裏關係。

台灣的政治權力本身就是具有流亡性格，

這種政治上的逃難後遺症影響到社會上、經濟上的各種層面。比如說，台灣的企業家在賺了錢之後通常有兩個打算：一個當然是擴大自己的事業，另外一個是準備避風逃難。這個避風的現象從近年小留生問題上也可看出，將自己的家屬預置於國外，他所賺的一部份錢自然轉到那裏做為避風的準備，另外一部份留在台灣能賺多少就算多少。這種心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有，所以他們的主體性太弱了。這與東南亞的華僑、香港的資本家有何不同？是分不出來的。

我們舉韓國資本家的例子來說明，他們儘管資金不夠，甚至舉外債來投資，也想要紮根下去。所以日本的企業家對韓國的經濟很提防，對我們台灣是不怕的，認為台灣企業家華僑性格很重，認為我們的經濟沒有根，也不想紮根，但只要賺錢就好，所以根本不怕台灣競爭。雖然台灣很競爭，對日本不構成威脅。

再說日本企業家，他們的主體性更強。不只是企業家，而且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樣。例如有一段時候，美國的利息很高，日本的利息很低，世界各國的個人資金都流到美國生利息，但日本的個人資金跑到美國的不多，仍將錢存在日本銀行。當然日本的銀行及信託保險機構於是利用這筆錢到美國去生利息，再將錢帶回來分給日本大眾，可見日本雖是自由經濟但資金不易外流。

不只是經濟方面，在人才方面亦然。日本的學人到海外，不論是在美國或英國，學有成就的人，最後還是跑回日本來。他們回到日本的地位不一定很高，可能還要重頭再來，例如一位東京大學的經濟系教授，年輕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授，成名後自願回到日本來，這時寧願被聘為副教授也甘願。日本人的這種心態，在經濟、社會上都是一脈相承。這一點也是我自己的反省，我沒有資格再說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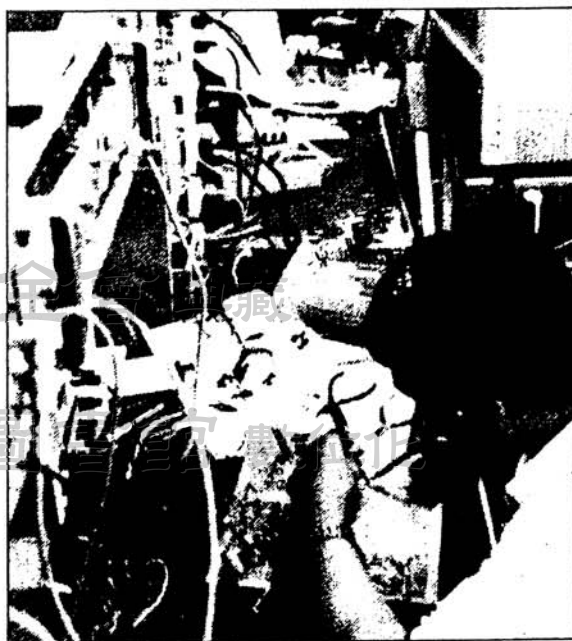
在戒嚴體制下， 農民及勞工階級吃虧最大

問：在國土分裂•冷戰•反共體制下，台灣勞工的處境如何？

答：勞工階級在冷戰•反共體制下所受的影響。冷戰•反共的體制，具體說，在台灣就是戒嚴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吃虧最大的就是勞工階級。當然農民也一樣吃虧。先說農民，從表面上看，農地改革農民得到好處，農業發展也給農民很多好處。不過從經濟的循環結構來看，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好處的大部份反而是給國家及資本家分走了。

其次，台灣的勞工，隨著六〇年代出口加工的發展，勞工在社會上的數量增加，成為新的社會階級，但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因為在戒嚴體制之下，勞工沒有勞動基本權，即沒有團結權、交涉權及爭議權三權。團結權就是組織工會與工運的權利。台灣雖有工會，但都是御用工會，勞工沒有自己的工會，也沒有工運的自由。第二個交涉權是與資方交涉自己的工資與勞動條件，沒有自己的工會也不許工運就很難有這個機會。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從來沒有聽過勞工與資方議價的事例。第三個爭議權更不可能，勞工禁止罷工。在一般勞動基本權中，罷工是合法的。而台灣的勞工過去完全不能享有這個權利，這當然是由於受戒嚴體制限制的結果。

為何國民政府壓制工運與勞動基本權？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不只是敗於共產黨的內戰，而且在處理工運上也有失誤，吃了大虧。所以他們常以為工人後面就是共產黨，認為搞工運的就是左的，見到工運馬上就給戴上紅帽子。這樣的成見，當然使得台灣的勞工吃了不少苦。然而現在台灣勞工的凝聚力正在茁壯成長。目前台灣的勞工大概有五百多萬人，而製造



• 資本、技術、市場依賴中心國家正是邊陲性經濟的特性

業有二百七十萬左右，服務業也有二百多萬，農民只有一百多萬。如此說來，勞工階級的成分加上他們的家屬，約占台灣人口的一半以上。這個社會階級過去一直沒有人真正替他們的利益說話，工會是國民黨的御用組織，只會站在官方立場說話，工人也不相信工會，這是很大的缺點，而台灣的資產階級很少會替勞工的利益說話，難怪勞工內心有很大的不滿。

台灣的勞工階級已經形成， 最起碼他們的經濟地位 應該提高， 勞動基本權應予保障。

從外國來看，台灣勞工的社會地位很低，這是很不應該的、很不合理也不合人性的。國民黨政府反共，反對共產主義沒有人性，然而偏偏我們的社會裏却存在著不合人性的現象。台灣的勞工階級已經形成，最起碼他們的經濟地位應該提高，勞動基本權應予保障。以後的工運，以日本的經驗看，應該向經濟主義的工運發展，這樣大概還可以受到現在政府的容忍。當然，工運的實現有待政治的進步和官方觀念上的革新。然而讓他們的主流以經濟主義為指導方針，對政府來說當然也是一件好事。但同時工運是不能避開政治，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將來應往經濟主義的工運發展，但也不排除政治性的利益，因為就政治經濟而論，權力分配不均必然會影響財富分配的不均，這是自明之理。

問：近日台灣將有人組織工黨，對此您有何看法？

答：這是必然的現象。如果今後民進黨的主張包含不了勞工階級利益的話，工黨的出現是避不開的。有關這點的具體情況我一無所知，也就不多談了！

問：最近，美國運用政治力量干涉台灣的匯率，壓迫台幣升值，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有何意義？

答：有關最近台灣外匯存底、匯率及外貿等問題，美國用政治的力量來干涉台灣的匯率，從政治、經濟的意義來看，當然可說是美國為了經濟問題用政治手段來干涉台灣的主權。一個國家的貨幣價值是應該由一

個國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來決定的，當他下決定時，當然會考慮國際性互相依賴的利益。另一方面，由這次美國對台灣經濟的干涉可看出台灣經濟的邊陲性。

對美日中心國家的依賴仍然根深蒂固

不過話說回來，今日的世界經濟形勢，各個國家都在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因此內政、外交有互相交叉的現象。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大國，一樣也會受到美國的壓力。日本對此壓力是用經濟的方式來解決，美國有壓力就讓市場功能來解決，日本政府不會事先就決定匯率升幾分、降幾分。在外貿方面，頂多用輔導手段勸企業集團自我規律出口，縮小貿易順差。現在台灣所面臨的情況或許與日本相似，但處理的方法不一樣，由此可見台灣的經濟還沒完全自由化，是不完全的自由經濟，從中帶有對美日中心國家的邊陲性、附庸性，因而在政治主權上被打折扣！至於匯率會降到多少，那就得看政治經濟的交涉力量如何，這就超過我的專業，不敢多談。說句不擔保的話，三十美元可能守不住。

問：日本的經濟發展頗得利於以下幾點：1.在美國軍事保護下，軍費大幅減免 2.韓戰、越戰時，日本發展軍需工業，大發戰爭財 3.美國為了圍堵中共，要求日本不與中共建交，放棄大陸市場，而以東南亞各國的市場作為補償。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有可能在台灣重覆嗎？

答：今日台灣的发展是否走日本模式？不可否認，前二十年的發展是類似日本模式，但到八十年代以後，台灣工業升級不上、經濟轉型不來、外匯存底多、海外投資的壓力又大、資金過多等等，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實在困難重重。觀察最近工業升級與海外投資的動態，我覺得台灣的發展慢慢在離開能走日本模式的路。

另外一條路就是香港模式。香港只有輕工業和服務業，尤其靠國際性金融貿易來維持其高所得。從以上兩個模式來看，最近韓國的經濟動態靠近日本模式，而台灣的經濟走向香港模式，這是我的看法。然而，從歷史經驗來看，韓國要成為第二個日本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日本的經濟發展以英國為師，但今日日本的經濟與英美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勞資關係有很大不同。可見韓國和台灣是不可能完全成為第二個日本，如剛才談到的生產力水平的不同，雖然表面上消費生活是相似的，但產業技術結構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剛才陳先生說日本戰後回復到資本主義的條件和背景相當好，就是依賴美國在遠東的世界性反共戰略，而使得美國扶持日本資本主義重新站起來成為亞洲一大反共勢力。但是今日的日本與戰前已不一樣，日本的財閥雖然回復起來，但今日的壟斷情形與過去不一樣，日本今日的反共勢力也不是那麼狹隘的。台灣如果要學習日本的

發達資本主義，如陳先生所言，當然今日不能再學日本佔領殖民地的政策，我們要學習的是日本戰後的政治、經濟、勞動等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不然要像日本那樣發達是很難的。

問：在冷戰・國土分裂・反共・依賴體制下的台灣經濟，在發展上有何限制？如何克服這些限制並探索出具有主體性的自主發展？

答：台灣現在的政治、經濟正面臨著轉型，到底是否已經轉型了呢？從表面看，是上了一層！從內容看，是還沒有。現在的經濟特性是什麼呢？清末是半殖民地經濟，日據時代是殖民地經濟，這是經濟史上的一般論法。戰後是半殖民地經濟嗎？我認為也不算是，因為政治有主權，而“半”的意思不清楚。我認為現在的台灣經濟是邊陲性經濟。

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深圳經濟特區：台灣、香港、韓國、大陸的某些產業已形成地區分工體制

財富的轉移及附庸性 是邊陲性經濟的特徵

對邊陲性的概念應該說明一下。在我的論文中曾提過，第一個標誌是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今天的台灣經濟已經不是獨立的經濟地區，而是處於世界跨國企業分工體制下的經濟形態。

第二個標誌是價值（財富）的轉移：台灣經濟發展，財富增加是個事實，但仔細地看，台灣資本賺小錢，外資賺大錢，一般老百姓生活還過得去，但並不是非常富裕。此外，即使台灣的資本賺小錢，台灣的財富應該有更多積累，但事實是社會資本還很不夠，理由是軍事財政負擔很多，勞動力工資低廉，過去資金大量外流，總觀社會經濟的節餘，有轉移他國的循環結構。現在資金多而不投資，過剩資金有隨時轉移到海外的可能，這是邊陲性的一個現象。

第三個是附庸性：當然現在世界各國經濟都有互相依賴的關係，我們所追求的是水平式的依賴關係，如果是垂直性的依賴，那就等於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了。這必須從具體方面來說，如日本經濟的對外依賴性也很深，他所要的原料需從海外進口，再加工出口，但他們有自己的市場，如果海外市場不行，還可以靠國內市場來維持。但我們台灣的經濟要靠國內的市場是不成的，比如我們兩項策略性產業，電子業，不靠外資、外國技術、外國市場是不行的；紡織業可說是台灣本身自己開發的民族產業，從進口石油到中間原料，最終消費品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產品，但市場就大部份要依賴外國。其他塑膠加工業和雜項加工業也是具有類似的循環結構。

反觀，日本的汽車、鋼鐵、電子業，雖然也依靠外國市場，但國內市場需求更大。此外，他們有自我開發尖端技術的能力，

超越對方的競爭能力，這種能力我們是沒有的。至少拉到水平互相依賴的能力都還沒有。雖然目前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台灣的經濟發展還算不錯，但本質上對美日中心國家的依賴性仍是根深蒂固。

如何克服這個問題，是一個長遠的課題，可能還要到二十一世紀才能趕上。

剛才陳先生談到國土分裂的問題，這個因素可以加進來考慮。在國土分裂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經濟上和大陸有相輔相成的利害關係在，對於克服邊陲性的課題會有不一樣的途徑和看法。撇開政治問題不談，以台灣的農業基礎、輕工業技術、經營人才和大陸的市場與資源結合，確有相輔相成的層面，而具有克服邊陲性的展望，這樣一來，對美國和日本的立場就會不同。問題是牽涉到台灣和大陸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目前大家有很多意見，我只好把政治問題擺開，單從經濟方面來探討。

台灣經濟自體性的問題，就與此有關。如果台灣與大陸可以做經濟交流，我們突破邊陲性的選擇途徑就比較多。當然對大陸的市場，現在全世界都在注意。台灣要如何克服從邊陲國家到中心國家，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但，我對台灣的前景並不悲觀，雖是邊陲性，但在邊陲性的結構下，在第三世界中，台灣還是佔上風，相當不錯的。由於國際社會以及台灣內部的條件都會變，從海外來看，抓住機會，繼續努力，台灣的經濟前途是相當樂觀的。

政府政策搖擺不定

問：七十年代，政府曾有意將鋼鐵、造船廠、開放給民資，何以沒有成功？國營企業有可能轉為民營嗎？

答：關於國營企業移轉民營的問題，目前政府的政策仍是搖擺不定。例如中鋼、中船原先創業時，是要開放股份的一半給民間的

，但由於民間看鋼鐵、造船風險大，沒有前途，所以不敢投資，最後不得不歸為國營。那時民間有興趣的是石化工業，政府却說依據民生主義國策，不許民間經營。允許民間經營鋼鐵，不許投資石化，表示政府沒有原則。只因為石化工業容易經營，有把握可賺錢。結果，七十年代的重工業化政策，反而把國營企業份量擴大，這是與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倒車的作法，所以台灣資本主義化比韓國落後，在這一段時候就顯現出來了。

問：近來據說台灣有些廠商轉往香港，甚至深圳投資設廠，事實如何呢？

答：最近，匯率升值，導致台灣企業往大陸深圳跑，這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目前台灣、香港、韓國、大陸在某些產業已經形成一個地區分工體制。例如紡織業，台灣的紡織業的中間原料有不少經由第三國轉銷到大陸去。成衣加工方面，依據日本的一些研究報告，目前台灣與香港、韓國的商人到世界各地去接訂單，成本太高的商品，都轉交到深圳或其他大陸經濟特區去承包加工。據說其他行業也開始有如此交流的現象。

問：您認為官方對此應採取什麼態度？

答：可能無法禁止，就台幣升值來說，對台灣的企業可說是鬆了一口氣。升值的壓力，可由大陸的廉價勞工來突破，對個別的企業有利，對台灣的經濟也沒有壞處。這在於你要把大陸看待是同一國家，或另一個國家，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若看成是一個國家就輕鬆了，但對台灣政府當局是不利的，對過去三十餘年來在政治上佔據的既得利益階層是不利的，因為允許這樣做，會影響台灣未來的政治前途。

追求和平經濟，政治問題必須突破



● 深圳裝配電視的女工：近來台灣有不少電子廠商轉至香港、深圳投資

問：台灣面臨技術升級的問題，您認為前景如何？

答：從台灣的人力資源來看，應該是有可能的。不論是留在國內，或在海外的人才，在主觀、客觀上都有此條件。在二千萬的人口中，再加上我們相當高的教育水平，人力資源應該是夠的。

要上昇到中心國家，科技基礎應該上昇，否則如香港、新加坡，國民所得已六、七千美元，但仍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技術水平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國際水平。台灣目前也面臨著這個問題。

台灣目前的問題在由於政治問題，讓許多人才、人力資源無法在台灣發揮，這是很大的遺憾。政治問題，也影響到軍事財政的改造，目前我們的軍費國防負擔仍然很重。今日我們應追求的是和平經濟，若仍要堅持反共復國的基地經濟，那麼國防經費的包袱就放不下來，社會資本充實不了，技術開發升級不上，這是牽涉到基本的政治選擇的問題。若是朝向和平經濟、民主政治的方向走，人力資源的發揮就能更大，資本對台灣的打算就能更長遠，說不定海外的人才也將紛紛歸來，這是一個突破的途徑。

◎海峽論壇◎

從國際形勢 看台灣問題

本文是陳玉璽先生今年七月在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的演講稿將於「民主台灣」第42期刊出，經陳先生同意由本刊發表。陳先生是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前美國中報副社長兼總主筆，不久前因該報擬改變言論路線而被迫去職。——編者

■陳玉璽

近來台灣有人提倡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避免成爲中國的內政問題，也就是想要依靠國際力量來抗拒中國的統一運動。同時我們看到大陸方面也把台灣問題訴諸國際社會，首先是要求與北京建交的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近來更要求美國對解決台灣問題要「有所作爲」。

台灣問題有國際因素介入

爲什麼台灣的某些人和大陸方面都把台灣問題訴諸國際社會呢？這是因爲台灣問題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國的內戰，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際因素的介入——台灣被當作圍堵共產主義，防止中共勢力向太平洋擴張的國際防線的一環。今天圍堵政策雖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但圍堵防綫並沒有拆除，從日本、琉球到南韓、台灣、菲律賓，除了台灣以外，仍然保留著美國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美國不要中共勢力或其他左派勢力伸展到太平洋地區的冷戰心態並沒有改變。

然而台灣問題已經歷了將近四十年的流變過程。這期間，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國的國際戰略隨之而調整，因此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立刻也發生了大幅度的轉變。

大體說來，從五〇年代初到六〇年代末的大約二十年間，是以美國和日本爲首的國際社會企圖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否定其爲中國內政問題的時期；從六〇年代末期（或七〇年代初）到現在的將近二十年間，則是國際社會把台灣問題還原爲中國內政問題的時期。俗話說：「十年風水輪流轉」，台灣問題可以說是「二十年風水輪流轉」。

爲了明瞭台灣問題的性質是怎樣隨著國際形勢和美國的國際戰略需要而演變，讓我們對上述兩個時期作一個歷史的回顧，然後分析一下這種演變的意義。

韓戰爆發導致美國干預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大戰中是日本的屬地，它的地位並沒有成爲問題，一九四

- 1950年台灣成為美國圍堵中共向太平洋擴張的國際防線中的一環。



五年台灣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歸還中國時，也沒有成為問題。但此後五年中間，由於中共勢力在中國內戰中迅速擴張，引起了美國軍方和政界保守派之疑懼，他們開始想到要把台灣當作西太平洋防線的一環來加以「防守」，而不要讓它落入中共的手裡。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隨著美國的戰略需要，台灣就逐漸成爲一個「問題」了。

在四〇年代末期，美國國內對這個問題還是有爭論的。當時杜魯門政府內的許多人深怕美國捲進中國內戰而反對「防守」台灣之構想，因此才有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發表的「不干預台灣」聲明，聲明要旨是：台灣已根據「開羅宣言」交還中國政府管治，美國並無掠奪台灣或其他中國領土的野心，亦無意給予台灣軍事援助。隨後美國國務院亦發表聲明，再度確認台灣爲中國領土，美國無意使之脫離中國。

可是到了該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了，中美兩國的敵意急劇升高，美國政府決定「防守」台灣。但是美國既已承認台灣爲中國領土，突然派兵到台灣去，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會指責美國干涉他國內政。因此杜魯門總統於韓戰爆發後兩天發表「

台灣中立化」聲明，首先提出台灣地位未定的主張，作爲派遣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的法理依據。杜魯門的這項聲明同他在幾個月前所發表的「不干預」聲明互相矛盾，唯一的解釋是美國戰略上的需要和「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

美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分裂中國

台灣地位未定的主張，如果只由美國片面提出，還是比較薄弱的，最好是由放棄台灣的日本和美國的西方盟國共同來認定，在國際社會上才站得住腳。因此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就迅速安排日本和西方盟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和約。在和約中，只提到日本放棄台灣和澎湖，而不提台灣歸還中國這回事。這就是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理依據。在這件事情上，西方盟國、日本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都是同美國通力合作，唯美國馬首是瞻的。

「地位未定論」雖然可以爲美國「防守」台灣提供法理依據，但却不足以防止美國捲入中國的內戰。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馬砲戰爆發了，中國內戰的砲火點燃，美國政府認爲

● 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積極推動美國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



根據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它有協防金門和馬祖的義務，但是美國社會的輿論却反對美國爲了金門和馬祖而介入中國內戰。爲了解決這個矛盾，最好的辦法是使台灣脫離中國，把台灣問題從中國內政的架構中分離出來。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一九五八年十月赴台北與蔣介石會談，提出這樣的要求：(1)放棄金門、馬祖，也就是要消除國共內戰的戰場，使戰火不致波及台灣和美國，並且切斷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地緣政治繫帶；(2)放棄對大陸使用武力，實際上就是放棄反共大陸。許多年後，我們才知道，蔣介石答應了第二項要求。在蔣社會談期間，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也發表聲明，指出有必要在台灣成立「一個讓一千兩百万福爾摩沙人和華僑效忠的獨立的中國政府」。這就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原始概念。所謂「兩個中國」並不僅僅是指「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包含兩個要件：第一，在法理上，台灣必須放棄代表全中國的法統，而只代表在台灣的人民；第二，在軍事上，台灣當局不能對大陸使用武力，亦即不能反攻大陸。這兩個要件合併起來，表示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中國脫離關係的獨立「政治實體」。

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主張是過時的政治狂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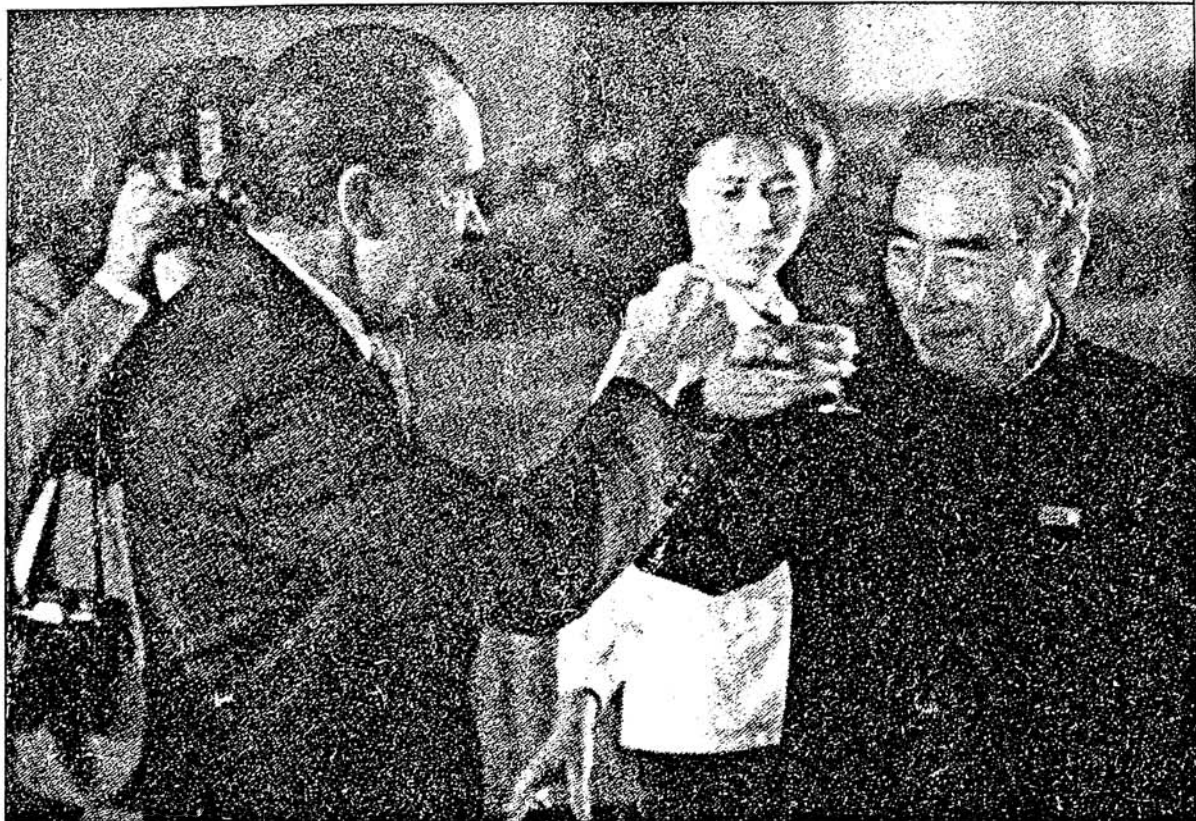
這個企圖從法理上分離台灣與大陸的計劃

，雖然沒有付諸實現，但却可以表示美國當時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就是要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不再成爲中國的內政問題，因此中共如果要「解放」台灣，將會引起國際麻煩。美國艾森豪總統在一九五九年曾經說過：中共要解放台灣是一個「國際問題」，不是「內政問題」。這就把「國際化」的概念說得很清楚了。今天台灣民進黨內有人主張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其實是拾了廿八年前艾森豪的牙慧，可惜時代已經不同了。今天國際社會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是把它還原爲中國的內政問題；所謂「國際化」的主張，恐怕祇是一首時序錯亂的政治狂想曲吧？

進入了七〇年代，中共的國際地位日形重要，一個主要關鍵是越戰。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不但軍事上遭到挫敗，而且政治上也受到本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相形之下，中共却以支援越南及第三世界人民「反帝」的姿態出現，聲望日趨高漲，各國紛紛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並且在建交公報中支持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也就是承認台灣爲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問題爲中國的內政問題。

台灣問題還原爲中國內政問題

越戰後國際均勢的改變，使美國不得不對中共的角色重新評估；加上中蘇關係惡化等因素，美國的戰略專家早在六〇年代末期就提出「聯中（共）制蘇」的構想。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〇年向國會提出的秘密外交報告，也強調中（共）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從七一年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推展中（共）美關係正常化的工作。那一年除了季辛吉秘訪中國大陸之外，美國參議院並通過了兩項決議案，其中一項是支持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作爲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建議美中（共）建交，台灣問題應由海峽兩邊人民尋求和平方法加以解決。另一項決議案甚至建議美國政府贊同台灣與大



• 1972 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使台灣問題復歸為中國內政問題。

陸的最後統一。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簽訂「上海公報」，提到美國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不提出異議，並重申美國關心台灣問題應由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和平解決。回顧尼克森在一九五八年曾主張「兩個中國」，十二年後他對台灣問題的立場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同樣的，福特在一九七三年以副總統的身份訪問中國大陸後曾表示：「祇要我們一天與台灣維持軍事上的牽連，我們就一天干涉中國的內政。」這與艾森豪總統在一九五九年否定台灣問題為中國內政問題比較起來，又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個轉變就是把台灣問題還原為中國的內政問題。

這個趨勢到了今年三月舒茲國務卿訪問大陸達到最高潮。舒茲在上海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說，首次明確宣示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而無意追求「兩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的政策，並表示「美國堅定不移的政策是尋求培養一個能使這類發展（兩岸接觸和交流）繼續發生的環境」，以助成「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美國的政策是維持親美政權的穩定

然而，美國的對台政策除了受到中（共）美關係的約束以外，還必須符合美國對待世界上親美政權的外交政策方針。紐約時報去年四月廿日對這項政策方針有詳細的報導，主要是說美國對於親美的獨裁政權，是要使用所謂「暗外交」，督促它們進行緩慢漸進的民主變革，但不會採取任何可能導致共產黨或其他左派勢力得勢的激烈行動。紐約時報指出，適用此項政策方針的國家地區包括台灣、南韓和智利。可見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目標仍然是要維持當地親美政權的穩定。美國在五〇年代防止

中共勢力伸展到西太平洋防綫的策略並沒有改變，只不過手段不同而已，從前是靠第七艦隊和駐台美軍，現在則靠中（共）美關係的約束，即北京承諾在台海地區實行和平政策，以及美國圍堵政策和國民黨反共隔離政策的累積效果，即台灣社會的恐共拒共心態和兩岸的文化隔離，就可防止中共勢力向台海地區擴展。

根據同樣的政策方針，美國也不願看到台灣反對黨發展太快，因為民進黨如果上台執政，雖然也是親美政權，但美國害怕政權交替會造成政局不穩，給共黨可乘之機；必須等到「人民權力」的浪潮高漲到足以影響政局穩定，執政當局已無法控制局面時，美國才會順水推舟，助反對黨一臂之力（上述紐約時報的報導也提到這一點）。

美國不會支持台灣分離主義

- 今年三月初，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中國大陸，首次明確宣示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圖為舒茲與趙紫陽在北京中南海會談。

同樣的，美國也不會讓台灣的分離主義走得太遠。因為如果分離主義走得太遠，第一會影響中美關係；第二會在台灣內部造成分裂，影響社會的和諧和安定，因為分離主義在台灣是一個「分裂性的議題」（divisive issue）最近極右派團體和民進黨的暴力衝突，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種因於民進黨內某些人的「自決」主張和分離意識；而在台灣反對運動中，「中國意識派」對民進黨日增的疏離和不滿，也是根源於分離主義。第三，分離主義如果走得太遠，會使台灣海峽關係重新出現緊張。這三項後果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舒茲國務卿在上海表明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在時間上恰好是台灣民進黨內某些人高唱「住民自決」而引起中共疑慮的時候，不難想見，舒茲的目的是一方面討好中共，向中共保證美國不會支持民進黨的自決主張，另一方面則是要把島內分離主義的聲勢壓下去。



美國在不統不獨間求取利益

因此美國的對台政策是不統不獨的「二不主義」，在統一和獨立的兩極之間，尋求一個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平衡點。爲了維持這個平衡點，我們看到美國經常在國民黨、民進黨與中共之間施展「平衡術」——對於國民黨，美國的基本目標是維持國民黨政權之穩定，但却對它施加壓力，要求對反對派讓步，特別是不能以暴力鎮壓反對派；對於民進黨，美國一方面支持它走向兩黨政治，另一方面却不願看到它的步伐走得太快，也不能讓它的分離主義走得太遠（今年四月間，台灣盛傳「美國在台協會」支持國民黨鎮壓「四一九」示威的計劃，這消息雖不能證實，但却是合乎美國對台政策的邏輯的。）對於中共，美國一方面保證不支持台灣的分離主義，另一方面却拒絕充當國共之間的調人，也就是不願看到大陸與台灣的統一。

美國的「二不」政策，符合國民黨的利益，中共也不見得會反對因爲只要台灣不鬧獨立，一般認爲中共似乎並不急於在可預見的未來達成統一。對台灣大多數人民來說，統一或獨立不是最主要的課題，當前台灣所面臨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並不會因爲統一或獨立而自動獲得解決。這樣看來，不統不獨的局面大概還會拖上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中國、美國和台灣內部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達成共識爲止。

因此，我認爲「台灣問題」的涵義有必要加以修正，不是統獨問題，而是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往何處去的問題，以及如何進一步改善海峽兩岸關係，確保台海地區和平的問題。

在社會、經濟的層面上，我們面臨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勞工權益、消費者保護、原住民權利等等問題。在兩岸關係上，返鄉省親的問題以及兩



- 台灣遭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岸貿易問題，已越來越引起台灣社會的關注。在政治方面，台灣所面臨的課題，不但是如何發展健全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而且必須改造台灣所特有的雙重政府結構，長期戒嚴體制以及老化而不合時宜的中央民意代表體制，實行行政首長直接民選，使反對黨有機會透過公平選舉上台執政，使政府決策更充分地反映民意，更好地代表各階層民衆的利益。

台灣的民主化仍須努力

在這裡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最近一年來，海內外對台灣的政治發展一片讚美之聲，好像台灣已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不錯，台灣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反對黨的成立更是一個里程碑，但如果我們冷靜的檢討一下，就會發現我們所做的還很不夠，沒有理由自滿。比較一下台灣和南韓吧！南韓是一個公認的獨裁國家，但是反對派領袖金大中早在十多年前就與朴正熙競選總統，而且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然而台灣的反對派直到現在還不能與國民黨人競選總統，南韓的反對派隨時可以發動街頭示威，但台灣反對派的示威活動却受到嚴厲的禁制，不但軍警要鎮



● 台灣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遠比南韓薄弱。

壓，極右派也要來騷擾搗亂；南韓學生被稱為「社會良心」，反對運動的先鋒隊，但台灣學生則不參加街頭示威，最近還發生學生向示威隊伍丟石頭的怪現象。此外，南韓的反對運動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聯盟，包括反對黨、教會、學生、工人團體等，但是台灣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却還很薄弱，因此推動民主化的潛力可能比南韓少得多。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認真去面對，千萬不能自滿於現有的成就。

台海和平有利於台灣的民主化

其次，從現象來看，有人認為美國仍在執行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政策，但實際上美國對台政策概念的轉變，即由台灣問題「國際化」變成「內部化」，是一項對台灣政治發展具有實質意義的變化——它使中（共）美關係得以正常化，使中共願意在台海地區實行和平政策，結果促成了兩岸敵意的降低以及和平氣氛之增長，使台灣的戒嚴獨裁體制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

中（共）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反對黨成立了，戒嚴令已經宣布解除了。促成這種變化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往往被人們忽略了，那就是台海地區恢復了和平。我們必須確認台海和平對台灣政治發展的正面作用，必須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和平環境。

最後，統獨問題既然不是迫切問題，統派人士與獨派人士的意識形態鴻溝應該予以消除，建立民主運動的共識，也就是賦予台灣民主運動以第三世界的共性——運動的目的在求政治的民主、經濟的平等和社會的正義，而不是在統獨爭議中分散彼此的力量。

各黨派應共同發展海峽兩岸的友好合作關係

同時，大陸當局也應該體認到，統獨問題不是迫切的問題，從國際形勢的大環境和歷史發展的大潮流來觀察，台灣的分離主義也不是嚴重問題，充其量只是現代多元社會的一種不同政見，不同聲音，容忍不同政見，並以民主方式加以協調解決是現代政治的課題之一。像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分離主義由魁北克黨所領導的分離運動的聲勢雖然不小，但是一九八〇年公民投票表決的結果，還是反對分離的人佔多數，魁北克分離主義的聲音從此再也叫不響了。如果誇大台灣分離主義的勢力，那就像誇大去年大陸學生運動的反社會主義性質一樣，結果可能導致錯誤的決策，作出過度的反應。為台灣和大陸雙方人民的共同利益着想，國民黨、民進黨和中共三方面都應該放下意識型態的包袱，學習南、北韓的作法針對實際的民間問題，諸如離散親人團聚，返鄉省親、貿易、經濟合作、漁民問題等等，開誠佈公地坐下來談話，從解決實際的問題入手，去發展兩岸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確保台海地區的永久和平。這樣，歷史的惡夢才不會重新降臨台灣的人民，我們也才能集中全力，去追求台灣的民主化，去對付我們所共同關心的各項「台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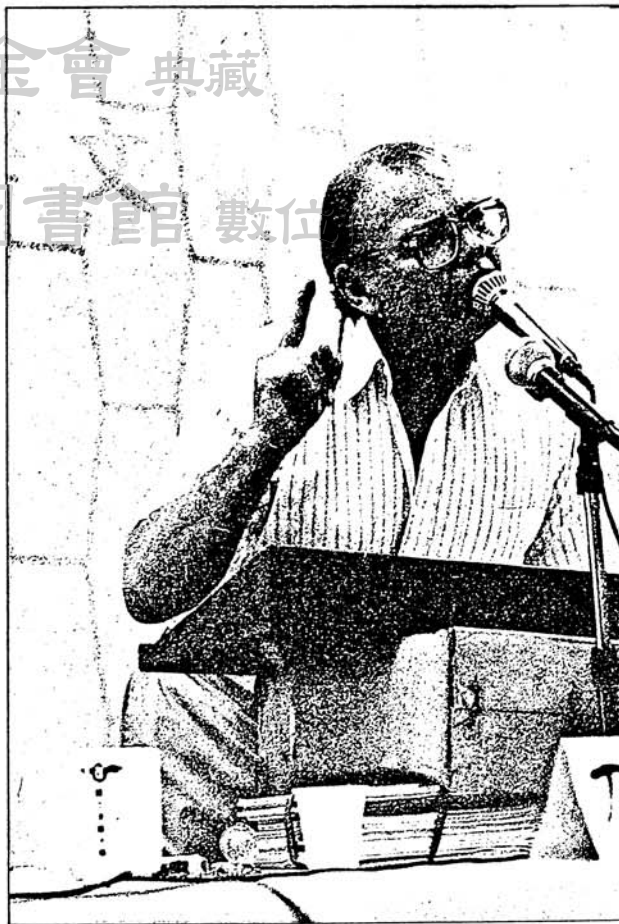
◎海峽論壇◎

後現代主義與 馬克思主義

■樓亮

一九八五年，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杰姆生（又譯詹明信）曾在北大的國際政治系和比較文學研究所進行為期十二周的講學。根據為杰姆生做翻譯及記錄講課內容的唐小兵先生之記述，杰姆生在北大期間講學的總標題是「西方當代文學理論、敘事分析、文化、意識型態」，廣泛涉及到歐洲的宗教，當代西方各種政治、社會學理論，以及文學批評流派。杰姆生並特別以「後現代主義」為主題，運用幻灯、錄影機，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則出發，全面評介了當代美國文化的主要美學風格和文化意義。據了解，北大樂黛雲副教授將杰姆生的講座譯文編成「杰姆遜中國講演錄」一書出版。（參見唐小兵在杰姆生離北京前所做的訪談：「後現代主義：商品化和文化擴張」，原載《讀書》一九八六年三月號。）

今年六月起，台北的《當代》雜誌開始連載所謂的「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六講」，但是却沒有註明文章的來源或出處，不知道究竟是首次發表？還是翻印自其他書刊？也沒有提及是否曾加以刪節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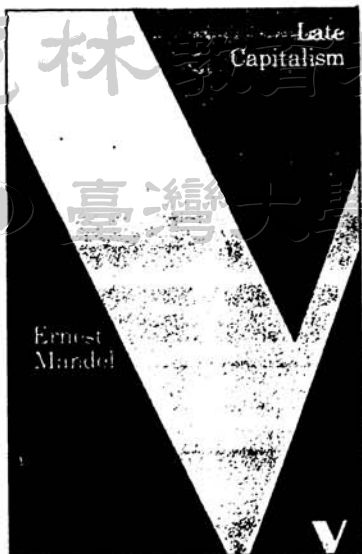


不過就在《當代》六月號這一期中，杰姆生說了一些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話，值得我們的注意，筆者想在此引述一下，以為《海峽》八月號（第三期）相關文章的補充。

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

杰姆生首先提到資本主義已經歷了三個階段，他說：「第一個是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形

- 杰姆生指出商品價值理論及物化的概念，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依據。



- 第三階段的資本主義證實了資本論中關於商品化的論斷。

成了國家的市場，這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代；第二個階段是列寧的壟斷資本或帝國主義階段…；第三階段…為晚期資本主義，或多國化的資本主義」。（在坊間的一些文章中，偶而也見到「國家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但考究其真正意指，其實是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而我相信杰姆生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乃指 national capitalism，即所謂的「市場資本主義」，或「競爭資本主義」，或「古典資本主義」。這也就是說，經濟運作是以一國之內為範圍的。）

杰姆生接著說：「這一階段（按：第三階段）在六〇年代有其集中體現，這是一個嶄新的，與前面各階段根本不同的新時代，而且很多都認為這個時代更接近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換句話說，馬克思的《資本論》事實上是走在它出版時代的前端，因此現代比十九世紀更切合《資本論》所描述的現實。杰姆生在這裏和 George Novack 的論調是一樣的，都在否認「馬克思主義過時論」。

在唐小兵與杰姆生的訪談中，杰姆生把他的意思講得更清楚了。他談到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並引述當代經濟學首屈一指的大師曼德爾（Ernest Mandel）在《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一書中的論點，講到「第三階段的資本主義是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純粹的資本主義，這一階段正是證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商品化的論斷。」杰姆生引述的主要理由是，第三世界的勞動力正迅速地商品化，不再是舊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因此出現了全球性的勞動力商品化。不僅如此，精神領域，如藝術生產，甚至各種理論的生產，都正普遍地溶入商品生產的形式；而根據馬克思，資本主義的終極發展就是要把一切都變成商品。

在這裏，我想順便談一個翻譯的小問題，即如何翻譯 Late Capitalism 的問題。比較適當、同時也是比較通用的譯法應是「晚期資本

主義」，而非「後資本主義」。因為「晚期」表達了「垂死、腐朽」的涵義—這也是使用 Late Capitalism 一語的人們之本意。相反的，「後」則通常被用來翻譯英文的 post-，如「後行為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等；「後」具有否定（黑格爾式）的意思。因此「後資本主義」表示了「非資本主義」的那種「超越」的意思，用來翻譯 Late Capitalism 可能有違約定俗成的習慣。

資本論是馬克思思想的精髓

資本主義分期的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般都認為資本主義是由「競爭」走向「壟斷」，而國家則在任何階段都扮演十分吃重的角色；這些問題也連繫到當前台灣社會的性質。從這一角度來看，一九八七年台灣最重要、意義最深遠的文章可能是李榮武先生的「剖析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刊登於《海峽》創刊號及第二期）。就在這段期間，有些人正違反事實與常識地宣傳「台灣正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市場競爭資本主義」，或者由「國家」走向「民間」。但實際上，台灣只是從一種壟斷型態慢慢過渡到另一種壟斷型態，而國家還是任何壟斷型態的維持者與促進者。那些高唱「民間」的理論，在實際上所造成的效果就是幫助壟斷型態更圓滑的過渡。李榮武的文章分析精闢，透視了紛雜現象背後的本質，從世界經濟整體與台灣 實出發，緊緊地掌握住潮流的走向。

再回到《當代》六月號杰姆生的演講吧。杰姆生說：「當然，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一樣，都是極其複雜豐富的；在這一本中（

按：《政治經濟學批判》）便沒有勞動價值理論，那是馬克思後來進一步的發現。我過去一直想說服自己相信這一本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綜合，但我同時也意識到這種理解的誤差，因為沒有勞動剩餘價值理論便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商品價值理論及物化概念，即把一切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把人類關係轉化為物質，是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依據。」

杰姆生在這段話中主要的表達了下面這一點：即，《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精髓。

在過去，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藉著否定《資本論》而抬高其他馬克思著作的地位，來間接地否定馬克思主義。例如，有很多人說《一八四四哲學、經濟學手稿》才是馬克思最有價值，或最重要、或最精采…的著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綜合，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才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依據，云云。但是只要像杰姆生一樣，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別有用心心的歪曲），就會結論到「這種理解的誤差」。

的確，「沒有勞動價值理論便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資本論》正是勞動價值論的系統性表達。杰姆生指出「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商品價值理論及物化的概念…是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依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盧卡奇撰寫西方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的經典作《歷史與階級意識》時，《一八四四手稿》還沒被發現呢。），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了，對於那些想要先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的真身、本相，然後才決定贊成或反對它的人，認真研讀、討論《資本論》一書，是很有必要的。

◎南韓專輯◎

民主與統一：

分裂國家的歷史課題

——以韓完相、李効再為代表的
南韓社會學

■高崎崇司著 ■平民譯

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劇烈變動，近年來，社會學在臺灣有日漸活躍的趨勢。但是在社會學中國化、本土化的強烈要求下，臺灣的社會學却依然未能去除所謂移植、加工……的邊陲性格。同樣面對國土分裂、專權統治，以及民主運動的奮起，南韓的社會學却能扣緊社會、時代的脈搏，深刻地提出了他們的歷史課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臺灣的社會學界或許可以從南韓社會學界得到些許啓發！

一、民主運動與韓國社會學

要了解今日的南韓社會，我們不能不先從南韓的民主運動談起。

戰後南韓的民主運動肇始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目標是爭取民衆人權、反對獨裁政權。邁入七〇年代之後，無論就質或量來說，都有可觀的進展（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所謂「漢江奇跡」的高度經濟成長，以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問題的嚴重化，兩者表徵了社會構造的劇烈變化。）

民主運動在強力鎮壓下越趨昂揚

1970年，金芝河「五賊」筆禍事件，金大中出馬競選總統，以及金泰壹焚身自殺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等事件相繼發生，正是宣告了七〇年代民主運動的展開。

但1972年10月，朴正熙修改憲法以確立所謂的「維新獨裁體制」，對民主運動採取更強烈的鎮壓手段。然而，以1973年8月金大中綁架事件為起因，同年10月，學生首先發動示威活動要求查明事件真相，繼之，輿論界、知識界、基督教會也相繼發表聲明，要求查明真相，並開放言論自由，於是整個民主運動突趨昂揚。在這種熱烈氣氛下，「民主回復國民會議」於1974年11月宣告成立。

隨後，由於朴正熙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緊急措施極力彈壓，民主運動不得不暫告停滯，「民主回復國民會議」亦寂然而終。雖然如此，自1976年3月的「民主救國宣言事件」之後，民主運動又日漸恢復活動。民主化的力量更積極地介入與支援急劇增加的勞資爭議事件（尤其是年輕女工在邦林紡績爭議事件、東一紡織爭議事件，以及YH貿易爭議事件的抗爭活動），並明白提出南北分裂下朝鮮民族統一的課題。1979年3月，金大中、尹潽善、咸



● YH貿易爭議(1979年8月)：民主運動應更積極支援勞工。

錫憲等人重新組成了「民主主義與民族統一的國民聯合」，同樣明白指出：民主主義與民族統一為其運動目標。

1979年10月，在經濟不景氣及昂揚的勞工運動、民主運動的背景下，釜山及馬山的市民與學生聯合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朴正熙暗殺事件，回復民主的曙光乍然出現，「漢城之春」翩然來臨。

但是，1980年5月，以全斗煥為首的軍方發動政變，並以「陰謀叛亂」的罪名逮捕金大中在內的24名反對運動領袖，接着發生「光州事件」，在部隊血腥鎮壓下，喪生的學生及民衆高達二千人。隨後，金大中在軍事審判中被判決死刑。要求民主與統一的運動，在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的彈壓下，面臨了滅絕的困境。整個南韓社會，更是籠罩在光州屠殺的恐怖氣氛中。

然而，民主運動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很快地又活躍起來。進入1982年，相繼發生了釜山美國文化中心縱火事件、張玲子票據詐欺事

件、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歪曲事件。同年，金大中出國赴美就醫。

韓國社會學——缺乏歷史性的性格

在這樣的南韓社會裡，韓國社會學究竟走過了什麼樣的道路呢？

韓國社會學界的重鎮崔在錫在「解放三十年的韓國社會學」（『韓國社會學』第十輯，（1976年）一文中說：韓國的社會學研究是從1940～50年代的「發展準備期」進展到1960～70年代的「發展期」。各時期的特徵大致如下：

「一、1940～50年代的特徵是：重新出版解放①前社會學概論方面的重要書籍，並將解放前發表的論文（不純粹是社會學的）集其大成，輯成專刊，以便累積前人的研究成果，供以後發展之用；1946年，漢城大學首創社會學系，到了1950年代，便培養了十幾名社會學碩士，往後更是人才輩出；1957年創立韓

註①：1945年，朝鮮獨立。

國社會學會，在這時期，依據調查方法進行的研究開始抬頭，並為1960年代以後更活潑的社會學研究做準備。」

簡言之，這時期的特色是：一方面吸收外國的社會學理論，二來主要針對農村問題及家族問題，運用實證的調查方法進行研究，並累積研究成果。

「而就1960~70年代來說，大致上其有下列特徵：1964年出版了韓國社會學會的機關雜誌『韓國社會學』第一輯；與1940~50年代大為不同的是，社會學研究者開始各有其專門的研究領域（雖然並非全部都是如此），並且在各個研究領域內，發表的論文數量逐漸增多（迄1950年代為止，發表於學術雜誌上的論文僅有兩篇）。在某些領域，由於累積了十幾年或二十幾年的研究成果，終於出現了一些比較有系統地將這些研究加以理論化的學術著作。」

從本土經驗出發，積極關心現實

然而，崔氏對於社會政治的現實以及社會思想的學術領域之間斷裂的傾向，也提出批評。他說：

「在政治上，韓國社會經歷了各種經驗，如6·25^②、4·19^③、5·16^④等等。這些全國性事件雖同以阿拉伯數字作為表徵，但各有不同的性格與內容。儘管有這麼豐富的政治經驗，社會學者卻始終抱著忌諱逃避的態度，不去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到現在為止，這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憐。」

另一方面，金俊處在「關於韓國社會學學術性格的研究」（『延世社會學』第三號，1979年）一文中，也就南韓社會學的形成過程有如下說明：



● 講演中的韓完相（1980年4月）：沒有直接向社會碰、撞的體驗，就不是有生命的學問。

「1946年漢城大學設立社會學系為『社會學形成階段』的起點；之後，1957年，韓國社會學會的創立，開啓了『社會調查方法的導入及其應用階段』；而後，1970年秋季韓國社會學大會以『現代社會學的理论與方法—在韓國社會的應用可能性』為討論主題，又代表了另一個『自我反省及自我驗證階段』的起點。不過，這樣的發展，與其說是對研究對象作更深刻的考察，不如說是更傾向於在方法論問題上面的探索。」

如上述兩人共同指摘的，韓國社會學有意逃避民族的南北分裂以及韓國社會民主化等迫切的現實問題，而關閉在象牙塔之內（不過，這不是社會學特有的現象，其他學術領域或多或少都有類似傾向，這是南韓政府以南北對立為藉口，嚴厲實施思想控制的結果）。

韓完相及李効再是在這種環境下，極少數積極關心社會現實，並從本土經驗（而不是依賴移植而來的外國社會學）出發，企圖建立本國社會學的兩個代表人物。

二、韓完相的社會學

韓完相於1936年3月18日出生於忠清

註②：1950年6月25日發生韓戰。

註③：1960年4月19日，李承晚獨裁政權被市民、學生推翻。

註④：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等人發動軍事政變。

南道唐津。自漢城大學社會系及研究所畢業後，又到美國 Emory 大學研究所進修，在東卡羅萊納大學及紐約州立大學教過一段書，1970 年回韓國任教於漢城大學。1976 年 2 月，韓國政府以研究成績及學生指導等問題為藉口，拒絕續聘全國 98 所公立大學的 212 名教授時，韓完相也被逐出漢城大學——據信是其對政府的批判態度觸怒當局所致。

此後，韓氏以大韓基督教書會的神學思想雜誌「基督教思想」為據點，繼續針對韓國社會不合理的現象進行批判，並擔任基督教教授協議會總務、韓國基督教學生總聯盟理事長等職位，從事其社會活動。1979 年 12 月，與其他 12 名被解聘教授共同發表「民主教育宣言」，要求「忠於大學教育使命，卻遭不當解聘的諸教授應恢復其教職，並立即釋放被監禁的所有教職人員。」1978 年 4 月，更與其他 17 名被解聘教授組織「解聘教授協議會」，發表「給大學同事們的一封信」，再度主張「忠於大學教育使命卻遭不當解聘的教授，應無條件全部復職。」

1979 年 10 月，朴正熙被暗殺，「漢城之春」來臨時，韓完相恢復了漢城大學的教職。1980 年 4 月 3 日「朝日新聞」刊出「回到春天的校園——韓國」一文，就韓完相復職之後的第一次講課做如下報導——該報導充分表達韓氏對韓國社會學的看法。

問題意識就是洞察問題、凸顯問題的能力

“在大學校園裏，「革職教授」重回講壇後的講課已經開始。知名反體制評論家、國立漢城大學韓完相教授（社會學）復職後的第一次授課是 3 月 11 日。’76 年 2 月，被文教會（教育部）以政治偏差為由解聘後，這是四年來第一次講課。迎接第一次授課的教室有點戲劇性，可容納百人的教室早已爆滿，進不了教室的學生擠滿在走廊上。身材短小的韓教授

由其他教授陪同，準時出現教室。『韓教授上了整整四年的“社會大學”，這次畢業後為講授社會學，又回到本校』。此一介紹詞引起學生一陣熱烈掌聲之後，韓教授以平靜的聲音說道：

「諸位一直生活在封閉的社會裏，因此諸位很可能認為我國的社會理所當然是這個樣子，是合乎常理的」。

一般學生，從小就接受將維新體制絕對化的教育，即使在不久前，校園裏仍禁止對維新體制有任何批評。一提到修改憲法，就會遭受嚴厲懲罰。

「但這種所謂的理所當然、合乎常理，究竟是誰製造出來的？是當時的統治勢力所刻意製造、刻意修飾的。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經常持著懷疑的態度來檢證統治勢力強迫我們接受的所謂『常識』。」

韓教授以維新體制下的生活體驗為例，強調「問題意識」的重要性。

「我所謂的問題意識就是，當大多數人不認為有問題時，能夠洞察問題所在，把問題凸顯出來的能力。比如聽到像『民族中興的歷史使命』這類冠冕堂皇的話時，我們應該先自我質問『真的這樣嗎？』來懷疑，並加以分析。」

最後，韓教授以如下的話結束講課：

「社會學雖然是研究社會與人之間關係的學問，但並不是以第三者的立場旁觀就能理解的。沒有直接向社會撞、碰的體驗，就不是有生命的學問。讓我們一起以時時懷疑、向問題挑戰的實踐社會學來共同研究吧！」

初次講課後，韓教授說：「老實說，離開講壇真的很痛苦。但這四年來與政權的鬥爭，讓我學到了對於做一個社會學者實在很重要的東西。今後準備將我在這四年體驗所得到的、我自己的社會學傳授給學生。」

不過，韓教授的這個抱負，由於二個多月後的軍事政變再度遭受挫折，且以參與「金大



● 學生運動是民主運動的前鋒

中陰謀內亂事件」的罪名被捕。根據檢察官的起訴書，韓氏參與金大中各種演講文、聲明文的製作，又在由 134 名知識份子所發表的「時局宣言文」、「民主化促進國民宣言」等煽動學生示威的文件上署名，因而有罪。

審判結果，第一審、第二審都是判處有期

徒刑兩年六個月。1980 年 11 月，由於獲赦免除刑期而被釋放。大約一年後的 1981 年秋天，應美國 Emory 大學邀請赴美講學。人雖在國外，但韓氏對韓國民主化及民族統一的熱烈之情，依然絲毫未減。1982 年 2 月在洛杉磯以「人權與政治」為題公開演講；差不多同



● 民衆是歷史的主人

時，又應「朝日新聞」記者訪問，大膽說出在金大中案審判庭上作為一名被告的體驗，以及當前的的心境。

知識份子應以揭露虛假意識為使命

通過如此經歷的韓完相，在1970年代前半，已出版了「現代社會與青年文化」、「沒有證人的社會」、「自律的人間與開放的社會」等著作；在民主運動高昂的1970年代後半，又陸續出版了「知識份子與虛假意識」、「民衆與知識份子」、「朝向那低處」等三本社會評論集。這些著作銳利地發掘韓國社會問題，並明確地扣緊著民主運動的意義與課題，迄今仍擁有衆多讀者。

其中，1977年5月出版，到1980年2月印行第七版的「知識份子與虛假意識——現代韓國社會批判」（現代思想社）是韓氏的代表著作。

韓在該書序言「現代社會和虛假意識的真面目」一文中說：「統治愈陷於困境，統治集團就愈加緊製造虛假意識，以便延續、強化其

統治。」接著說明「虛假意識的特徵是：以美麗的言辭偽裝粉飾；以『以全民的利益為依歸』等迷惑人心的話裝飾；不斷地強調過去和將來」。最後他指出：知識份子應該是「不能滿足於只看事物表面，對透識內在、剝下假面具具有使命感的人」。

與書名同名的「知識份子與虛假意識」一文，是本書的中心。在這篇文章中，韓氏指出：在韓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中，產生虛假意識的二個結構性條件是：①社會的兩極化，以及②社會穩定程度及相配合的領導者類型兩者間的差距。繼之，他批判地指出：知識份子應揭露虛假意識，但却一直怠惰於這樣做。

「知識份子與虛假意識」一書主要探討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而另一本書「民衆與知識份子」（正宇社、1978年）——正如其開頭第一篇論文題目「民衆是歷史的主人」所標示——討論的是，韓國民衆應該成為民主運動和統一運動的主體。

韓完相在「民衆是歷史的主人」一文，開頭就寫出：「我們的確是生活在民衆是歷史的主人，或將成為歷史主人的時代裏」。然後他將民衆分成兩類：一類為無法客觀地瞭解自己真相的「自在」民衆，另一類為能夠客觀地瞭解自己真相，尤其是自己深厚的潛在能力的「自為」民衆。韓氏指出：「我所主張的知識份子正是『自為』民衆，但並非單純的『自為』民衆，而是以『將沒有意識的自在民衆提昇為有意識的自為民衆』做為自己使命的自為民衆」。根據自李朝末期的民亂開始，經過東學農民革命、開化派運動、義兵戰爭、三·一獨立運動、新幹會運動，直至四·一九革命的鬥爭過程中，民衆逐漸成為主人翁的歷史演變來看，韓氏肯定地指出：「一九七八年的韓國民衆是亞洲最成熟的民衆」，這種說法並非誇張之辭。

此書最後一篇文章「分裂時代的知識份子」，韓氏深入探討了有關南北韓統一問題的重要因素，他強調「確保民族同質性、確保對外獨立、國土統一，及民主發展」乃是四個最重

要的條件。最後，他做了如下的結論：

「即使不是在溫室、在花園裏，而是在像垃圾箱那樣惡劣的條件下，也該開出統一和民主主義的花朵。我們應該讓全世界驚異，讓全世界的人民驚嘆：像垃圾箱那樣的惡劣條件，我們也能開出民主主義和統一的美麗花朵。」

在「朝向那低處」（展望社，1978年）一書中，韓完相提出了他自己的耶穌觀：耶穌揭開了羅馬帝國及保守信仰的虛假意識；致力於締造更自由的社會；與庶民生活在一起。依據這樣的耶穌觀，韓氏批判韓國教會只強調個人的救濟，對（社會的）結構性的罪惡過於寬容。換句話說，他由衷地訴求：教會應該抱持耶穌那種「對待被無賴欺虐者的同情心」來從事傳教活動，基督徒應該像耶穌那樣，是救援者，同時也是解放者。

六個中間集團是民主運動的前鋒

除了這些著作以外，韓氏還發表許多論文。1975年6月，韓國基督學會為解明韓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及提供解決辦法，出版了韓國學術叢書共十卷。該叢書收載韓氏的九篇文章。其中，「自發性中間集團的形成」、「中間集團的現況及其意義」、「以中間集團整合多元化社會」等三篇廣受矚目。

在「自發性中間集團的形成」（收載於第一卷「近代化與人性化」）一文中，韓氏認為韓國社會是「非人性化」的社會，而階級差距的擴大，也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乃是「非人性化」的主要因素。據此，韓氏認為韓國民主運動的風起雲湧，是有其必然性。

在「中間集團的現況及其意義」（收載於第二卷「兩極化時代與中間集團」）一文，韓

氏強調培養宗教人士、知識份子、評論家、學生、勞動者、女性等六個中間集團做為民主運動前鋒的必要性。另外，在「以中間集團整合多元化社會」（收載於第九卷「韓國社會的診斷和展望」）一文，韓氏進一步指出：「中間集團應該擔當的不只是政治性的機能，還更應擔當恢復現代產業社會已喪失的共同體的聯結機能，以促使個人瞭解本身的真面目，使社會恢復社會秩序。」韓氏對社會的這種認識，給韓國民主運動的正當性及組織化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上的基礎。

韓氏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民衆社會學序說」（「文學與知性」，1979年秋季號）。該文具體地描繪出前述「自為」民衆的面貌，進而提出韓國民衆社會學的三大課題：①對韓國「自在」民衆的理解，②對韓國「自為」民衆的產生與發展、挫折與希望，應給予必要的關心，以及③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這篇文章被當局認為有問題而遭受「警告」，在國會中也引起辯論。

上述韓完相的社會學理論，雖然也遭受到如「將問題簡單化並過快地下判斷」之類的批評（吳雄洙：「他這樣生活著——社會學者韓完相」——「深樹根」1980年4月號），但就其深入關心民主運動、竭力探索現代韓國社會結構性的罪惡，並摸索其克服的方向來說，這才是活生生的社會學。在1982年12月4日召開的韓國社會學大會上，韓國精神文化學院教授姜信杓以「從人類學的立場看今日的韓國社會學——韓完相與金環東⑤的社會學」為題所做的演講中，批判金環東的社會學是「文化帝國主義時代的買辦主義社會學」，「反之，韓完相教授的著作「朝向那低處」、「民衆與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與虛假意識」、「現代青年的挫折與絕望」等，則吐露了韓國社會學者的苦惱，是相當有價值的研究（韓國日報 12月10日）。

註⑤：漢城大學教授，致力於介紹外國的社會學理論。



● 李効再：南韓女性解放的理論領導者。

三、李効再的社會學

李効再於1924年生於慶尙南道馬山。梨花女子大學英語文學系畢業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加州大學研究所研修社會學。歸國後創設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系（1958年），並任教於該系。李氏除了曾經擔任韓國社會學會會長、梨花女子大學女性資源開發研究所所長等職外，還參與女權團體。1980年，由於其對政治的批判態度，被全斗煥政權逐出梨花女子大學。

在1960年代，李氏主要從事於都市化、產業化所引起的「核心家族」問題的研究，陸續出版了「韓國農村家族的研究」（共著；漢城大學出版部、1963年）、「家族與社會」（民潮社、1968年）、「城市人的親族關係」（韓國研究院、1971年）等書。進入1970年代之後，李氏逐漸將注意力集中於女性問題，隨著1970年代後半女性勞工運動的高漲，李氏遂成為女性解放的理論領導者。李氏有關女性問題的著作包括：「韓國女性的地位」（與金周淑合著、梨花女子大學出版社、1976年）、「女性的社會意識」（平民社、1979

年）、「女性解放的理論與現實」（編著；創作與批評社、1979年）、「女性與社會」（正宇社、1979年）等。

女權的伸張應以建設民主社會為前提

「韓國女性的地位」一書，從女性人口統計、家族生活中的女性、女性的法律地位、女性的教育地位、女性的政治參與、女性與經濟活動、女性的團體活動等七個層面刻劃出現代韓國女性的地位。在女性問題普遍未受重視的韓國，這是第一本網羅有關韓國女性問題基礎資料的著作，因此獲得很高的評價。

李効再與金周淑兩人的問題意識，充分表現在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勞動女性的人權問題以及有關職業女性平等權的問題意識，逐漸在女性之間高昂起來……但是，與其將女性的組織力量發揮在少數的女性地位的提昇，或一小部分的女權的伸張等目標上，倒不如集中發揮在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一個能讓在婚姻和家庭生活、在貧民地帶、在工廠等普遍受到壓抑與歧視的大多數女性，她們的基本權利受到保障、人權得到維護的民主社會之上。」

這裏所說的「勞動女性的人權」或「民主社會的建設」等，在韓國是有其實際意義。因為勞工運動在南韓政府的政策之下，遭受徹底的壓抑，甚至在1979年的YH貿易爭議中，也有工人為此犧牲性命。加之，現有的女性團體大多對女性勞工問題不表關心，因此，李効再表明的對女性勞動者的關心，給予韓國有意識的女性很大的影響。

「女性的社會意識」一書包含「韓國女性與女權運動」、「日帝下的韓國女性勞動問題研究」、「女性性倫理的展開」、「世界女性意識的動向」等四篇論文。李氏在該書「序言」裏如此說道：

「現在，在渴望人性解放的現代社會裏，韓國女性的人性化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尤其是，面對必須以和平手段解決民族分裂和國土分裂的歷史任務，我們應如何認識女性該扮演的角色？在各人的崗位上，和男性們攜手共同致力深刻地、廣泛地認識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並培養具有主體性的勇氣和創造能力以面對未來，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這本小書希望對這樣的目標能夠提供一些幫助！」

郭善淑在針對本書所寫的一篇書評中說：「想撇開我國最重要的『解決民族分裂和國土分裂的歷史任務』而談女性運動，那只不過是一種空談。面對我們的歷史任務和當前社會問題，女性做為一個國民，必須扮演應有的角色

。然而很遺憾的，現實上，實在很難舉出五個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就這一實情而言，李氏的這本書是企圖針對『今日女性該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提出寶貴建議的第一個嘗試」（「女性運動的正確認識」、「創造與批評」、1978年冬季號）。

分裂時代的女權運動必須是抵抗運動

「女性解放的理論與現實」收載了討論有關世界女性運動的理論和現實、韓國女性運動的過去和現在等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李氏自己的論文「分裂時代的女性問題」。李氏在這篇文章中，反覆指出奮鬥爭取南北統一的重要性：「只要民族共同體不能成為一個整體，我們——做為一個女性、做為一個人——就無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平，也無法重新經驗顯現『人』本來面目的人性化」。

果真如此，為實現這個目標，女性運動該做些什麼呢？李氏在「國土分裂下的女權運動——應做自己本身的主人」（基督學會女性社會研究會會報「女性社會」、1979年2月號）一文中，如是說：

「分裂時代的女權運動必須是一種抵抗運動，是反對：『將國際和國內的女性勞動力、政治力總動員，意圖使分裂現狀永久化、固定化』的運動。為了民族的人性解放，女權運

- 為找尋因南北分裂而離散的冢族，集合在廣播局前面的南韓人民。



動必須將女性的力量發揮在克服分裂、爭取和平統一的方向；必須將女性的力量投入於：視女性人權為單純的經濟發展手段、擷取低工資勞動力等政策及制度的改革。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或是資本主義社會，將女性的能力當作維持極權主義權力結構的手段或勞動力，我們都不能不表示憤怒。只有在令女性失去人性的制度被打倒之後，一個人性化的統一社會才能夠建立起來。」

如上所述，一向把女性運動和統一運動兩者連結在一起的李効再，於1979年春天發表「分裂時代的社會學」（『創作與批評』，日語譯文登於「三千里季刊」、1980年春季號）。由於這是第一篇正面將社會學和民族統一問題連結在一起的論文，因而廣受注目，對於那些意識到這方面問題的社會研究者，產生不小的影響。

在這篇論文裏，李氏首先談到「恨」^⑥的問題。「恨」是「能夠使沉積於全庶民深層的感情蠕動、且具有原始力量的象徵語言」，但，知識份子却一直沒有把它當做學術研究的對象。她進一步指出：分裂時代的「韓國學」必須以分裂狀態所引起、致使民衆失去人性的「恨」，作為根本的問題意識來把握現實。換言之，「想要說明、理解各種社會現象，均必須考慮到分裂結構下特殊的社會結構與制度上的因素。」根據上述論點，李効再強烈批判那些只重視社會調查，對分裂的現實卻沒有絲毫認識的社會學研究者，以及意圖維持分裂狀態的當權者。李氏認為：加緊研究分裂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乃是目前韓國社會學的主要課題。

李氏在被逐出大學後第一次發表的論文「分裂時代的家族研究」（收載於「崔信德教授花甲紀念論文集」、1982年）中具體地分析

了分裂對韓國家族的影響，同時，對於那些不屑研究一般民衆及被歧視階級家族的社會學者也加以批判。李氏在該文中生動地報導了，由於國土的分裂而不得不分居於南北的「分裂家族」，以及離開農村移民到漢城貧民區的「貧民家族」等實態，並再一次重申：社會學研究，應該以解決這些人的痛苦為目標。這樣的主張，似乎是把這些問題當作韓國的特殊的社會現象，而實際上確實也是韓國社會必須解決的主要課題——同樣的，也是韓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課題。這篇論文與前述的「分裂時代的社會學」，因此受到普遍的重視。

總而言之，李効再的社會學乃是以女性問題為中心，以促進韓國社會的民主化及民族統一為目標的社會學。

四、結語

韓完相和李効再兩人均企圖經由民主運動的參與，來創立以民主和統一為目標的社會學。他們的工作，不僅引起韓國年輕社會學者的興趣，也深刻地影響了當前的研究者。前漢城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金普均在1983年6月創刊的「韓國社會研究」發表的論文「韓國社會學——缺乏歷史性的性格」，除了介紹韓國社會學現狀外，他引用了李効再「分裂時代的社會學」一文的結論做為結語，足以說明他們兩人的影響力：

「韓國社會學的任務在於：提供有用的知識與實踐方法，促使社會從含有「恨」的構造，進化為有人性生活的統一社會，也就是能夠逐漸實現自由、平等和愛的社會。因為，建設一個沒有不信任感、沒有被歧視階層，以及沒有貧富差異的統一社會，乃是走向民族統一社會的『漸進實踐』。（本文譯自《世界社會學をめざして》，1983年，新評論社）

註⑥：詩人金芝河對「恨」作如下定義：人的外在意向性受壓抑和壓榨，而遭致斷絕之後，所產生的悲傷又被封閉於內心，日久逐漸僵固、沈澱的情緒。

◎南韓專輯◎

核武陰影籠罩下的

南韓

■張君玖譯
■Chung Kyungmo

本文是今年2月1日在東京召開的「太平洋海洋裁軍運動」座談會上發表的一篇報告，主題是朝鮮半島軍事化的現況。這篇報告沈痛的控訴美日兩國為求本身的安全，罔顧朝鮮半島的安危，不惜以韓國人民為芻狗。

在開始報告之前，我想請在場諸位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核子戰爭爆發，它最可能發生在世界上那一個地區？很多人可能不假思索，就可以答出三個地區：歐洲、中東，及朝鮮半島。但越來越有充分的理由讓我確信，在這三個地方之中，韓國是最有可能的地點。

在韓國使用核子武器，遠比歐洲容易

在歐洲，由於北大西洋公約及華沙集團雙方訂有正式協定，因此爆發武裝衝突的可能性非常微小。相形之下，美、蘇為了爭奪豐富的石油資源，是更有可能在中東地區動武。但正因為這個因素，為了避免破壞、污染儲藏在地下的石油資源，美蘇雙方都會盡量避免使用核子武器。那麼，韓國的情況又如何呢？

如果韓國發生戰爭，交戰國之間是不會有和平協定的。韓戰結束後，主要參戰者美國和北韓在1953年簽定的休戰協定，至今仍然只是個休戰協定。因此，可以提供持久安定的和平協定，並不存在。以技術性的語言來說，目前仍是戰爭狀態。

實際情況還不祇如此。在「1983年國防

報告書」裡頭，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宣稱，如果蘇俄以武力干預中東地區的軍事衝突，美國將在朝鮮半島主動發動核子攻擊，以牽制蘇俄。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水平延伸主義」。同年，愛德華·梅耶將軍（Edward Meyer）也曾在漢城大言不慚地誇口說：「在韓國使用核子武器比在歐洲簡單多了，在歐洲事先還得跟15個國家進行協商。」我們不要忘了：不只是美

國佈署在南韓配備有核子武器的兩個師，而且包括所有南韓的武裝部隊，都要受駐韓美軍指揮官的統轄。

南韓有驚人的美製核子武器儲存量，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但包括南韓軍方在內，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數量到底有多少。美國專欄作家 Jack Anderson 曾經在華盛頓郵報（1983年5月4日）報導說，美國軍方在南韓共佈署了588個各種類型的核子彈頭，包括340個中子彈以及21枚原子毀滅地雷（ADMS），並沿著150英里的非軍事區（DMZ）佈置了這些核子武器。這些核子武器已足夠把整座山脈夷為平地，整片叢林化為烏有。其他的報導指出，佈署在南韓的核子武力相當於300萬噸的核子的

炸藥，比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每單位區域平均核子武力多出三倍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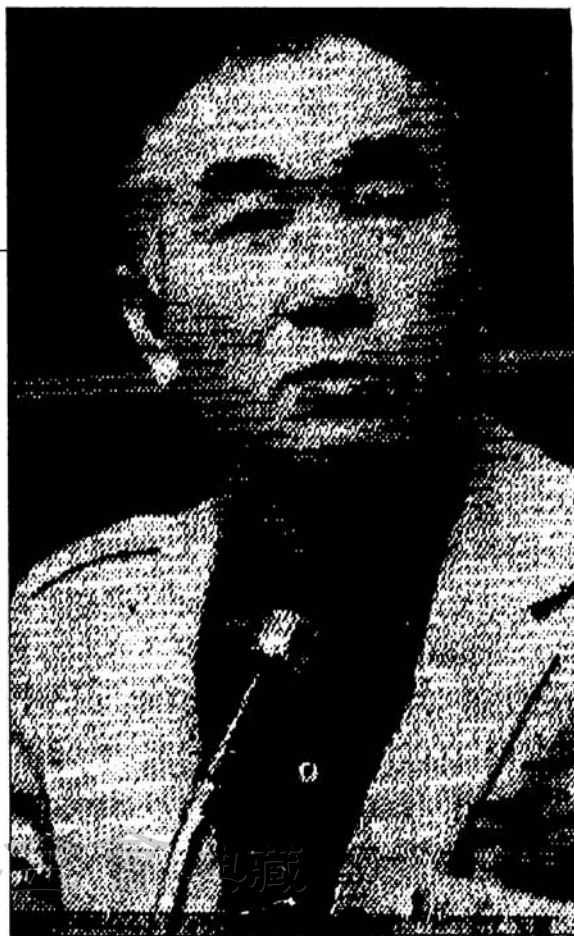
美國四處建立核子兵工廠，總是以對抗擁有同等核子武力的敵對國為正當理由。事實上，美國確不會把那些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當作潛在的箭靶看待。伊朗不是，敘利亞不是，甚至尼加拉瓜也不是。但北韓是唯一的例外，為什麼？

建立在核子廢墟上的勝利，意義何在？

美國深知北韓沒有核子武器以及蘇聯軍隊，然而，美國國會領袖却一再興高采烈地宣稱，將以核子武器「向北突進，以達敵人的心臟，摧毀其全部武力。」回憶一下韓戰時期，麥克阿瑟將軍曾計劃在朝鮮半島的中間地帶投擲數十個原子彈，以便在南北韓之間佈下一條可以維持放射性鈾 60 年到 120 年活躍期的幅射地帶。從這些事情，我們不難發現：醜陋的種族主義正是麥克阿瑟、溫伯格以及他們這一夥人的普遍心態。

對這些大言不慚的話，南韓一位警覺性比較高的政治家在 1975 年 9 月說出了他的恐懼和怨恨，他發表聲明公開譴責美國對韓政策，這些政策純粹是為美國人考慮，根本無視於韓國人民的利益。他在評述中質問道：「如果美國使用核子武器，誰敢保證蘇聯不會跟著使用？建立在一個核子廢墟上的勝利，意義何在？」這位政治家——民主統一黨主席楊楡棟（Yang Il-dong）在公開這項聲明之後，立即遭韓國中情局逮捕，並受到精神的虐待與肉體折磨，罪名是「發表顛覆性的言論」。

如果美國人的心態是把韓國當作核子殺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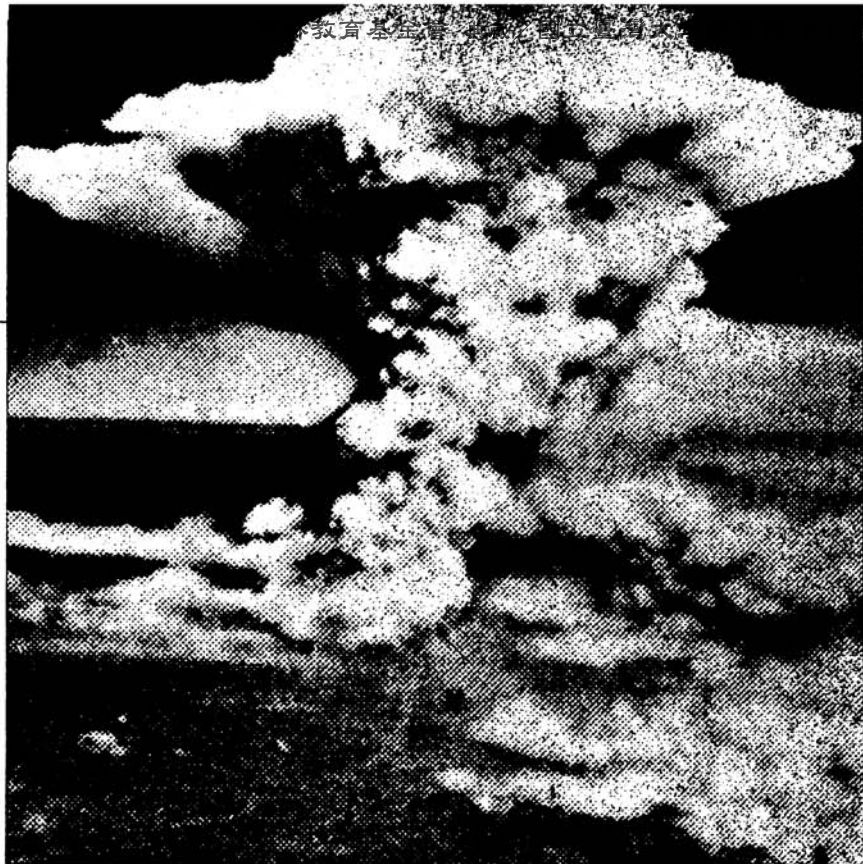
● 作者

的最佳試驗場，如果韓國獨裁者的心態是把美國的核子武器當作是韓國人民的幸福，那麼，在朝鮮半島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將會昇高到無法想像的地步。

反核三原則的堅持，不應以朝鮮半島為犧牲

最後，我必須指出，日本社會裡頭的某些團體普遍抱有犬儒主義的心態，這是值得警惕的。我懷疑，「犧牲韓國，以保證日本的安全」，正是當前日本的戰略方針。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1975 年，筑波大學一位傑出的政治科學家丹羽春樹教授提出一個建議，首先，他想像了一個可能的情境，在這一情境中，南北韓由於共同面臨「核子武器的雙重自殺（Nuclear Double Suicide）的威脅，而被禁鎖

●美國人的心態是把韓國當作核子殺戮的試驗場。



在一個永恒的對抗局面。爲了要使這樣的情境出現，他提議日本應提供金錢及技術給南韓，讓南韓有能力自行製造核子武器。不消說，將大大地提高了凍結朝鮮半島現狀的可能性。

這個策略得到了日本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政客如石原慎太郎（日本國會議員）以及他的一些跟隨者，包括像自民黨內極右派的青嵐會等的極力支持。

可以預見的，這個美妙的策略同樣得到美國一些官員的熱烈支持。華盛頓大學教授 Bruce Cummings 在「世界」月刊（東京出版的一本極負聲譽的知識性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報導說：「溫伯格經常說，他對日本的熱愛跟他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幾乎是沒有兩樣。總之，基於對日本的熱愛，他完全同意：日本必須依靠韓國來防衛核子武器的威脅。」

Cummings 也提到，美國之所以會想以韓國做爲日本核子防衛的基地，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爲「日本人拒絕美國在日本本土部署核子武器」。

做爲人類社會的一員，我強烈贊同讓太平

洋區域能成爲沒有核子武器的地區。我衷心佩服日本人民的反核三原則（Non-Nuclear Principles），以此三原則，他們拒絕了外國強權任何以日本領土作爲發動核戰基地的企圖。

但是，做爲一個韓國人，我要提出強烈的要求：所有這些和平的希冀，以及日本人民對於反核三原則的堅持，不應該以讓朝鮮半島成爲美國在海外的一個巨大而集中的核能武器儲藏庫爲代價。

最後，我想附帶報告一件有關的事實，各位了解，爲什麼我可以在這裡暢所欲言嗎？只因爲我已經看開了是否能夠再回去我的家鄉——漢城。如果這些同樣的話拿去漢城說，馬上就會有半打的情治人員來逮捕我，把我送到牢房裡酷刑拷打一番了。這就是在大量儲存的美國核子武器保護下，一個韓國國民所得到的安全的保證？（譯自 AMPO 第 19 卷第 1 期，1987 年）

◎南韓專輯◎

工運的勝利是

■張君玖譯

歷史的必然！

——南韓工運領袖的泣血呼籲

金文樹（音譯）（Kim Moon-Su）是漢城勞工聯盟的成員，負責勞工教育工作。他出生於1951年9月，1969年參加抗議朴正熙修改憲法的示威活動，自此展開他政治活動的生涯。由於在漢城大學期間累積了豐富的學生運動經驗，畢業後即投入勞工運動，初期擔任推動工運的角色。1976至1980年期間展開的韓一產業鬥爭，他是工會方面的領導人。1984～85年工運高漲期間，他積極策劃組織的漢城勞工聯盟於1985年9月終告成立，但連同該聯盟的其他十四位活躍份子，立即被執政當局逮捕，並遭酷刑逼供。

以下是1986年11月12日，他在漢城高等法院最後一次出庭時所作的供詞。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我想要談談裴木漢（音譯）（Pai muhan）死亡的悲劇，一個工人，一個農夫兒子的悲劇。他，因為農村經濟瓦解而離開鄉下，到城市自力謀生。在漢城清良里、師塘洞以及在基洞幾個地區的商店及麵包店工作了三年之後，他又到永東埔三星企業的工廠擔任工人。

三年後，他被派遣到國外當建築工人，但由於健康問題，他又不得不返回國內。由於失業的建築工人太多了，他不可能再找到工作。而且，他失去右手大姆指，罹患眼疾及大腸炎。而中東油價的大跌，使得海外建築業的黃金時代已告結束。

雖然過去他曾經有幾次相親的機會，但是因為他只有國校畢業，疾病纏身又失去一隻大姆指，因此，沒有一次成功。即使是當一個工人，同樣也因為教育程度太低而廣遭歧視。最後，他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在韓國社會，不管他再怎麼努力，就是流血流汗，他的生活一樣

永遠沒有保障。他絕望了，他準備從利比亞搭機返國時，在的黎波里機場，巧遇五位北韓籍的工人。那些工人跟他說：「在北韓，工人是相當富足的。」，他想：「如果我去北韓，我可以快樂地成家，過個像人的生活。在那裡，像我這樣一個沒有受什麼教育、又病又殘的人，才會受到尊重。」裴木漢於是決心逃到北韓。

期望到北韓過安祥的生活

首先他到香港，但那兒沒有北韓的大使館，隨後他到印尼的北韓大使館，他被查問為什麼想去北韓。裴只是一個工人，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或機密可以提供給他們。他回答：「北韓一定有電子工廠，我想去那裡做一個勤奮的好工人，結婚生子，過安定的生活。」

申相玉和崔銀姬投奔北韓是希望拍出一些能夠得獎的高水準電影，但裴唯一想要的，只



• 有極多的烈士為工運的勝利及工人的真正解放而奮鬥。

是希望能夠老老實實地做個工人，不必擔心忽然失業或被開除，能夠過個平平安安的生活。北韓大使館懷疑他真正的意圖。此外，裴也拿不出能讓他們感到興趣的東西。過了一段時日，北韓大使館終於批准了他的要求，但是，南韓情報單位事前獲悉，利用裴登機前當場逮捕，立即押解回漢城監禁，並以間諜罪起訴，這個罪名不是判死刑，就是無期徒刑。

他的夢想破碎了，那個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活得像人的新社會，那個他起碼可以結婚、過著平靜的家庭生活的夢想徹底幻滅了。他被拘禁在漢城監獄等待審判。許多因參加街頭示威運動而被逮捕的學生也囚禁在那裡，却沒有一個人費心去探問他悲慘的命運。

裴以最嚴重的間諜罪名起訴之後，就被單獨囚禁。1986年五月，無數的學生勇敢地站在街頭，抗議軍事獨裁政權，要求其為當年光州事件犧牲的數千人命償付代價，這時囚禁在

4號房的裴上吊自殺。他已喪失所有的夢想與希望。在這個國家，他無法生存；他想去北韓，但被殘酷地拒絕。他不能不感覺到自己已一無是處，而且四處受到污辱。被關在漢城監獄的那些學生與激進份子，狂熱地致力於工人的解放與福利，為這個國家的民主獻身，遂被扣上違反國家安全法的罪名，然而他們有誰在裴木漢絕望之際用隻字片語鼓勵他，慰藉他？

今天的工人面臨什麼處境？

我相信，把裴木漢的心一片片撕裂的「恨」，也是我們成千上萬的工人所共有的。今天的工人面臨什麼處境呢？他們是農民的子女。這千萬個工人是農人的子女，他們在鄉下無法生存，唯一的出路是移民到都市。遠的不談，看看法庭裡頭好了，這些電器設備是誰裝配出來的？天花板和地板又是誰清掃的？那樣東西、那件事不靠工人的勞力？但他們却不被當人看待，就因他沒受教育、沒有升遷、沒領高薪、沒有被愛與發財的機會！連在監獄或被期盼



●企圖永遠置勞工於奴隸狀態是一種妄想。

為工人避風港的北韓大使館，也得不到合理的待遇。自卑的情結、絕望以及挫敗感再再的淹沒了他，最後他被迫自我了斷。

裴木漢生前是勞工意外傷害的犧牲者。他失去一隻大姆指，又罹患大腸炎及視力衰弱。失業問題使他無處謀生。在那裡，我們能夠找到裴木漢所追尋的社會，一個公正的、平等的社會？我想，不管到那裡，我們都找不到！我相信，只有當我們千萬個工人團結一致，連手摧毀一切的壓迫與剝削，我們才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社會。我相信，當所有工人，所有人民，在一個統一的國土上，建設了一個洋溢著民主、平等的真正安全的社會時，我們終將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只有當工人的力量組織起來共同投入這場鬥爭，裴木漢渴望追尋的社會，才有真正來臨的一天。

千萬個工人投入關爭的第一步

除非我們工人團結起來，共同投入勞工運動，否則工人可以快樂生活的社會將永遠不會來臨。那些識字不多、家無恆產、或生病絕望、或無依無靠的工人們，只能依靠繼承自前輩的偉大遺產——勞工三權：組織的權利、與資方集體交涉的權利、以及集體動員的權利，繼續為實現這樣的一個社會而鬥爭。以人民群眾的力量，為創造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而努力，否則我們就永遠無法建立一個快樂幸福的社會。企圖永遠置勞工於奴隸狀態是一種妄想。然而，那些阻礙國家統一的軍事獨裁政權、壟斷財閥、與美日外國勢力，也同樣都在壓迫勞工運動。擋在我們面前的不只是肉體上的壓迫，還包括各種在背後操縱、分裂、離間我們的伎倆。有太多的烈士為工運的勝利以及工人的真正解放而奮鬥，這些烈士的血汗正是我們邁向勝利的第一步。

在這種處境下，漢城勞工聯盟乃是千萬個工人投入戰鬥的第一步。正因為漢城勞工聯盟

從事的是戰鬥性的工運，它在軍事獨裁政權、壟斷財閥，以及美、日外國勢力的眼中，是被當做敵對組織看待。它發行的報紙也因是為喚起勞工的良知、提供勞工多方面的資訊、作為勞工的眼睛、耳朵及喉舌，而遭受查禁。任何應該受到集體動員權利保障的集會與示威，當局一律以違反「集會示威法」為由加以鎮壓。

然而，漢城勞工聯盟不只是一個在法律上合法的組織，它的成立、它的存在，若從自然法的、真理的、歷史的以及人民的觀點，則有它更強烈的正當性。漢城勞工聯盟不只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更代表了為勝利而奮鬥的所有人民的正義行動。

要恢復人性，必須推翻獨裁政權

然而，軍事獨裁政權為了想把國內勞工永遠置於奴隸狀態，已開始展開對漢城勞工聯盟的壓制。在國家安全局總部以及警察局裡，我們早已飽受各種嚴刑逼供以及種種非人的待遇。但應該被審判的，不是我們，而是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是那些一直想把工人永遠置於奴隸狀態的獨裁政權、壟斷財閥以及外國侵略者。但是，現在他們却逮捕我們、拘禁我們，就因為我們從事工運。

縱然我們提出強烈要求，我們是屬於同一個案子，應該同案審理，但是，在可以想見的壓力底下，我們不但被分開審判，而且在選擇證人以及證詞的內容的採用，都被強加限制。今天是第八次開庭，他們向法官要求判我八年徒刑，判柳仁熙（音譯）（Yu In-Hye）三年徒刑。

每個人都心裡有數，這個審判是代表了對

工運的壓制。我要對我的同志、家人、幾次開庭前來旁聽的勞工朋友，以及所有支持我的人，表達我由衷的感激。我也要向洪生有（音譯）（Hong Seong-U）及李上奎（音譯）（Lee Sang-gu）兩位律師致謝，他們在重重困難下，仍然極力為我辯護。我也要感謝陳貞居（音譯）（Chong Jin-Gyu）檢察官，在軍事獨裁體制下，他不能不扮演壓迫工運的角色，但是他仍盡力秉持自己的良知。我可以了解在審判過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困難。我要感謝檢察官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他們始終以審慎的態度來執行他們的工作。我也要感謝幾位法警，他們多次陪著我上法庭，基於職責，他們也必須維持法庭的秩序與紀律。

如果這個審判能夠喚起那些到現在對工運仍絲毫不感興趣的人的良知；如果那些因害怕受到軍事獨裁政權懲罰而身不由己地必須按上頭意思執行這次審判的檢察官、法官及法警，能夠因此理解到：為了要恢復我們的人性，就必須推翻這個軍事獨裁政權；如果他們和南韓的四千萬人民，以及全朝鮮民族六千萬人民因此能夠團結一致，一起為這塊土地的統一及人民大眾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這一個審判能夠像一個小小的火苗燃起奮鬥的怒火，那麼，我就感到無比欣慰。

不管這條路上會有多少壓迫和荊棘，我們確信：工運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我們會繼續奮鬥下去，直到工人贏得勝利的那一刻、四千萬人民獲得解放的那一刻、六千萬同胞在統一的國土上高歌歡呼的那一刻到來。四千萬人民團結起來！推翻那軍事獨裁！（譯自 AMPO 第 19 卷第 1 期）

◎世界體系◎

威權體制下的勞工

——台灣、南韓、星加坡與香港的比較分析

■Fredric Deyo著

■潘素文譯述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台灣、南韓、香港、星加坡相繼推動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這四個地區仰賴工資低廉、紀律良好的勞動力發展經濟，一致採取壓制勞工的政策。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全球經濟結構重新整編，在經濟轉型、工業升級的壓力，乃有轉向福利導向的「企業共同體」制的趨勢。

然而，在新興中產階級推動「民主運動」之際，同樣在工業化過程中崛起的勞工階級也從「量變」進入到「質變」，有由「民主運動」的支持力量過渡為主導力量的趨勢。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相互激盪正是決定台灣、南韓未來走向的重要變數。

本文從經濟發展策略、階級之間的動態、統治菁英的結構與政治利益的一致性、產業結構的特性，以及統治階層與核心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緊密結合等，剖析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的勞工政策，在工業化不同階段的演變，值得關心勞工問題以及台灣未來的人士細讀。本文譯自 F.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1987,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編者

一、出口導向工業化以及對勞工的壓制：早期階段

不同於拉丁美洲採取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東亞新興國家在 1960 年代先後推動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出口導向工業化的關鍵——出口競爭力，幾乎完全仰賴於工資低廉、紀律良好的勞動力，因此，在政治、社會層面上，維持勞工的溫和、柔順（剝除其權利並壓制抗爭意識），以及在經濟層面上，儘可能壓低勞

動成本，便成為所謂「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兩個要件。在滿足這兩個條件的方法上，台、韓、港、星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

以星加坡而言，由於抗爭性的工運有長久的歷史，而且勞工對壓制勞工的新經濟發展策略，必然採取抗爭的行動，因此星加坡在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之初，即刻加緊強化對勞工的壓制。在台灣及南韓，50 年代末迄 60 年代以恐怖鎮壓手段建立的政治控制，已足以維持工業化初期的勞工紀律。在香港，工運一向是

相當微弱無力、組織內部分裂，在政治上難以動員，因此國家的干預是比較間接的。

國民黨長期採取壓制勞工政策

再就台灣而言，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沿襲了大陸時期漫長內戰背景下制定的那一套勞工法令，對勞工採取壓制的政策，透過對勞資爭議的強制仲裁，限制工會在工資談判的合法地位，並且將所有工會納入地方政府的管理，實質上有效地禁止了罷工行動。這些箝制，再加上各個產、職工會的重要職位幾乎清一色由國民黨的幹部把持，以及在戒嚴法下，一般國民的政治權利廣泛受到限制等，都是早期對勞工採取壓制手段的背景因素，同時提供了1959-1961年出口導向工業化初期勞工紀律的基礎。

但是，這一套法令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陷，如缺乏處理基層勞資爭議事件的條款、產業關係的主管機關、基層執行法令的細則問題，也沒有詳細規定，在在顯示這套法令根本沒有能夠與台灣現實環境結合，因此大部分的勞資爭議事件是在個別企業的層次上處理，很少超出地方性的調解委員會之外，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預。

在台灣，從個別企業的層次對人事及產業工會的控制，遠比由國家出面處理勞資衝突更為有效。在1932年制定的工廠法裡頭，大企業依規定應成立由勞工及資方代表共同組成的工廠委員會；此外，雇主有義務提供福利、住宿、教育上及各種對受雇員工的協助（1970年代，像諸如此類的企業共同體（Corporatism）的作法，有更大幅度的擴張）。最後，早期的勞工法令及政府勞工政策起碼在名義上都支持以企業體為主的工會主義（Unionism），而且所有的工會按規定都是全國總工會（CFL）的當然會員，因此在個別企業管理階層及國民黨各級工會幹部的把持下，工會的控制功能，可說是萬無一失。

在香港，國家很少直接干預勞動關係，這

一部分反映了「自由經濟」的原則，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勞工對雇主或國家還不構成威脅。香港勞工的消極性因素很多，包括：大量的大陸移民工人畏懼被遣返大陸、傾大陸及傾台灣的工會之間的政治競爭、在北京的壓力下儘量減低政治動亂……等。

在台灣，勞工的柔順、溫和則反映了：早期一黨獨大的政治體系對整個社會的宰制、缺乏其他政治勢力對工廠勞工加以組織動員，以及當時台灣以農村為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港、台兩地，背景、環境儘管有如此差異，但是長久以來從個別企業層次控制工人，則是一致的。基本上，國家不必直接干預地方性的勞工事務。

南韓、新加坡以激烈手段鎮壓工運

同樣是走向出口導向工業化，但在工業化初期南韓、星加坡的勞工狀況跟港、台是十分不同的。

1961年5月，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並頒佈戒嚴法之後，既迫切需要建立政治控制，也急於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但由於南韓的勞工運動在日據下抗日運動中，已植下深遠的歷史根源，並一直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儘管南韓政府採取非常強硬的鎮壓措施，但統治精英階層及他們所選擇的經濟發展策略仍飽受工運的攻擊或威脅。

朴正熙一開始採取的反應措施包括：全面禁止罷工、解散所有工會並大肆逮捕工會活躍份子。1961年工會反對勢力遭瓦解之後，朴正熙即刻解除戒嚴，恢復文治，並放鬆勞工及其他各種法令。不過，他同時創立了一個傀儡性質的勞工組織——南韓工會總會（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將所有恢復設立的工會一概納入管理，透過這樣的手段，來削弱工會的政治力量。直到七〇年代中期，南韓工會總會底下的各個產業工會全國總會，主要扮演了緩和基層工會要求、執行政府政策，以及懲戒不聽話的基層工會等功能。



• 李光耀、全斗煥：以壓制性國家機器暴力鎮壓工運的兩個典型。

在星加坡，激進的勞工勢力同樣遭致政府的強力鎮壓。1963年大選，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擊敗了左翼的 Barisan 社會黨。之後，即大肆逮捕反對派的工會領袖、解散工會，並立法禁止勞工參與政治活動。俟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推動之後，在1968年，又通過了一些立法措施，賦予企業管理階層在人事進升調派、資遣解雇等更大的決定權。

總之，不管是南韓或星加坡，推行出口導向工業化之前的政治權力鞏固過程，均徹底摧毀了反對勢力及左翼工會；待推行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之後，國家機器更加緊縮對勞動關係的箝制。

南韓及星加坡對勞工採取這般強力的壓制政策，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呢？從工會人數及勞資爭議事件的統計資料大致可看出一些端倪。以工會數目而言，南韓要到1966年才恢復1960年的水平，參加工會的勞工總數則一直沒有辦法恢復到朴正熙上台之前的人數。同樣地，星加坡的工會會員人數則從1962年的十八萬九千人降為1970年的十一萬二千人。若就勞資衝突事件而言，則變化更富戲劇性。

1955-1960年間，南韓工人的罷工事件每年平均為79件，1963-1971年間倏然降低到每年平均15件。星加坡則是從1958-1962年的62件降為1963-1967年的28件，再降為1968-1980年的4件。

二、工業化與企業共同體的擴張

在決定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作為新發展策略的前後一段時間，南韓、星加坡及台灣政府當局均對勞工採取壓制的政策，香港採取的方式則比較溫和。這幾個地區在工業化初期勞工政策上的差異，部分要歸因於勞工不同的激進程度及其對經濟發展政策與統治階層不同的威脅與挑戰性。但，進入七〇年代之後，又有什麼樣的發展與變化呢？

香港政府採自由主義立場，中小企業嚴厲對付工會

以香港而言，在對政治不滿份子及社會動亂嚴加控制的前提下，勞工立法逐漸有偏向工人的趨勢。1961年公佈的法令允許工人有以和平方式罷工的充分自由，不過其他條款則規定只要七個人就可組成工會，間接導致了工會的零細化以及工會力量越趨薄弱。該法令同時規定：工人不得跨越不同的職業、產業、行業組設工會，並禁止雇用非任職於該產業的人士擔任工會的專職人員。到了1975年，新公佈的法令規定：工會有權要求仲裁，或邀請公正獨立人士組成委員會處理勞資爭議事件。1977年則允許工會雇用專職人員處理工會事務。

整個看來，香港政府的勞工政策始終保持

自由主義的立場，雖然至七〇年代來，香港仍未能制定立法保護某些基本勞動權，如最低工資、強制性團體協約權…等。不過，六、七〇年代在勞工立法上的若干變革已相當提昇了勞工在勞資關係上的地位。但這並不表示：統治精英喪失了對勞工的控制力量。事實上是，在個別企業之內香港工人仍普遍面對了來自僱主及管理階層的壓制與控制。上海幫控制下的大紡織廠對由資方控制的工會尚能容忍，不過大部份廠商均採嚴厲方式壓制或控制產業工會的活動。廣東人開設的中小企業是香港產業工人的主要僱主，他們以最嚴厲的方式對付那些企圖籌組工會的工人，通常是立即解雇。197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對設立工會採取鼓勵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尚可平衡企業主對工會的強烈壓制。就七〇年代而言，工會數目略有增加，不過增加的工會大都是屬於社會服務業及其他非製造業，反而不是在一些主要的外銷產業部門。

台灣從個別企業層次控制勞工

台灣的政治控制雖然遠比香港嚴密，不過在勞工控制上大致跟香港一樣，主要集中在個別企業層次。從1960年代初期以後的勞工立法或勞工政策的執行，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不過，在政府規定下個別企業的福利措施頗有改善。1978年內政部召開由政府、資方及勞方代表出席的全國性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增設工會及企業主應改善受雇員工的宿舍、居住設備、工作服裝、教育、娛樂及消費福利社等。同年，行政院修訂勞工保險條例，主要在改善退休及退休金方面的規定。此後，勞工最低工資均定期予以調整，勞工的福利設施方面亦有顯著改善。因此，一方面政府在這方面沒有干預的必要，二來，更加把工人及僱主連繫在雙方的義務及自利的基礎上，後面這一點在退休金的計算，直接牽涉到公司的工作年資上，很明白地顯示出來。

1970年代中期，台灣執政當局重又支持在資方及國民黨幹部的控制下設立工會，因此

原本死氣沉沉的全國總工會才逐漸恢復生機。到七〇年代末期，參加工會的勞工人數大約增長了一倍，這主要要歸因於政府當局的推動與支持。同時，立法院、國民大會及某些政府機關，逐漸增設勞工團體的代表，也大為提昇了工會的地位。

不過，就台灣人組成的工會所受的限制及控制，以及資方壟斷、操縱工會事務的事實來看，七〇年代中期以來工會活動的日趨活躍，應正確看待為國家間接控制——透過個別企業體的控制——的擴張。舉一個實例來說，在1980年代初期，全國總工會理事主席兼立法委員陳錫淇帶頭發起的「以廠為家、以廠為校」運動，即以「勞資和諧、工人積極參與以解決產業問題」等為號召。

部分是因為以個別企業來控制勞工相當有效，因此政府當局便一直延用這一模式，儘量減少直接干預勞資爭議。Walter Galenson指出：勞工正式依照法律規定與資方訂定集體協約的，大概只占5%；大部分公司、工廠內勞資關係的運作，都是相當非正式的、或口頭上的約定，通常是在代表資方的管理階層控制下訂定勞動協定。從這裡可以看出，香港與台灣的主要差別：雖然兩者主要都是在個別企業的層次上運作，但是在香港，企業內的人事作業仍以壓制方式為主，而在台灣，企業在政府的壓力及法令規定之下，比較接近福利取向的企業共同體。

政治危機下南韓工會受高壓控制

1963年，南韓重建文人政治並放鬆勞工法令之後，逐漸地又轉向以更強烈的方式壓制勞工。首先，在1968及69年兩家外國工廠發生勞工爭議事件之後，南韓政府立即公佈新的法令規定：外資公司成立工會必須先取得勞工事務局（OLA）的批准。而且，所有的勞資爭議事件必須報請勞工事務局委託中央勞工委員會進行調處與仲裁。1971年，朴正熙在總統大選中險勝之後，宣布戒嚴。在戒嚴統治下，罷工成爲非法；任何勞資爭議均由政府當局在

一紙命令下「調處」。1972年新修改的憲法更全面禁止罷工，不管是政府機構、國營事業、地方政府或與國民生計有重大關係的任何私人企業；所有的工會均納入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在戒嚴時期內，全國工會總會的人事完全由南韓中央情報局在背後一手操縱。

1970年代中期，南韓政府開始推動全國工會總會扮演較活躍的角色。在1975—79年間，由於勞工醫療保險、退休金制度及若干勞工福利措施轉交給工會承辦。再加上，政府當局對一些不公平的勞工制度大加整頓，因此工會組織的活動大有起色。工會會員人數遂由1974年的五十三萬一千人陡增為1980年的一百多萬人，足足增加了一倍。

不過，工會的一片好景馬上被1979年朴正熙暗殺事件之後的軍事戒嚴與政治危機所中斷。全斗煥上台之後採取高壓控制的勞工政策，工會會員人數立即急遽下降。1980年公佈的新勞工法禁止「其他勢力」介入勞資之間的集體協議。這個法令剔除了全國工會總會在工會組織上的重要角色，同時規定，教會及其他激進組織介入勞資爭議均屬非法。全斗煥一方面解除集體協約的重要性，二方面支持工廠勞資會議，以改善勞工福利及其他方式來提高員工對企業的效忠與紀律，並希望藉此將工會排除。最重要的，在前述政治危機期間，全斗煥解除或強迫許多反對派的工會領袖辭職，以鞏固其政權。

星加坡以企業共同體輔助經濟發展輔

星加坡的經驗則迥異於南韓，雖然在初期階段，兩者相當類似。以控制勞工而言，星加坡同南韓一樣，仍是以政府為中心，控制層面十分廣泛。某種程度上，實質的管制例如工資水平、退休金或職業安全等更加緊縮，不過更重要的變化是從早期採取的壓制方式轉變為在政府控制下建立企業共同體的結構，以做為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全國工會聯合總會（NTUC）就是這種轉變下代表性的產物。在摧毀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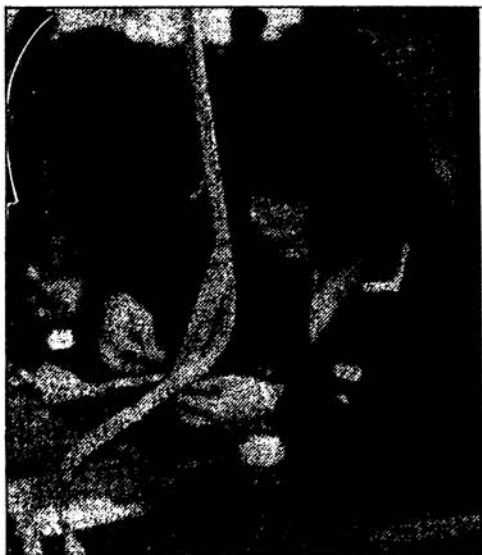
派的工運勢力之後，為重新恢復工會的活力，採取的辦法是：對隸屬於全國工會聯合總會的工會會員，提供各種福利及服務措施，諸如交通、保險、銷售等方面的服務及其他各種直接的福利。在福利計劃的吸引下，工會會員人數在1970年代急速增加。

不過，我們必須清楚分辨，企業共同體的擴張並不意謂放鬆對勞工的控制。1970年代在勞動力短缺情況下，政府壓制了工資的上漲這可看出，實質的控制並未中斷；建立在企業共同體之上的勞工政策，只是反映了在轉變的經濟條件下採用更有效的控制方式。與南韓比較，星加坡更早、也更成功地採取企業共同體的策略，部分是因為人民行動黨更早、也更成功地消除了反對派的工會勢力。

八〇年代初期，又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工會組織走向地方分權化，全國工會聯合會的控制力量大為削弱，基層工會在政府嚴格監督下有更大的權力參與集體協約，同時原來由政府推行的福利計劃，也逐漸由私人企業接辦。

未來，星加坡、南韓政府——勞工之間的關係將如何演變呢？就最近的發展趨勢看來，星、韓及台灣三者的政府——勞工關係漸趨一致。台灣政府當局鼓勵、支持由企業管理階層來控制勞工，以及資方控制的工會，但在勞資

- 外銷導向工業化的「經濟奇蹟」，難道不是靠幾百萬個工資低廉、努力勤奮的勞工支撐起來的？



爭議的處理上，政府直接干預的情形越來越多。在南韓，政府當局削弱了南韓全國工會總會的地位，轉而支持基層工會較自主的運作，並逐漸強調個別企業內的工廠會議，由資方主動改善勞工福利，儘量減少工會的參與。星加坡的情況也很類似，中央集權式的全國工會聯合會逐漸被走向地方分權化的工會組織與住屋工會所取代。就台、韓、星的實情來看，資方有逐漸取代工會自行推動、辦理勞工福利的趨勢，這種變化證實了三者共同走向「政府管制下的企業共同體」(State-regulated enterprise corporatism) 的勞工政策，以及相應的，南韓、星加坡逐步放棄了「工會的企業共同體」(Union corporatism) 的策略。

其實，台、韓、星三者的政府——勞工關係趨趨類似，並不是偶然的因素，日本的產業、勞工政策一直是台、韓、星政府當局研究及模仿的對象，同時，三者之間相互的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也有所影響。

三、出口導向工業化與政府——勞工之間關係的演變

Otto Kreye 指出，第三世界工業製品的

外銷導向與政府壓制勞工的政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原因是：爲了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必須仰賴工資低廉、紀律良好的勞工，同時需要提供穩定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國資本。

就台、韓、星、港而言，在政府壓制勞工的政策底下，出口導向工業化期間的勞工紀律被控制得相當良好，這不能純就經濟的因素來看，事實上，在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之前，對勞工的壓制更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諸如台灣、南韓的戒嚴法，星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摧毀主要的左翼反對勢力以鞏固其政權。

出口導向工業化要獲得成功，在早期階段固然仰賴於政府採取政治壟斷性、壓制性的勞工政策，但是到了七〇年代末期，當經濟結構面臨重整，相應地產業結構必須從以廉價勞力來提高市場競爭力爲基礎的產業轉型到以技術性、高生產力的勞動力爲基礎的產業時，在勞工政策上是否也要相應地加以調整？證之於台、韓、星、港，七〇年代以來逐步推動工會的設立，以及日漸強化以個別企業爲主的福利措施，均促使工會會員人數急速增加。

單就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邏輯來看，經濟轉型期的勞工政策也必須轉向強調勞工福利

的「企業共同體」制。從七〇年代初期開始，工資上漲的壓力逐漸升高，勞工的流動率始終居高不下，對一向雇用低廉工資、低級技術勞力的出口導向工業化逐漸構成威脅。有些投資者已逐漸把投資轉移到工資更為低廉、人力更為充沛的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中國大陸。面對這種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工業升級、技術升級，以維持能夠在國際市場競爭的勞動成本。所以，為了提昇本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政府必須加緊推動個別企業，配合各種人力、職業訓練計劃以提高工人的技術水準。換句話說，在經濟上要更有效地運用勞動力，就必須把工人納入企業體及工會的結構之中，這時候六〇年代採取的壓制勞工政策已完全不能適用，以工會及個別企業為基礎來控制勞工的「企業共同體」制，相對地成為勞工政策的主要走向。

四、影響政府——

勞工之間關係的政治因素

如上節前述，台、韓、星、港在出口導向工業化初期，將勞工全面排除在企業的決策過程及政府政策之外，固然與經濟發展的策略有緊密的關係（如1968年星加坡所公佈的強硬壓制勞工的法令），但經濟絕非唯一的因素。基於政治層面上的考慮，一再地剝除勞工的政治力量，在台灣、南韓、星加坡，都是顯而易見。

政治因素大約與兩者有關係：一精英階層權力結構的一體性，二國際地緣政治上的關聯。

就第一個因素而言，由於這三個地區均缺乏強有力的地方領袖或地主階級，在軍方或唯一政黨鞏固政權的階段，統治菁英權力結構的一體性必然刻意壓制可能會被反對勢力作為動員對象（勞工運動）的勞工大眾。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韓戰後台灣及南韓在美國遠東軍事政策中扮演了地緣政治性的角色，因此一個標榜反共的獨裁政權得以獲得大量的軍事、經濟及政治上的支持，並得以強

有力的手段摧毀左翼的工會力量。

香港殖民政府同樣獲得了外在勢力—英國的支持，星加坡的反共政權先是得到英國的外力支持，後來加入了太平洋共同防衛組織的軍事結盟。

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固然需要政府強力壓制勞工力量，但反過來，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結果也會更加鞏固勞工壓制政策。首先，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同時相對地增加了核心國家的經濟風險，因此，本土精英通常會進一步得到更多的外力支持。Benjamin Cohen 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外資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主要還不是經濟上的考慮，重點在於維持政治—軍事的結盟關係。

其次，獨立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崛起，提供了反對勢力獨立經濟來源的基礎。但由於本土工業資產階級是在出口導向工業化時期逐步興起，因此他們的成長幾乎完全仰賴於工業化政策的持續、政府決策精英的支持、外國資本、以及提供本地資本盈利機會的一些轉包契約。以南韓為例，由於本國企業，必須經由政府擁有或控制的銀行，取得外國貸款，因而更強化了本土工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附屬、卑屈地位。

五、經濟結構對勞工組織動員的影響

在工業化過程裡頭，經濟結構的特性對工會的設立及活動有相當大的影響。直到目前為止，出口導向工業化仍集中在少數以外銷為主的輕工業部門，如電子業及成衣業，這些產業部門吸收了龐大的年輕女工，一般的僱傭條件是：工資低廉、工作缺乏保障、技術水準低、升遷機會低。這也難怪在工人對工作、雇主及同事，缺乏情感投入的情況下，工人的離職率（或流動率）會始終高居不下。

在這樣的僱傭環境底下，起碼有二個因素影響了工會的活動：一儘管這些產業部門的工人在南韓的勞工抗爭活動中最為活躍（如紡織廠女工在勞工爭議運動中一向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工會成立的比率也相當高，但工會組織



• 工人沒有權利要求合理分享自己參與創造出來的經濟成果？

過程主要是受政府的輔導、支持，而並非草根性的組織。Jang Jih Choi 指出：紡織工人遠比機械或化工業工人，更不可能在工會的組織上扮演積極領導的角色，顯然，這些雇佣條件有礙於獨立性的工會組織的發展。

三由於這些產業部門的流動率高，因此不易形成穩定的工人社群，勞工運動所需要的自

主性的組織基礎，因而難以建立，也因此，這些產業部門的勞工抗爭事件通常無法維持長久、組織不善、大都採取守勢，而且容易妥協。

中小企業減弱了勞工組織的力量

經濟結構的因素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香港、

台灣對工人的控制是以個別企業為主，而南韓、星加坡則由政府扮演較吃重的角色。

以香港而言，根據統計資料，工人人數在兩百人以上之工廠所雇用的工人總數，從1966年的50%降為1980年的29%。在台灣，工人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工廠所雇用的工人總數，1961年是42%，1971年增加到64%，不過到了1980年又降為33%。南韓、星加坡的企業形態則與台、港以中小企業為主，有明顯的不同。以南韓而言，工人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工廠所雇用的工人總數，1960年是33%，1968年增加為56%，到了1974年陡增至74%。星加坡由於缺乏早期的統計資料，若單就1975年的資料來看，工人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工廠所雇用的工人總數即占了70%。

這些資料顯示，台灣、香港的工業化過程，中小企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此，儘管勞工人數快速成長，可是在組織上却越形分散。在台灣，因為政府當局鼓勵資本家到鄉鎮地區設廠，勞工因而更加分散。

由於台灣、香港的經濟結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且產業設置較為分散，因此工業社區、企業體及勞工家庭之間形成緊密的人際網絡，地方性的權威結構比較容易維持，自然用不著政府直接干預。南韓、星加坡的工人較為集中，因此地方性的權威結構不易發揮作用，勞工紀律經常需要政府出面維持。

總之，隨著出口導向工業化進入不同階段，政府—勞工之間的關係跟著有所調整、轉變，同時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勞工的組織、動員也產生了若干負面的作用。如前所述，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的早期階段迫切需要建立由國家一手壟斷、一手包辦的勞工制度，以有效地控制勞工；發展到了某一階段，就面臨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這時便需要逐步強化企業共同體的結構，以便能夠更充分地運用現有的勞動力。

政府—勞工間的關係固然是受上述經濟變化的影響，但它的運作、壟斷的特性以及最終的效果，却都屬於政治層面。以台、韓、星、港來說，工業化早期階段，先透過強制性的手段有效地控制勞工，到了後期改變運用企業共



同體的組織結構，在政治層面均有效地防止了勞工運動的發生。而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模式下的產業結構對勞工組織、動員所起的負面作用，更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勞工政策對勞工運動所具有的事先防範的機能。由此看來，伴隨著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而來的，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彼此間相互呼應、緊密配合，乃是台、韓、星、港統治精英階層能夠長期支配勞工、削弱工運的根本因素。

六、經濟發展成果分享的問題

如前所述，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過程中，若干結構性的因素（如本土統治精英階層運用核心國家的支持以鞏固其政治權力、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被削弱、勞動階級數量龐大但仍帶有游離、過客性格，以及台港兩地工業勞動階級在空間地域及組織上的過度分散等）全盤削弱了工運的力量，製造了勞工是溫和、柔順的表象。除此之外，社會福利水準的不斷提昇，也在經濟層面上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不容否認，台、韓、星、港以勞工密集工業為主的快速工業化，有效解決了人口膨脹所帶來的失業問題，同時提高了實質工資及生活水平。以1980年的失業率同出口導向工業化推動初期的失業率相比較，可以發現明顯地降低了許多，這不能不歸功於外銷產業部門雇用



•工人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改變在政府及資方長期壓制下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低落。

員工人數的不斷擴增。

此外，相對於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造成了所得水準差距日益擴大，東亞地區出口導向工業化並沒有產生類似的結果。Gary Fields根據所得分配的統計資料指出，一九六〇及七〇年代，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水平逐步下降，南韓是先降後升，香港、星加坡先是下降，然後便停滯不變。

透過這些統計數據，若干學者認為，東亞國家的工人實質上已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他們對勞工表現的溫和、柔順，提出兩點解釋：一、出口導向工業化促成了生活水準大幅提昇，所得差距縮小，因此在經濟層面上，統治精英及他們所推動的經濟發展策略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二、在充分就業的經濟條件下，工人接受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內追求個人的發展與成就，集體行動受到排斥。

東亞地區工人仍屬低工資

以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來解釋勞工的柔順，固然可以說明某一部分事實，但仍有它的限制。比如說，東亞地區工人的實質工資事實上是從一個非常低的水平開始上漲，而且以世界性的標準來看，目前的工資水平仍然屬於低工資。以1980年而言，東亞地區的工資水平都還低於拉丁美洲（見表一）。而且，自七〇年代以來，工資上漲率遠低於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比率，這些均一再反映了東亞勞工政治地位的低落。

•表一：每小時工資率比較表（1980年）

	美元 \$	以 1975 為基底 增加的百分比%
墨西哥	2.76	46 %
巴西	1.73	53
香港	1.51	113
台灣	1.25	160
南韓	1.10	197
星加坡	1.09	42

此外，無論就工作的保障或工作條件來說，東亞地區外銷產業工人的遭遇，甚至都比拉丁美洲地區的工人還差。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東亞地區所得分配相對的平均並不見得就是經濟成長果實的平均分享，反而可能是反映了低收入工人或低收入戶勞力搾取水平的提高。以南韓製造業的工人來說，他們每週的工作時數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台、韓、星、港外銷產業部門勞工人數的擴增，便包括了大量為了賺取低廉工資以補貼家用而進入勞力市場的年輕女工，她們大部分來自於低收入家庭。因此，東亞地區家戶所得水準的平均，只不過是反映了低收入家庭額外的、強化的勞動。

某些人認為，政府透過公共福利經費的支出實際上對工人的低工資已有所補償。問題是，這是否真正提高了工人的有效社會工資呢？還很難說！以台、韓、星、港而言，一九八一、八二年左右，教育、健康醫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總預算的比例，都還低於拉丁美洲的幾個新興工業國家呢！（見表二）。

●表二：教育、醫療保險及社會福利經費支出占國家總預算的比例

阿根廷(1980)	46.8%	南韓(1982)	20.8%
巴西(1979)	54.5	台灣(1982)	29.2
墨西哥(1980)	36.3	星加坡(1982)	12.6
		香港(1982)	26.3

最後，就勞工抗爭運動的發展動力來看，以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來說明勞工趨於溫和、柔順，就更站不住腳。以拉丁美洲來說，所得分配的高度不均，部分是導因於兩種不同形態的產業活動之間工人所得的明顯差距。第一種

是以家庭勞動、自雇勞動及其他非正式部門生產活動為主的工人，他們工資十分低廉、地位低落、數量龐大；另一種是現代產業部門及採礦業的雇傭工人，他們工資高、有保障、人數也較少。就是後者這些現代產業部門中經濟地位優越的工人，組織、發動了強烈而且獨立性的勞工運動（雖然他們也是分享較多經濟發展成果的工人）。在東亞國家，只有在南韓的重工業（如造船廠、鋼鐵廠）及採礦業工人身上，可以見到類似的工運力量。

總之，單以經濟因素（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與否、所得分配的均等與否）來解釋工運，似乎過於牽強。能夠鼓動工運及有效的抗爭行動，孕育出集體行動能力的主、客觀條件，與穩定的雇傭條件、強有力的工會、凝聚一體的工人社群，具有密切的關係。東亞地區的勞工普遍缺乏上述這些條件，因此在1974年石油危機造成全球性景氣衰退，許多外銷產業緊縮裁員時，只發生了一些偶發、零星的勞工抗爭事件。

七、結語

基本上，台、韓、星、港都是以日本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為模仿、學習對象，因此若干學者將這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稱之為「新日本」。若就從個別企業層次，由企業管理階層控制勞工，以維持工人對公司的順從及良好投資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四者之中又以台灣最像日本。但這並不意謂，台灣政府當局在勞動關係上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恰恰相反，由於政府鼓勵資本案分散到鄉鎮設廠，並鼓吹類似「以廠為家」之類的企業家長制，因此在推動以個別企業層次為主的「企業共同體」制

上，政府扮演了間接但却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南韓、星加坡的企業形態則不像台、港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因此想要達成政治控制及經濟動員的雙重目標，政府當局就必須擬定全盤而且精密的控制策略。香港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殖民政府採取「自由經濟」的態度，加上中小企業為主的企業形態下，勞工較為分散，因此雇主在沒有太多顧忌的情況下，大都以獨裁式的管理方式控制力量薄弱的工人。

本土社會階級力量的微弱與附庸性格、統治菁英政治利益的相互一致，以及核心國家對威權政府的支持，使得東亞這四個地區政府裡頭的科技官僚擁有政治上的自主性，在經濟發展的決策過程中，不必理會其他不同的政治主張。再者，工業化初期，統治菁英權力結構的互為一體（形成所謂的政治利益集團），以及政治上的自主性（沒有來自其他階級力量的抗爭、挑戰），促成了政府當局採取壓制勞工的政策，結果是：當工業化發展到某一階段，勞工人數日益擴增，產業勞工階級隨之崛起，但一旦想把勞工組織、動員起來的時候，便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牽涉到長期壓制下勞工的性格、心理意識……等等），而且一旦順利成立工會，都是與統治階級（諸如國民黨幹部所代表的黨機器、國家機器，資方管理階層所代表的資本家）緊密掛鉤。

當然，這種情形跟某些因素有密切的關係：一出口導向工業化過程中新形成的勞工階級，大部分是工資微薄、技術水準偏低、工作缺乏保障的年輕勞工，相當不利於强有力的獨立性工會或穩定化且具階級意識的勞工階級的發展。二本國企業在經濟上多少仍需依賴政府的支持與援助，因此企業與威權國家之間存在著

緊密掛鉤的自然趨勢。三出口導向工業化既然是以核心國家為主要的外銷市場，加上核心國家跨國企業紛紛到這些地區投資設廠，因此在經濟上，雙方聯繫越趨緊密，本國統治菁英可藉此取得外力支持，以穩固其政治權力。

問題是：七〇年代末之後，這些出口經濟在全球經濟結構重整的衝擊下，走向「企業共同體」制的勞工政策，又能夠維持多久？能夠發揮多少效果？一方面，「企業共同體」制可能提高產業工人對生產體制的投入，有助於工業升級與經濟轉型，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達成預定效果，很可能又走向壓制勞工的老路。當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貿易的設限壁壘、外銷市場的波動逐步升高的時候，許多外銷產業必將遭受波及。一旦產業緊縮、裁編，勞工抗爭事件將隨之而起，一九七〇年代中、末期世界景氣衰退時，這幾個地區都出現了這樣的景象。

在這種情況，被排出「企業共同體」結構之外的勞工，由於組織力量較為薄弱，抗爭運動容易被控制下來。但萬一抗爭運動的態勢逐步升高，統治菁英階層很可能使出強力的壓制手段，如此原來「企業共同體」制的走向可能又轉回到壓制性勞工政策的老路。

最後，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工業化的推動，除了形成了人數龐大的勞工階級之外，中產階級也會隨之擴張，不同階級形成聯盟連手對抗統治菁英集團的可能性大為提高。這兩個結構性的因子（强有力的獨立工運及新興中產階級）正是直接促成南韓今日工運勃興的重要因素。台灣、南韓、香港、星加坡未來變化的趨向如何？起碼，這兩個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步崛起、茁壯而彼此間又有矛盾衝突的社會勢力，是不能不給予密切注意的。



•理貨業務是由理貨工人以勞動力完成，却受理貨行及船務代理公司的中間剝削。

◎工人廣場◎

罷工有理， 先聲奪人！

——從基隆港理貨工會罷工事件
論「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

一、前言

本文將從兩個論題切入，著手論述台灣勞資爭議的若干基本問題，並作出初步的概括結論。

第一個論題，是最近發生於基隆港的理貨工人，在工會領導下，準備於九月間發動罷工的事件。這個事件之所以哄動輿論，乃因它是

自七月十五日台灣宣佈解嚴之後的第一宗罷工宣示，也是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起公開進行的罷工事件。它在台灣勞工運動史上的意義非凡，值得記錄和評析。

第二個論題，是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最近在中常會上公開宣稱，該黨現階段的基本勞工政策是「主張勞資和諧，但在經濟上，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這個宣示所以重要，乃在於它

和國民黨於一九五六年擬定而實行至今的勞工政策有了顯著而重大的調整。舊政策只強調「勞資和諧」，意即壓制工運，扶植資方。新政策則加了一個「但書」，表示在經濟上，「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這顯然是為了配合台灣的經濟自由化，打算放鬆對勞工的壓制，平衡勞資之間的緊張關係，及改善勞動條件的徵兆。因此，蔣經國的這個宣示，在台灣的勞資關係史上，也有其一定的意義，值得闡述一番。

二、他們為什麼要罷工？

理貨工人在基隆、高雄兩港存在已久，他們的工作和碼頭工人並不一樣，碼頭工人負責搬運堆集在港口的進出口貨物，理貨工人則負責清點和登記這些貨物。兩者都屬於運輸部門的勞務提供者，也都是服務業的受薪工人，但兩者各有自己的工會。過去，碼頭工人較為人所知，工會也比較強大，基隆、高雄兩港的碼頭工會都曾發動過喧騰一時的勞資衝突事件。理貨工人及其工會的存在，是在這次率先預告罷工後，才引起社會的普遍注意。

他們為什麼會罷工？又為什麼要罷工呢？

理貨工人這個行業，表面看來工作比較輕鬆，其實他們的勞動量很大，所受到的剝削也很驚人。首先，當理貨工人必須領有執照，然後，受僱於某個理貨行老闆，才能在港口工作。很多理貨工人做了三十年以上，由於執照的限制，新工人很難更替。他們工作日久，彼此熟識，流動又小，組織性和團結力也就在無形中加強了。

長期以來，理貨工人的勞動情況是這樣的：每天的工作由數十家理貨行安排派工，一天分四工（四班），分別為上午 8 時到下午 17 時（早班）、下午 17 時到半夜 24 時、半夜 24 時到凌晨 4 時、凌晨 4 時到上午 8 時（後三者為夜班），按工計酬，每工薪資相同，但勞動時間不等。通常，雜貨船每工 410 元，貨櫃船每工 530 元，但實際上，工人只能拿到 360 元或 470 元，其餘二成左右被理貨行老闆們拿去

支付稅金和開支。當然理貨行不是只靠這二成從工人薪資中扣回的利潤過日子，老闆們主要的收入來自船東和貨主支付的大筆承攬費，這筆費用是以工人完成理貨工作為條件，而由理貨行老闆獨吞了，工人如果想要多賺一點工資，只好拚命上夜班。夜班與早班的工資相同，但每工的工作時間較短，然而，夜班所消耗的體力以及對健康的損害，却遠超過早班。何況，派工大權操在理貨行老闆手裡，不是每個工人每天都賺得到夜班的錢，即使工人甘願徹夜勞動，也是由不得自己。

(一) 爭議始末

關於勞動量和工資結構的不合理，成為這次勞資衝突的起點，理貨工會的三點要求都與此有關：第一，要求加薪 20%，並且不准資方再扣除二成；第二，要求設定公平合理的派工標準，不得再由資方任意操縱；第三，要求資方設定退休金辦法，保障工人的延長工資和退休生活。這三項要求，其實是積壓多年的老問題。過去數年，工會一再陳情、申訴、祈望得到合理解決，但皆不得要領。問題的癥結到底在那裡呢？這就要從理貨行和理貨工人之間的勞雇關係去追究了。

理貨行是一種承攬服務業，卡在輪船公司和理貨工人之間。輪船公司又有兩種，一種是確實擁有輪船的公司，一種是並無輪船的船務代理公司，後者實際上和理貨行是同一性質，但比理貨行高一級，卡在真正的輪船公司和理貨行之間。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關係：理貨行直接從船東和貨主那裡承攬理貨業務，或者間接從大包商船務代理公司那裡承攬一些理貨業務，然後派工給理貨工人去完成勞務。結果，事實如下：輪船公司或貨主所發包的理貨業務，是由理貨工人以勞動力所完成，而理貨交易金額的大部分却由理貨行和船務代理公司所瓜分，或由理貨行所獨吞，工人只分到與勞動量不成比例的那一部分工資，在這中間，理貨工人受到了雙重剝削。換言之，理貨行與船務代理公司是十足的坐享利潤的中間剝削者。

多年來，理貨工人希望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既與這麼多既得利益者、這麼複雜的盤剝關係糾纏在一起，自是阻力重重，難以如願了。

在這種不合理的盤剝關係中，又夾雜了另一個更不合理的現象。按理，領有執照的理貨工人既在理貨行掛牌聽候派工，理貨行的老闆自然就是雇主，應該為受雇工人辦理勞工保險和支付退休金，但是，問題出在理貨行幾十年來從不承認自己是雇主，以至迄今勞保都是由工會代辦，保費則由工人負擔60%，政府負擔40%。也就是說，依法應該由理貨行負擔的80%保費，却由工人和政府替他們支付了。

理貨行老闆們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理由，是認為理貨工人乃屬一種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工人（與產業工人有別），不一定受僱於誰，所以他們誰都不能算是雇主。理貨行的這種說詞，僅就常理來看，就知是一種詭辯，進一步探究，就更站不住腳，因為理貨工人既被認為無一定雇主，那麼就無須理貨行卡在工人和輪船公司之間憑空剝削，應該取消理貨行，由工人直接和輪船公司交易才對。問題於是變成了這樣：理貨行願承認自己是雇主呢？還是要把自己取消？二者之間必須選一，再沒有胡扯鬼混的餘地。

對於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理貨工人們早就想用罷工手段來作攤牌的一搏了，只是一直受制於禁止罷工的戒嚴令，難以施展。因為，在過去，一旦有罷工跡象，情治單位馬上就會干涉，動輒以戒嚴令這把尚方寶劍壓在勞工的脖子上，後果既然難測，自然無人敢以身試法。現在不同了，情治單位的那把尚方寶劍在七月十五日那天被收回去了。這下，直接干涉和牢獄之災的威脅既已解除，積存有年的「互助基金」（罷工基金）正可派上用場。正如同理貨工會新任常務理事瞿曾傑所說：「幾十年來被綁手綁腳，現在終於鬆開了，當然我們要把陣勢擺開來！」於是，在七月廿三日那天，他們公開宣佈：如果資方仍然不同意他們



●八月十八日下午理貨工會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堅持罷工。

的三點要求，他們就要從九月一日起罷工一星期，必要時延長至二個月。同時，還宣佈了他們的罷工編組，示威辦法與監督措施，等等。八月一日，理貨工會又寄了一份申訴書給那天剛開張的勞工委員會，算是把罷工的決定正式通知了中央主管機關，剩下來，就看當局怎麼面對這個問題了。

(二)問題評析 典藏

剛成立的勞委會對於這個棘手問題的初步反應是，引用正在立法院審議而尚未通過的舊「勞資爭議處理法」，宣稱戒嚴固已解除，但台灣仍在非常時期，不得於爭議中搞罷工。工會的答覆是：罷工是勞工的基本權力，政府不能用落伍的法律來限制和干涉勞工使用自己的權利。

從七月廿三日以來，各有關單位都很緊張，忙著進行幕後「協調」，試圖消弭工會的罷工打算，但皆未能動搖工會的意志。

八月十八日上午，由基隆市政府出面，邀集勞資雙方及黨政機關，再度協調。會前，工會的常務理事瞿曾傑就已公開對外宣稱：勞方的三點要求，絕對不打折扣，若協調破裂，工會將按原定計劃進行罷工。他同時暗示，達成罷工的方式可以變通，但效果相同。

當天上午的協調會，在各有關單位立場偏頗、態度曖昧的情況下，資方恃寵而驕，勞方據理力爭，會場氣氛激烈火爆，終至不歡而散



●理貨工會主要領導人——瞿曾傑。

下午二時，工會立即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作成三點決議：一、堅持加薪 20%；二、要求市政府在八月底以前，作出最後的評斷；三、九月初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瞿曾傑最後站起來宣稱：不准我們罷工，我們就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能說開會不合法嗎？開他個幾天大會，同樣達成罷工目的！

其實，別說開會幾天，資方和官方都清楚，只要全體理貨工人在碼頭上消失五個小時，整個基隆港就得停擺。

爲什麼各單位「協調」了大半個月，仍然落得這個僵局？這首先要檢討各黨政機關在處理這個事件上的心態和出發點。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很清楚可以發現，協調者一開始就是以能不能阻止罷工，而不是以誰是誰非爲著眼點。這種一味擔心罷工的心態，正中資方的下懷，讓他們可以拿翹，協調自然無功。特別是與執政黨有關的協調者，不去探求勞工決心要罷工的緣由，仍以往常那副「凡事皆管，凡事當家」的姿態，企圖壓制工會，甚至約束輿論，這就難怪勞方義憤不平，執意「給他好看」。道理應該這樣講：如果勞方一旦罷工，不論用什麼形式，這個責任都該算在資方和黨政機關的頭上，因爲他們實質上一鼻孔通氣，扭曲了公道。

關於行政機關在勞資爭議過程中所呈現的角色和態度，也必須加以批判。長期以來，各

級勞工事務主管機關，在處理勞資衝突問題上，都有一個共通缺點，那就是專業知識不足，對勞資關係的本質缺乏認識，遇到具體案件，又不肯主動調查研究，以致對爭議事件，大多等到協調會上，才聽取勞資雙方的意見，如此這般，怎可能當場判明是非，拿定立場？當然只好打圓場，竊扯和了。此之所以十次協調，九次破裂。

也有時候，某些年輕的勞工事務官員，肯下功夫搞清楚爭議的癥結，也想爲勞工說幾句話，但就是不敢擺明立場，據理直斷。當然他們也有苦衷，因爲官方的政策是「勞資和諧」，意思是說，官員們必須「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即使明知勞方吃了虧，也是一樣。

說到這裡，我們簡直可以這樣說（也可以說發現了一個事實）：在一個肯定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任何所謂「全民政黨」宣稱照顧勞資雙方利益的政策，一落實到具體的勞資爭議事件上，介入協調的黨政官僚都無可避免的會暴露出損害勞工利益、偏袒資本主利益的實際結果。

爲什麼會這樣？這裡需要一點基本認識。

所謂「勞資爭議」，在一般情況下，多半是因爲資方違法或脫法而起，要不是資方雖未違法，但勞方要求更合理的利潤分配（以及合理的勞動條件）而起，故可以下結論說：凡勞資之間有爭議發生，肯定是勞方有理、資方無理，亦即在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下，絕無可能出現勞工無理取鬧的情形，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是如此。因而，所謂勞資爭議的協調、調解、或仲裁，只應是一個以公權力或客觀力量給予勞方支持，取得公道的介入程序，否則，這些協調、調解或仲裁，必然成爲變相壓制勞方合理要求的手段，根本談不上「中立」。

三、「勞資和諧」與 反對剝削」的對立統一

從上面對理貨工會罷工事件及一般勞資爭議問題的解析，聯繫到蔣經國「反對一切形式

的剝削」的宣告，加以引伸和落實，就可以找出資本主義本質上該有的勞資關係定位和該有的正確勞工政策。

(一)「勞動」與「資本」的辯證關係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是一種商品，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照道理，這個「商品」的合理價格，要由勞動者與雇主雙方立於「對等」的地位來議定，不能把勞動者（勞動力的「貨主」）排除在外面，單純把「勞動力」當成一個「死商品」，拋到市場去決定。由於在商品市場中，一般資本主眼中只看見「勞動力」，看不見「勞動者」，這是「資方」的驅力支配了資本家的眼睛功能的緣故。所以，合理的勞動契約關係，應該首先是要勞動者以「人」而非「貨」的地位，亦即以「勞動力的所有者」的身份，站在資本主面前，對等的來談判勞動條件，因為「勞動」的本質乃是「勞動者+勞動力」，兩者不可分割。

因此，就「勞動」與「資本」的本質而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最合理的勞資關係應當是基於自由主義和自由經濟的原理，按照勞雇關係是勞動契約行為的這種本質，亦即依據「契約自由原則」，讓勞資雙方擁有「對等的武器」，進行勞動條件的討價還價。也就是說，讓資方擁有經營權、管理權和人事權的同時，也讓勞方擁有組織權、團結權和抗爭權，以及作為以上三權之後盾的罷工權，從而，盡量減少行政權力介入勞資爭議之中。必須介入時，就一定是支持政治、經濟上均居於弱勢的勞方，如此，才符合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法則。這個道理在於，資本主義體制下「國家機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當勞方居於劣勢時，站出來支撐勞工一把，以穩定勞動契約之公平性，進而恢復符合這個制度所需要的「勞資和諧」狀態。

蔣經國在「勞資和諧」的原則下，又加上一條「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其政治經濟學的義理，就在這裡。這是糾正舊勞工政策，對應新經濟情勢的正確提法。

但是，國民黨中央的這個「現階段黨的勞工政策綱領」，却在中常會上遭到了從來不提反對意見的經濟官僚和大企業主們的公然抗拒，說什麼會打擊投資意願、會影響社會穩定、會寵壞工人群眾，等等奇談怪論。他們過去在黨的有關勞資問題的討論上，態度從來都無異議，而這次却斗膽爭相反對呢？原因無他，「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觸及他們的「資本神經」了。凡到手的，就要緊抓，能不丟掉，絕不罷手，這是資本家的本能反應，完全合乎「資本的法則」。蔣經國最近在會議上大罵黨內有不少人消極、落伍、自私自利，看來一點都沒有罵錯。

(二)「資本邏輯」的兩面一體

有人也許以為國民黨的新勞工綱領，以及上述的引伸意涵，是社會主義原則的表現。其實，包括民生主義和西方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在內，本質上都不過是依據自由主義的原則而非社會主義的原則，更進一步的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應有的勞資關係的倫理而已。在這個倫理法則和契約自由原則下，合理工資的最低標準，應足夠維持一家四口（配偶和二個子女）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最高限度，是讓資本主在不倒閉的情況下，賺取最少的利潤。在「資本的邏輯」下，這種合理的勞資關係，既不致於使資本主義私有制因之崩潰，也不會讓社會財富的積累因此而減縮，原因在於這種新的勞資關係並未超越資本主義的法則規範。所以，嚴格地說，它們跟社會主義的實踐之間，扯不上多大的關係。

概括的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才可能保證實質的「勞資和諧」，也才可能在一定的條件和形式，維持和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當然，也許社會主義的胎兒也已孕育其中，果真如此，那只能說是社會發展的內合法則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使然。就資本主義之為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言，是不能因此而規避自己的發展軌跡和命運的，否則，肯定結果還是一樣，也許更痛苦。

◎工人廣場◎

反對凍結 計程車牌照

■林賢仁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二點，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工會到交通部抗議：全面凍結計程車牌照不得過戶給司機的偏袒車行的不合理政策，以及七月一日實施違規加重記點罰則的不重視民情的官僚作風。

「凍結牌照」偏袒少數剝削者

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工會理事長何賢德指出，全面凍結計程車牌照不得過戶給司機的政策與政府允許計程車司機脫行成立個人行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是完全袒護車行，使車行永久擁有車牌的控制權，司機也永遠不能再脫行，註定要被車行剝削終生的不合理政策。

而且，靠行制度不但沒有給計程車司機任何保障，反而是車行剝削司機的護身符。政府不應該只偏袒少數的既得利益者（車行），而不照顧多數受到不合理的制度剝削的計程車司機的權利。在靠行制度下，計程車司機的財產權、工作權都得不到保障，司機自己出錢買車，牌照卻屬於車行，車行往往利用牌照向銀行抵押貸款，司機對車子的財產權受到侵害；車行對尚未脫行之司機動輒威脅要強制拆牌、扣車、逾期檢查車輛、收回牌照，甚至向監理單位繳銷牌照，計程車司機的工作權沒絲毫保障，卻一任車行胡作非為，公理何在？

何賢德表示，去年八月四日，他們到交通部抗議靠行制度，政府亦隨即公布計程車司機脫行施行細則，然而至今只是徒成具文，未見施行，這是司空見慣也就罷了，不料現在政府又公然袒護車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決定再到交通部去抗議，要求交通部長說明。

對新訂勞工政策的一大考驗

另外，對於七月一日實施的交通違規加重記點罰則，何賢德表示，政府應該先從交通道路、標誌、整體的規劃做起，不可倒因為果。所以也在抗議之列，希望政府延緩施行。

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工會是第一個由勞動群眾為爭取自身權利而組織起來的自發性工會，他們從自身的處境，認識到所有不合理的剝削。勞工從深刻的體驗，才能對不合理的制度提出最有力的批評，也只有從他們經驗累積起來的智慧，才能夠指出什麼樣的制度才是最合乎他們需要、最合理的制度。計程車司機對靠行制度的抗議，與其所提之替代方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去年到交通部抗議靠行制度所提的六大堅持，即無一不切中靠行制度的要害。八二八的抗議，他們更提出了十一項「根本解決之道」：

一、凍結牌照過戶，必須先將牌照收歸國有，然



後執行有車就有牌政策（一如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等均富政策）。

二立刻廢除靠行制度（牌照收歸國有時自然消滅），所有個人車業必須加入服務業，以符合公路法55、56條的規定管理。

三服務業因無資產，只是服務性質應編入職業工會管理，以免變成靠行的替身。

四計程車只是司機的營生工具，不應另參加商業公會，形成勞資雙重身分的矛盾。

五廢除受僱、解僱的不實際政令（因車行已經20多年不再聘僱司機營業）。一照專用，不必定期審驗，剝奪生存工作權。

六車輛產權過戶問題應做政策性協調，或由工會配合社會局做整體性司法救濟，在清償債務後，由監理單位自行辦理過戶，發牌照給司機，不可再補新牌給車行，增加車額。

七如牌照收歸國有難行時，只有全面開放營業牌照，讓大家公平競爭。

八適度調整表價、執行計時、計程表價，並分日、夜兩班制，以疏暢交通。夜班應適度加收表費。

九標準計程車須新車，舊車應在五年內自然淘汰。但須配合無線控制呼叫器，由服務業指揮，工會管理。

十暫緩執行七月一日交通違規記點加重罰則的命令。重新檢討廣納民意，尊重司機工作權

、生存權先從交通道路、標誌整體的規劃作起。疏暢交通流量，必須等台北區捷運系統完成後再來執行，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二應由工會全額辦理司機的失業、退休、傷亡、子女教育及乘客、車身外傷亡之保險，使司機得到生存、工作權及消費者乘客安全的完全保障

近月來政府信誓旦旦，聲稱要保障勞工權益，為勞工服務，八月二十六日執政黨通過的「勞工政策綱要」中，也明載要「維護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我們「聽其言而觀其行」，執政黨與政府是不是真心想為勞工謀福？計程車司機的牌照問題如何解決？是塊試金石。

• 勘 誤 表 •

本刊第三期

P. 12 第二欄第 9 行

“中間偏右”乃“中間偏左”之誤

P. 15 第二欄第 1 行

黨“首”大會乃黨“員”大會之誤

P. 14 第二欄第 5 行

“謝春水”應改為“謝春木”

P. 13 第二欄第 21 行

“唯上無二”應改為“唯一無二”

P. 60 第一欄第 13 行

“九七年”為“七九年”之誤

◎世界之窗◎

美國會實行 軍事戒嚴嗎？

■江海晏

據近日的報導，美國伊朗軍售醜聞主角諾斯中校，在1984年曾協助起草軍事戒嚴法，但早在六〇年代末期，美國學生運動高漲時，雷根及其幕僚即策劃軍事統治美國。從雷根政府的所做所為美國實行戒嚴實不無可能。

講到軍事戒嚴，總會聯想到第三世界的獨裁統治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國政府也已草擬戒嚴法。

根據今年七月Knight Ridder Newspapers的報導，伊朗軍售醜聞主角諾斯中校在一九八四年曾經協助起草一項軍事戒嚴法。這項計畫準備下令停止憲法，把政權移交給「聯邦緊急管理局」，任命軍事將領接管州政府，並

頒佈實施戒嚴法。

由於諾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乖張行為，他偏執地認為只有他和一小撮愛國者致力於防止共產主義吞噬美國，他這種對軍事統治的狂熱，被視為是他在雷根政府中個人的狂亂行為，這可能是何以紐約時報並未報導此事，國會聯席委員也未詢問諾斯此事的原因。

但是隨著伊朗軍售醜聞的發展，有許多跡象顯示諾斯的癡狂行為絕非個人的行為，對於草擬戒嚴法亦非諾斯個人單幹，早在六〇年代末期學生運動高潮時，雷根及他的一些顧問即耽於軍事統治美國的可能性。

對軍事統治的狂熱，絕非個人行為

「聯邦緊急管理局」（簡稱「聯管局」）的構想並非源於諾斯，一九七九年成立的「聯管局」是準備在發生全國性災難時（如核戰），用以保持政府運作的連續性。當憲法程序無法運作時，只有軍管才能保持政府運作，所以「聯管局」的計畫是由軍方負責，諾斯的「貢獻」是設想出政治性的情勢（如針對美國對外

● 伊朗軍售案主角：諾斯中校，也是軍事戒嚴法的起草人。



高雄 76年 9月號

軍事侵略所產生的全國性反對運動），以實施戒嚴法，使戒嚴法實施的機會大為增加。

防衛資訊中心的約瑟·克德說：「政府的連續性」是個關鍵術語，如果提起了戒嚴法，五角大廈和聯管局都要背上了黑鍋。所以一切緊急應變計劃都冠以「保持政府連續性」的名義。

從聯管局索取更多的資料非常困難，在對外關係上聯管局只強調他們在天然災害一如地震、水災之類一時的功能，問及「政府連續性」的問題時就諱莫如深。聯管局的現任主管，前三星上將白克頓，並非內閣之一員，但是直接隸屬於總統。聯管局完全不在國會的監督之下。一位聯管局官員說：在緊急狀況時，為了維持政府連續性，總統得以行政命令秘密的採行這些步驟，以維持國家安全。白克頓也說：「行政命令無須經過國會同意」，也就是說，

總統可以宣佈緊急狀況，然後根據他秘密批准的戒嚴法等等實行緊急統治。

無須國會監督是一句諾斯最愛聽的話，聯管局官員承認在 1982 至 1984 年間，諾斯中校曾和他們保持連繫，以履行他在國安會的職務。

其實比起雷根總統和他的一些主要同僚，諾斯在計劃戒嚴法上只算是個新手，雷根等人早早就很認真而且具體的在掉弄戒嚴法這個觀念。

根據一篇 1975 年發表，但是被遺忘的文章（由萊登豪所完成，刊載於亞歷桑那的「新時代」上），雷根在 1968 至 1972 加州州長任內，組織了一系列的「戰爭推演」，牽涉到了州及地方警察，加州國民兵，以及美國第六軍的部份單位。這個暗號叫「結綫行動」一號，二號及三號的演習，目的是訓練這些單位如

●美國的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何實行戒嚴法。

透過了行使「資訊自由法案」的權利，萊登豪獲得了關於這些演習的報導，包括參與者的演講內容。其中之一就是雷根州長，他在「結綫行動二號」的秘密開幕式中，對著來參加的五百多位軍警主管們說：「你們知道，本州的某些人如果知道了這個集會以及我的參加，一定會認為他們最就心的事情發生了一一我在計劃軍事接管」。

必要武力原則是戒嚴統治的唯一規範

在一個演習後的總結報告中，雷根委派的負責人說：「我們必須改進我們對於州內從事革命運動人物的調查，驗證和起訴的能力，我們必須加強照像圖證，加強非管制官員的蒐證工作，因為他們可隱藏身份自由行動，俾能起訴那些挑起校園及街頭衝突的人。」

這個講員是雷根的機要秘書，現在的司法部長，愛德溫·密斯三世。他又說：「儘管有人認為這是我們對校園反戰活動的過度反應，但是這個演習就是目標，因為從長程上看這是唯一可以使我們戰勝的方式」。

另外一位「結綫行動」的重要人物是雷根的加州特別訓練學院的負責人路易·裘英利達，是他替州長的戒嚴法發展出一套理論和實踐出來。他在一本訓練州警和國民兵的教材（騷動控制的法律面）中寫到：

「戒嚴統治不是憲法或是任何法規所可以授權，它是由高級軍事將領，在認定文人政府已經不能運作時，決定實施的（並非宣告實施

）。戒嚴統治的關鍵所在，就是當民間騷亂發生時，將政府控制權由文官完全轉移給軍人，不需任何形式的公告或是宣告。政府的運作中有許多嚴格的限制和程序要求，在戒嚴統治中就完全不存在，唯一的規範就是必要武力的原則。」

裘英利達很自然的就進入雷根政府，1981年起接掌聯管局，直到1985年因為涉嫌假公濟私，被迫辭職。

美國總統是否可以命令方式實施戒嚴法？根據司法部發言人的說法是否定的：「根據美國政府規章第七款，軍人不得介入執法行動」。儘管如此五角大廈似乎並不為所動。1981年國防部指令上寫著：「在戒嚴法宣告地區，軍事資源可以用來行使地方執法行動。通常情形下，戒嚴是由總統宣告，不過如果缺乏此一法定程序，而地方文人政府已不再能履行職能時，地區高級軍事將領亦可逕行實施戒嚴」。這個指令是由當時的國防部次長卡魯西所擬一一現在就任雷根的國家安全顧問以清掃諾斯，龐得特，麥法蘭等人留下的爛攤子。

哈佛法律教授德瑞克·貝爾說「是否有超越憲法的正規程序是無關緊要的，憲法的保障只有在現實狀況不危險時才存在。如果一般大眾或是當權在位的覺得現實狀況是危險的，我們就會在這裡見到第三世界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檢視這個政府在中美洲所做的事情，在尼加拉瓜海港佈雷，非法運送武器給尼加拉瓜叛軍，我們很有理由擔心戒嚴統治在此地出現是有可能的。」



◎環境保護◎

爲了鄉土，只好自救

——後勁居民抗議中油污染事件

■蕭艾

台灣的公營工業向來是環境污染的主要禍源。中油公司的輕油裂解廠四十年來，為害高雄居民甚烈，地下水源、農作物、人民身體無不遭受嚴重戕害，後勁居民苦不堪言，終於在官方擬建五輕裂解廠之際，爆發了怒吼。



- 與後勁村落僅一牆之隔的廢氣燃燒塔當地氣溫於深夜升高到 38℃
- 8.13.晚，後勁居民在鳳屏宮前廣場要求中油改善污染，並撤消五輕興建計劃

多人，大舉展開的環保自力救濟行動。

原本在七月初，抗議行動初步發生時，只有當地十數名少壯輩的居民參與。不到一個月期間，却迅速擴張為老幼婦孺齊上街頭誓死控訴行動。後勁地區的居民飽嘗中油的污染苦痛之餘，為何會選擇這個時刻，在一夕之間，動員全體的居民進行毫不讓步的抵制呢？為何污染的事實早經證實，並嚴重危害人體健康、作物成長，而在過去這麼漫長的歲月中，只是默然無告或消極陳情呢？

有人暗中陳情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暗示，這背後有一支看不見的政治「黑手」在控制。居住當地的一位王姓工人，在圍堵的現場表示：他的祖先世代代都在後勁以務農為生，直到這一、二十年來，因為煉油廠內早已設置的一輕與二輕裂解場，開始嚴重污染地下水源，農作也遭廢氣殃及，才被迫放棄農田的耕植。他目前已轉行到工廠做工。「我們遭受的災難太大了！過去幾次陳情都石沈大海，現在環保意識已經普遍覺醒，我們才決定出來抗爭到底」。他略帶威容地緩緩陳述這麼一段家族受害的歷史過程。

至於，是否有政治勢力的介入，雖然長久

一幅幅書寫著「中油是罪魁禍首、誓死護衛鄉土」、「被糟踏的後勁、公害 40 年苦楚啥人知」、「五輕——不定時炸彈」的白色布條，秩序井然地擺置在中油高雄煉油廠的西側大門口；最令人側目的，則是與這些標語對街而立，豎立在門口正對面的一條白布。上面以紅色的筆跡簽滿了姓名，抗議性的標語寫著：「以鄉土前途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抗議行動與日壯大

這是後勁地區居民，在隱忍中油裂解輕油造成四十年污染之後，首度集結整個社區四萬



● 作物受煉油廠污染的農家，常只能領回原成本二成的賠償金

以來一直備受各界關注，但直接參與其事並擔任此一抗議行動幕後策劃工作的黃天生，堅決否認這樣的說法。他並且認為，這是有心人的惡意中傷，希望藉此醜化單純環保運動的卑劣行徑。

他因為身為民進黨員，身份較為特殊與敏感，自然容易引來莫須有的敵意。不過，他却坦然地表示，這與政治運動或民進黨都絲毫無關，只是後勁地區民衆為保全身家性命而自發的環保自力救濟行動。

「這次行動中的重要幕僚人員，便有兩位是當地的國民黨籍議員。由此，可以證明這是單純的生態運動」他說。

果真如黃天生所言，後勁居民這次抗議中油增設五輕裂解廠，與政治完全牽扯不上關係的話，那麼，抗議聲浪的轉瞬波濤洶湧，就更令人尋思了。

環保意識急速上升

事實上，單從整個抵制行動的外觀看來，後勁居民環保意識的急速上升，應該是可以尋出其近因和遠因的。

就近因而言，一度引起輿論嘩然的油雨事件、目前尚事實俱存的水源污染與夜間噪音，都屢屢在居民的心中埋下厚重的陰影。另外，前不久煉油廠發生火災的駭人景觀，也讓與廠房毗鄰而居的後勁居民，深深感到恐懼無比。

也因此，當廠方在目睹圍堵、抗議行動與

日壯大時，所提出的環境保育、評估計劃，諸如：已聘請國內外兩家公司，進行周詳的環保規劃、準備動用四十億元進行防止污染措施等，都全面遭致當地居民不予採信的反撲。因為，一輕、二輕四十年來的污染，已經是無法挽回的悲慘事實，現在又要加蓋五輕，更加強化長年已經讓人忍無可忍的災害，這是居民們普遍對中油公信力喪失信心，並拒絕聽信廠方任何允諾的直接反應。

再就遠因來說，廠方在施工前核准設廠的階段，並未知會當地居民，因而導致民衆群情沸然，不得不採取先予阻止的自力救濟行動，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鹿港反杜邦運動中「先發制人」的自力救濟模式。

兩種模式帶來啓發

鹿港人曾以單純的反公害生態運動，透過全民表決的誓死抵制行動，將美商杜邦趕離彰濱工業區。後勁居民在觀賞「反杜邦」的幻燈片展之後，率皆大表讚嘆不已，認為此一前例帶來莫大的鼓舞力量。因此，以抗議行動先行防止其再添新廠的群體意識，與日高昇起來。

除了「反杜邦」運動之外，新竹水源里居民以石堆圍堵李長榮工廠的自力救濟模式，也是影響後勁居民決定封鎖中油西側門的重要原因。他們將抗議的白布條有秩序地排開，並預留通道方便廠裡員工的上、下班；無論日曬雨



● 村民日夜輪班守顧油廠西大門的抗議布條

淋，都有居民前來輪流值守，還經常出現有人運來免費解渴飲料的場面。這又是曾經在水源里李長榮化工廠門口，讓人異常熟悉的親切景象。

兩項反公害運動的鮮活例子，帶動後勁居民由長期的噤抑、忍耐轉而為勇敢、強勁的堅決抵制，已然說明環境運動的連鎖性併發，正跟隨著意識的覺醒逐漸蔓延開來。工業污染正好比一場巨大的夢魘一般，重重逼壓在人們的現實生活當中。

當鹿港人走向街頭、張貼巨幅看板時，他們曾經納悶而苦惱地自問：難道台灣非得接受先進國家輸出的污染不可嗎？

當水里源的居民圍堵廠房大門時，他們也曾以堅拒讓步的態度，表示非得讓李長榮停工不可。

訴求層次亟待提升

目前，鹿港人已經透過反杜邦運動，在去年迫使杜邦撤消在彰濱設廠的計劃，更成功地為環保自力救濟運動豎立了良好的典範；而李

長榮也已在新竹市府的協調之下，答應停止排放廢水的生產作業。

至於，後勁居民的反五輕行動呢？由目前尚在進行的抗爭來觀察，顯而易見的，整體模式是受到上述兩項反公害運動的啓示。然而，環保運動的實質內容，是否也像鹿港反杜邦運動一般，漸次提昇自救的訴求內涵，揚棄口號式的謾罵，進而檢討到中央決策與地方民意矛盾的問題呢？這些容或都還有待加強罷！再者，後勁地區民衆面對的是身肩石化工業重任，且被政府編列為 14 項經濟建設的中油公司，這與水里源居民抗議李長榮事件，單就營業性質的輕重而言，就有天淵之別。

未來，後勁的圍堵行動，必然是一項艱辛的課題。如何讓環保運動歸位，避免空洞、無謂的政治性言辭的吶喊，同時，也在提昇訴求層次的方向上，不斷因應客觀情勢發展，期使國營企業的中油，重視嚴重的污染問題，並儘速謀求改善的方針，以尊重並親和民意，將是決定今後後勁居民生活品質的重要關鍵。

◎人 物◎

張深切與

台灣新劇運動

■鍾喬

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呼應祖國新文學運動中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做為新文學重要一環的台灣新劇運動，也反應了同樣的精神。

民族主義者張深切，除了從事民族解放的抗日運動外，更在新劇運動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一八九五年，對台灣同胞而言，是夢魘重重的一年，就在這一年，腐敗的清廷訂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歸屬於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等於宣佈台灣和祖國斷了臍帶關係，從此，得苟延殘喘於異族的支配之下，這對當時有氣節的知識青年而言，當然是莫大的打擊。由台胞所推動的政治、社會運動，也就在這備受打擊與屈辱的情況下，一波一波展開了。

參與英勇抗爭的文學行列

由唐景崧、劉永福的「台灣民主國」到簡大獅、柯鐵虎的游擊抗日乃至壯烈的「西來庵事件」，這一系列以武力與日本人鬥爭的階段，台胞抗日志士曾流過多少鮮血？犧牲多少性命？實難以數計。降至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後，由於民主、自由的思想與「民族自決」的口號響徹雲霄，台胞在飽嘗武裝鬥爭的血腥、恐怖之餘，開始以文化運動做為抗日的武器，舉凡「六三法撤廢運動」、「議會期成同盟」、乃至「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成立，都一再地證實了台灣民族運動已步上成熟的、現

代化的階段。就在這個時期，作為台灣文化啟蒙運動下一支尖兵的「台灣文學」，也揭起了反帝、反殖民的大旗，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英勇的思想抗爭。

在這英勇抗爭的文學行列中，許多優秀的作家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反殖民體作品，為抗議總督府的專制統治，發出了良心的吶喊；更有數不盡的文化工作者，為了擊破社會階層的層層壓迫，透過文字和行動，持續不絕地展開社會運動。楊遠曾寫下「送報伙」、「模範村」等小說，指控日據當局的高壓政策，還親身參與農民運動即是最好的例子。在當時，眾多的抗日志士是以文學來實踐抗日的思想，再以行動來哺育創作的泉源。張深切也是以這樣的精神，為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張深切生於一九〇四年，他出生的那個年代，正是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締造了所謂統治根基的時候。前此，在馬關條約訂定後不久，日本政府一度以軍政統治，鎮壓台灣同胞，還調動了五個師團的兵力，將島內的武裝抗日力量盡數瓦解。在高壓政策的逼迫下，「當時的抗日志士，從山上被騙下來，殺的



殺了，押的押了，編入「匪誌」的也都被編上了」。

愛日反日仇日的心路歷程

反抗異族高壓統治的支配，進而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是殖民地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一生奮鬥的理想和目標。張深切在他幼年的時候，就曾目睹日人對台胞的殘害，這多少影響了他日後堅決抗日的思想罷！的確是如此，在他青年留日求學期間，會激烈地投向抗日爭鬥的潮流中，數度入獄，甚而險遭槍決，都與他童年的親身經驗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然而，認真的追究起來，民族主義情懷真正在他心中萌芽，却是留日期間，由一心想做日本人的迷夢中驚醒過來，並深深體悟到，既是亡國之民就永遠得不到尊嚴，永遠要在不平等的情境下，做支配者的奴隸。在此後求學的歷程中，他更認識到「以前，我不知道中國歷史是什麼，台灣人是屬於什麼人種？自讀了中國歷史以後，才知道中國的偉大，和認識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時的張深切更堅定他的抗日思想，一心以反對日帝為職志，「把愛日本改變為恨日本，進而發展到仇日」，終而演至和他們展開行動的鬥爭。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更加緊步伐擴張勢力範圍，意圖以武力侵犯鄰近弱國，台灣、韓國相繼淪為殖民地，更鼓舞了日人向外侵略的野心。一次大戰以後，因應整個國際政局的譎變，日本開始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此時的中國，非但備感外力傾壓的威勢，已達到無法容忍的地步，國內軍閥的割據，益陷局勢於危殆之中。處在這內憂外患交逼下的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便是民族精神的再造了！在那烽火漫天，硝煙四起的年代中，多少熱血的青年投入了改革的行列，為抗日奔赴戰場！就剛由傾日的迷夢中醒來的張深切而言，這些是何等深刻的震撼呀！他親聞祖國在危急災難重重壓迫下，百姓民不聊生，飽受外來鐵蹄的踐踏，於是決意中斷日本的學業，毅然重回母

國的懷抱。民國十二年，他「初踏祖國的大地，覺得異常溫暖，滿腔的熱血沸騰了。」

決心投入廣州革命陣營

然而，祖國河山的狀況又是如何呢？外侮內亂早已讓美麗、遼闊的江山，淪為滿目瘡痍的受難之地。政治腐敗、社會落後，屢次令他感慨不已。原本在想像中是十里洋場、繁華富裕的上海，現在「每天早晨附近一帶，臭氣薰天，洗馬桶的聲音，哩哩咧咧不絕於耳。」而那些「租界裡的闊人，住洋樓，使用西洋衛生馬桶，洋洋自得，看租界外的同胞，若異國人，若豬狗牛馬，絲毫沒有相憐的觀念。」看到這些不堪入目的情形，他只有更傷痛欲絕了。只是，他雖然悲忿，却不曾因此喪失信心。一次，在租界的小公園散步時，被印度警察喝斥並要趕走他及兩位朋友，他又羞又惱地和印度人吵了起來，說到：「印度和中國同是被壓迫民族，英美都是帝國主義者，租借中國的土地，而不讓中國人涉足，太沒有道理了，未免欺人太甚。」

此後，他由積鬱滿腔的悲憤，轉而積極從事實際的反日運動，與范本華、彭華英、林維金等台灣抗日份子連繫，在所謂「始政紀念日」上，發表「國恥紀念日」演講，攻擊總督府的施政措施，並揭露日人壓迫台胞的行徑，宣言唯有革命，才能解救台灣。會後，還散發了傳單，將之郵寄到上海、東京、北京、南京、廈門、台灣等處。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提出革新的見解，儼然是一革命政黨，這吸引了不少有良心



● 星光新劇團是日劇時代相當具代表性的演劇團體。

的知識青年，紛紛南下參與抗日建國的行列。張深切在痛感民族尊嚴亟待恢復的狀況下，經由南京、蘇州，懷抱着「義無反顧、臨難不悔的心情」，決心投入廣州革命陣營。

十四年底，他滿懷著熱血，來到了傾慕已久的廣州，先是寄宿在好友家中，認識了不少在中山大學與黃埔軍校就讀的學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北伐、抗日和台灣的狀況，氣氛異常熱絡。目睹情勢大有可為，在幾經會商之後，終於決定成立「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由張深切、林文騰、張月澄、郭德欽、洪紹潭等五人任「聯合會」委員，這是民國十五年年底的事了。

「聯合會」成立，採取強硬、不妥協的姿態，誓意與日人對抗到底，對當時在台灣島內成立的「文化協會」，也表明批判的態度，對所謂「議會請願路線」，打算加以完全的清算。一個團體剛組成不久，結合的會員又混雜不清，包括學生和社會人士，自然容易造成意見的分歧。此時，張深切又因樹大招風，屢遭攻訐和猜忌，「聯合會」終於在十六年舉行例行大會時，宣告擴大組織。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全體會員贊同，仍推舉上述諸君為新團體會則的起草委員，更改會名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青年團」成立，積極主張「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相提携，以求全世界輿論的支持，先

行達到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然後再重歸祖國的懷抱。」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印行了「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日敬告中國同胞書」的傳單，大意是說：「三民主義的偉大，足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心寒膽顫……中山先生雖然逝世，但其偉大精神還在，希望中國民衆團結起來援助台灣革命，認識台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台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同年春末，適逢英、美、蘇、法四個勞工代表團，為鼓舞中國革命，組團訪問廣州，各地弱小民族都指派代表參加，並在東校場舉行示威大會。「青年團」指派張深切前往發表演說，獲得各界聲援。這以後，祖國的革命先輩經常主動幫助，指導，戴季陶先生也曾受邀演講「孫中山先生與台灣」，鼓舞台灣青年與朝鮮及東南亞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戰。四月間，「青年團」創刊機關報「台灣先鋒」，宣傳抗日主張，引起熱烈的呼應，後被日人檢舉，只辦一期就停刊了。

「青年團」為同胞抗日疾聲高呼，同時，也不忘參與祖國革命，舉凡陳炯明事件、北伐遠征、濟南事件，都曾介入。部份團員如陳振同、楊春錦還在北伐中壯烈陣亡。國民革命軍先後擊敗吳佩孚、孫傳芳，勝利的消息不斷傳來，為配合客觀局勢的發展，「青年團」指派張氏返台工作，並籌募革命基金。

回台策動學運，被捕下獄

五月間，張深切返台，適值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高雄大罷工，震驚南部一帶；台中一帶的學潮，也頗有可觀。在一番巡視、考察之後，幾位台中一中的學生，由於過去參加過「華南旅行團」，與他稍識，便私下前去拜訪，邀他擔任「罷學作戰委員會」的總指揮，領導學生與校方對抗。

不幸，一次轟轟烈烈的學潮，終於在日警的鎮壓下，被迫停息下來。為此，「青年團」還發表文章，猛烈抨擊日方。也就在此時，國民黨開始清黨，「青年團」也受了「池魚之殃



」，不得不解散。這剛好給日方一個檢肅的機會，在各地佈下天羅地網，緝捕抗日人士，張深切因學潮的關係，被判了三年徒刑。

由於接受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指派，回台策動台中一中的罷學運動，不幸受到日警的檢舉，終至被捕下獄，在獄中待了三年。出獄後不久，深感自身從事政治運動，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更反省到三年半的牢獄生活，「本來只看得見社會的表面，在這裡才瞧見它的裡面。本來相信好的就是好，壞的就是壞，在這裡才領悟了好的也有壞處，壞的也有好處。」終於，決意暫時脫離政治活動，意圖在思想上多做努力。這時，他「利用生活中虛脫的期間，組織了一個『台灣演劇研究會』的話劇團，這一劇團的組織，是根據我過去常在報紙上主張『文藝大眾化，須從演劇做起』的理論拿來實踐的」。

張深切組織演劇社的初衷，是爲了推廣文藝大眾化，更藉此「從舞台上喚起民衆和文盲」，這在思想基點上，多少附帶了濃厚的社會意識，此種在作品中強烈呈現社會情感的傾向，漸漸地又與他一貫的民族主義精神結合，自然造就了他反帝、反殖民的戲劇風貌。他在民國十八年之後開始正式踏入劇壇，當時，台灣的新劇運動，已歷經民國十二年成立的「鼎新社」到較後期的「星光社」、「民烽劇團」和「彰化新劇社」等演出活動，可以說正達到高峯時期。然而，這一切的戲劇活動，似乎仍未符合他的理想，在他心中「台灣還沒有所謂真正的话劇，只有亂彈、四平、九角仔（高脚戲）、採茶等的舊劇及所謂『文化劇』。台北方面雖也有話劇組織，却還未達到本格化的水準。」

顯而易見，由文化協會支持下的較重要的劇團——一般稱「文化劇」——他還是不甚滿意，在他的認識中，這些劇團推出的劇作，都尚未推至本格化的水準，意即，缺乏以戲劇來推展社會運動的內涵，對前述那些劇作表現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情懷，他抱以深深的懷疑。

經過了幾個月的訓練，演員們都將劇本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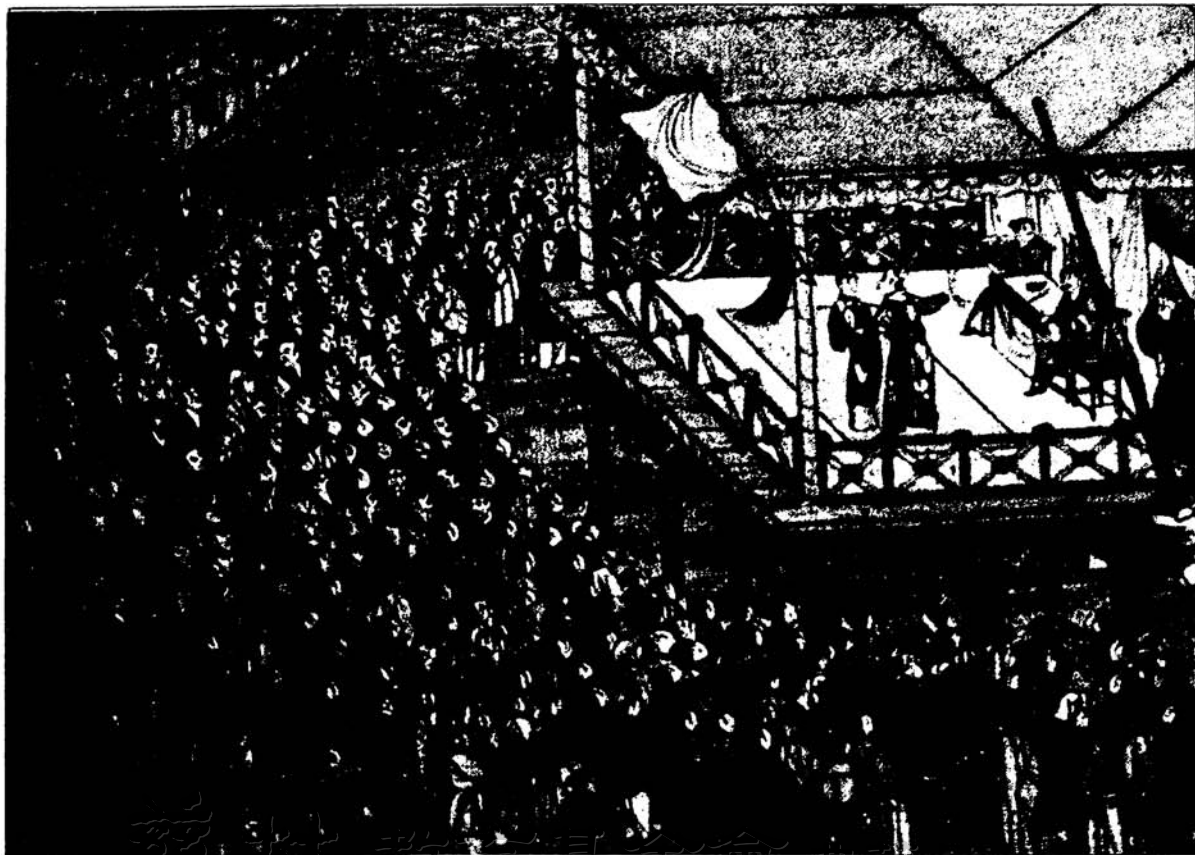
得滾瓜爛熟之後，由於演員們鬧著希望公演，終於決意在台中市的樂舞台舉行首度的公演。這次的公演，推出了他所編的「暗地」和「接木花」等二劇，這兩齣戲果真實踐了他的主張與對其它劇團的批評。「暗地」大膽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毫不留情地指控種種不義、不公的現象；「接木花」則「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諷刺台灣的命運」。一時，造成空前轟動的景象，受到多數台灣同胞的喝采，這自然招致日據當局的忌恨與不快了，「開幕前，便擠滿了觀衆，警察署加派警察和『臨監官』各帶劇本嚴陣以待，警告我們不得超出劇本台詞，否則即時中止。」

警察的監督和干預，多少折損了他的銳氣，更讓演出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在經過幾次的抗議之後，「接木花」難逃遭禁的悲慘命運，四部劇「暗地」則「秋部應刪除，冬部須看了劇本另議」。

既然飽經日人的檢舉，而他又不願編寫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劇作，更不可能以戲劇演出去討好當權者，在接受通知之後，他隨即展開佈署工作，安排「暗地」一戲的大規模試演，希望藉此避開日人的耳目。這次試演，照樣是讓整個劇場擠得水洩不通，俟日警前去制止時，演出已經開始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日警只好任其演出了事。

戲劇生涯中重要作品

做爲一位戲劇運動推動者的張深切，在他寫作劇本的生涯中，曾留下幾部作品。其中包括上述的「暗地」、「接木花」和發表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七號的「落蔭」；另除了舞台劇



●清明上河圖所繪製的民間劇場景觀，是民間文化的一部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陸續遭致禁絕。

本之外，光復後，因著電影事業漸在島內蓬勃發展，他還分別寫了「兩世姻緣」、「遍地紅」與「邱罔舍」等電影劇本。「邱罔舍」曾獲第一屆金馬獎最佳故事獎。

就目前僅存的這些劇本當中，「遍地紅」與「落蔭」是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遍地紅」以霧社事件為劇作鋪陳的背景；「落蔭」則側重於對封建陋習的批判。

日人統治台灣五十年期間，在經濟上雖為便利發展壟斷資本，多少採取懷柔政策，企盼藉此收攏台胞為帝國的經濟利益效命。然在絕大多數的統治時期，懷柔只是遂行收刮的手段，為了便利殖民政務的擴張，政治上的高壓仍屢見不鮮。而政治上的高壓，經常是與經濟支配的掠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存在。這最主要又都表現在警察的橫暴、斂財上。警務機關的絕對主宰權，專事透過不法門徑，欺壓善良百姓的事實，早已迫使當時在台灣的人與原

住民，淪入萬劫不復的悲慘處境。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表達了貧農秦得參備受日警辱蔑，終至自殺身亡，是殖民地人民痛苦生活的一個側顏。楊逵的小說作品「送報伙」之前半段，同樣是交代日據下台灣一般中、下階層的人，無法脫離會社剝削的歷史寫照。

警察的橫行專制、生殺予奪，造成的結果，便是深陷百姓「終日未曾離水火」的困境之中。這對當年的漢人是如此，對普遍的原始住民更是切膚之痛的事實。「霧社事件」便是在台漢人結束武裝抗日，開始以非武裝模式與日人抗爭之後，發生在台灣山地，一樁可歌可泣的原住民與日據政府武力抗暴的歷史事件。此一備受國際矚目的殖民地人民起義事件，發生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居住在霧社一帶的山地同胞，利用日人集中到公學校觀賞一年一度的運動大會，當上午九時，日本國歌唱到一半時，起義的山胞衝進會場，展開他們反抗



暴政的行動，三百多名山胞殺了一百三十六名日本人。台灣總督府獲知消息，立即發出「討伐」諭告，戰爭持續了二個月之久，日軍以新式武器砲轟，飛機轟炸，甚至以毒瓦斯為武器。霧社山胞喪生者高達百分之五十八的比率（一千二百三十六名減至五百十三名）。

「霧社山胞，固然是未啓發的野人，但他們因為未受文明狡詐的渲染，所以他們異常純真而且富人性；他們明知抵不過文明利器，必須玉碎，然而爭取人性的尊嚴，不計成敗利鈍，不自由毋寧死——這種精神，文明人雖言之鑿鑿，行之維艱——霧社山胞却以實際行動表現了。」張深切在劇本的自序文寫下的這句話，一方面刻劃出日人的暴行統治，同時，也恰如其份地為山胞英勇的精神，做了翔實的記載。的確，「所有的戰士都已死去 / 只有殘存些婦女小兒 / 這天大的奇變 /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註：引自賴和先生為哀悼霧社事件而寫的詩作—南國哀歌）霧社原本是個風光明媚的和平鄉，宛如一世外桃源，當春天來臨時，滿山赭紅的櫻花映照於河水的倒影中，呈現一幅寧靜、祥和的景像，又為何會有人「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一開始，張深切將整個視野移向日本兒童欺負山地兒童上面。「日本兒童們跑步挺著槍找番童當野獸打獵」「番童大驚，狂奔逃走」，而後「番童們有的摔倒，有的中彈號哭——日本兒童拍掌大笑，高呼：『萬歲，我們打勝仗了！』」兒童們在政治鬥爭的行爲中，原本是無辜的犧牲者，他們莫名所以地被扯入成人的紛爭中，應該不至於有所謂欺壓的行動出現。然而，張氏却以這種方式鋪陳劇本的開頭，這無非是在說明，當統治者以專斷的行徑遂行無情掠取時，附帶在他們身邊的人、事，也會無形中跟隨著產生一種權威，這種權威演變成極端的結果，便是自視為支配者而蔑視受支配者的心理狀態。

會社巧取豪奪引發事端

「遍地紅」在展現山胞毅然決然投身抗暴行列，絲毫不顧生命危急的這個主題時，主要是以日人貪求美色和經濟上的榨取為重。劇中領導起義的馬赫社頭目——莫那道，是眾人公推的好領袖，他有著魁梧的身裁，高人一等的智慧。一日，當他獵得一隻大鹿，準備取鹿鞭到交易所換取臆想中的六瓶米酒，却無端遭到曲辱。

「——日本所員接過那鹿鞭看一看後，搖頭說：『不行，這是倒山鞭，只值得四瓶。』莫那憤然嚷道：『什麼倒山鞭，不對，這隻鹿是我親手打的，我這隻手！』（註：鹿鞭即鹿陽具，倒山鞭係指由死鹿取的陽具）他指示他的手，比一個挽弓姿勢給他看。」這無理的辱蔑，後來愈演愈烈，導致所員在惱羞成怒的狀況下，終於出手打了頭目一巴掌。這當然引起「衆頭目的勃然大怒，都拔出刀來」準備與日人廝殺一場。這一觸即發的械鬥風波，後來在日警攜出槍械來時，才告了一段落，却無形中埋下山胞仇日的種子。同為山地青年的「莎波昂然指着他的朋友華里斯說：『你幫我忙，我們幹吧，我們幹！一來可替祖宗報仇，二來可以報我們的私仇……』華里斯輕搖一下頭說：『他們有槍，我們那能抵敵他們呢？』莎波自暴自棄（按：應該是不顧死活較適當）的口吻道：『只要我們不怕死，什麼都幹得來。』華里斯取一塊燃燬的劈柴照一照莎波的臉兒。」

日人據台為發展壟斷資本，進而將龐大的官僚勢力滲透到各管理部門。在平地，製糖會社的剝削是造成多數農民流離失所的直接原因。賴和小說中「一桿稱仔」的主角人物秦得參是被會社逼得走投無路的最好例子。一九三二年，他所發表的「豐作」這篇小說，同樣描寫



● 整編演劇團體，投入侵略戰爭的「共犯結構」，是皇民化時期台灣新劇運動的特色之一。

了添福這樣一個蔗農，他甘做乖順的農民，獲取會社的信賴，希望能在採割時有合理的價格收入。未料，會社仍然一如往昔地在磅秤上動手腳，剋扣斤兩，添福在莫可奈何的情況下被擺弄股掌之間，非止生產數額屢被打折扣，連領取獎金的標準都達不到，其它諸多費用再扣除下來，已經所剩無幾了。會社的剝奪既是如此明目張膽，日人在處理交易事情時的豪取強奪，也就可見一斑了。在這種情形下，不消說是鹿鞭硬被污指為倒山鞭，更多的時候，還要被迫去執行苦役。然而，這終究是會引發不甘受辱的生命，置生死於度外，起而與統治者一拚的事端來。

——「莫那道走了一程，向眾頭目提議說：『我們做酋長的不應該服務勞役，他們太侮辱我們，拿我們當作牛馬，我決定以後不聽他們的命令了，你們的意見怎樣？』達特諾干緊握拳頭說：『對對！自明天起，我們不要再參加勞役！』大家都表示贊成。莫那道激昂地說：『我們先不幹，將來對一般的勞役也要反對的。』泰摩說：『他們太欺侮我們，這種強制勞役已經夠無理了，每天只給七分錢……』達那哈憤憤地嚷道：『七分錢？哼！他們光說，實在不給分文，每次說到房子蓋好了就一次給，現在房子蓋好幾個地方了，那裡給過一次？』莫那道愈說愈氣，強烈地說：『所以我們

非反對不可！』」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原住民

以自身的勞動換取的物質，却要在統治者強行取奪之餘，被剝削得面目全非。透過政治的高壓手段，更無所不用其極地吸食人民的血汗，強迫執行勞苦的差役。張深切在「遍地紅」裡為我們描繪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山地居民痛苦的面貌。其實，這便是處在異族統治下，當時所有台胞和原始住民共同的歷史遭遇罷！

「我們的婦女竟是消遣品 / 隨他們任意侮辱蹂躪 / 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 / 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 / 數一數我們所受的痛苦 / 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註：引自「南國哀歌」）除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造成山胞極度不滿日人的統治之外，「霧社事件」的發生，另與婦女飽受擺佈，有著不可漠視的關連。正如賴和在詩裡提到的，婦女在日人官僚的眼中，根本是草芥不如的「消遣品」。一位名喚迭華絲的少女，受著些許虛榮心的驅使，許身嫁給日警近藤，後終遭近藤遺棄，只好步上自殺的絕途。這看在山地青年的眼裡，自是一件淒涼無比的殘酷事件，個個都難忍胸中念憤，想一舉殺掉所有的日本官員。這件稍觸即發的武鬥，最後在多方勸服下算是稍稍平息下來。未料，名叫



岡田的日人，却又千方百計想娶莫那道之子巴瑟的愛人露碧為妻，這回眾頭目與全體山地青年一致決意，不再受日人的瞞騙，馬上讓巴瑟與露碧成婚。

婚禮盛大舉行時，日人意識到「馬赫社似有重大事要發生」於是商議「……現在最好還是先用懷柔政策，一面懷柔，一面離間，等到離間政策成功了，出其下意攻其不備，一舉把他幹掉，你想怎麼樣？」殖民統治者為了減少推行同化政策的阻力，儘速開發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通常都會在厲行鎮壓之前，先安撫歸順受統治者，這是殖民政策的一般法則。這次，日人警官也想以這種模式來瞞騙山地青年，然而，接二連三受辱的事例不斷發生，迭華絲這位純潔的山地姑娘，又因為忍受不了受遺棄之辱，上吊自殺身亡。這一切的一切都強烈地搖撼著憤怒的靈魂，「兄弟們到這樣時候／還有我們生的樂趣？／生的糧食儘管豐富／容得我們自由獵取？／已闢農場已築家室／容得我們耕種居住？」（註：引自「南國哀歌」）再也無法吞忍那銳利的鞭撻，像驅使牛、羊一般任意揮使。這種受踐踏的遭遇，簡直比狗都不如，想到這裡，他們誓意要和日本人一拚了。

「——莎波拍胸表示決意說：『你們漢人都怕死，我們不怕死了，隨時轉生，怕什麼？你說我們現在這樣吃苦還能再活下去嗎？所以我們寧願求死，不願求生！』」

在拒絕了漢人朋友朱辰同的善意阻止之後，衆多山地青年都贊成起來用身體、行動抗拒日人的暴行。也就在巴瑟驀地拔刀將吉村斬殺後，「他們見著了鮮血！他們的眼睛由驚愕變為猙獰而兇煞地轉動著」先是衝進警察宿舍，繼而議訂一路前往運動會會場，震驚人心的「霧社抗暴事件」，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英勇事蹟毫不遜於漢人

在日人據台的初期階段，台灣同胞也曾以血肉之軀直接和日人展開武力抗爭，由一八九四年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到一九一五年悲壯

的「西來庵事件」為止，一系列武裝抗日運動寫下了殖民地人民激昂抗爭的史頁。相對於當年犧牲最慘烈的「西來庵事件」而言，霧社山胞的英勇事蹟，非但未稍遜色，且在許多地方，遠比台胞的抵抗更威猛。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堅決抵抗之後，日據當局出動了軍隊，攜帶新型的武器，意圖一舉殲滅全部的山胞。這項行動却被熟識地形的山胞阻擋了下來，他們的鬥志相當高昂，也屢有捷訊傳回。日軍在一籌莫展的情勢下，只好搬出卑劣的手段，動用瓦斯彈，公然罔顧國際公法的規定。「我們還怕他們放什麼狗屁！況且我們現在正對美蘇英著著備戰，拿這些武器來這裡發市也很有意義的，將來我們在南洋大森林中作戰要用的武器都拿來這裡一試，豈不是一舉兩得麼？」就這樣，日軍派出隊伍整齊的飛機，高高穿過雲霄投下無情的瓦斯彈。當火焰冲天，燒夷彈焚燒著濃密的山林時，山地戰士們再也無法奮戰下去了。多數的戰士中毒身亡，殘餘的老弱婦女七、八人，男子二十餘人，被莫那頭目引領到河邊。

「——他走近他們的旁邊說：『你們都看到河流的上面吧，我要帶你們到永遠幸福的地方去，我們的祖宗都住在那裡，不許回頭，只許向前面看，聽我打槍，打三十三發，就算完畢，打完了才允許回頭，好了，看那邊吧！』」

「他轉回身走幾步，回頭舉槍打過來」

「打一發斃一個人俯伏下去」

「他繼續打，一發又一發」

長期在異族統治下的人民呻吟、困頓與背負苦難，固然是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主題；然而，隨伴這個主題擴散、延伸出去，却產生了



●張深切的重要劇作——霧社事件「遍地紅」，是以事件領導人莫那道（中）為劇情的主線。

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這是面對苦難激發出來的戰鬥意志。這意味著，台灣新文學除了敘述殖民地生靈的悲慘境遇之外，更積極提出抗議帝國主義侵略的嚴肅主張。所以賴和在他詩中說：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槍！
休怕他飛機、爆烈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
憑這一身，
憑這雙腕！」

而張深切也在劇本的終結時，透過和山胞共同奮戰的漢人朱辰同的一句話，來闡明他對抗議精神的看法：

「這次抗戰，不但對我高砂族有很大的貢獻，就是對台灣、對全世界也有相當大的貢獻。第一、能使他們不再藐視弱小民族無力。第二、使他們明瞭暴政的結果會激起民衆的反抗

，今後他們對台灣的政治也許會客氣一點，尤其對高砂族更不敢採取像以前那樣的暴虐的政治。第三、使全世界知道日本的實力不過如此，他們打不過我們，竟用慘無人道的毒瓦斯、燒夷彈等等，這些事實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了……」

揭露封建陋習的「落蔭」一劇

十九世紀以降，列強對中國的瓜分與侵略，為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的擴張勢力，提供了強取豪奪的機會。這股龐大的侵略行動，非但造成中國的動蕩，也為當時的台灣帶來極大的震撼。這當然也激起了中國同胞普遍反帝的情感，更觸動了有反省、檢討能力的知識青年的良知，他們深刻地投入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胎動中，清晰意識到重大的變遷即將來臨，在面對殖民主義的掠奪與榨取時，他們掀起反殖民壓迫的風潮。在檢視傳統思想、陳舊社會導致民族的落伍、衰敗時，他們以犀利的聲音，批判了封建殘餘勢力的種種陋習。

當然，在一個社會面臨新、舊轉型的階段，革新、進步的要求儘管極端迫切，由於舊有的、落後的秩序正逐漸解體，代之而起的嶄新秩序仍擺蕩在未定的時空座標中，社會的徬徨、人心的迷惘以及知識份子的苦悶，必然交互揉雜在大時代的氛圍中。這些現象現在文藝創作中，便造就了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特殊面貌。賴和作品「一桿秤仔」、「豐作」、楊遠的小說「送報伙」，如前節所述是和「遍地紅」一樣，透過對殖民地人民忍辱偷生的描寫，展現新文學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風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落蔭」一劇，則是張深切透過攻訐社會陰暗面，表達對百姓疾苦關懷的作品。它基本上，正與其它當時許多批判封建殘毒的文學創作一樣，反映了作家意圖重建嶄新的社會規範，一份對備受封建思想束縛、欺瞞的人民的關切。

守舊、落後的主張、行爲，對人民的社會



生活造成無與倫比的傷害，甚至，讓整個現實環境深陷難以自拔的深淵中。這種情形，賴和在他一篇「赴會」的散文遺稿中，有予人印象深刻的交待。「這些燒金客，在我的觀察是勞動者和種作的人，占了絕對多數，他們被風日所鍛鍊成的鉛褐色的皮膚，雖缺少脂肪分的光澤，却見得異常強韌而富有抵抗性，這是為人類服務的忠誠奴隸，支持社會的強固基礎。他們嗜盡現實生活的苦痛，仍不得不向無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虛的慰安，社會只有加重他們生活的擔負，使他們失望於現實；這樣想來，使我對社會生了極度厭惡痛恨咒詛的心情，同時加強了我這次赴會的勇氣」

賴和在這篇自述性的散文中，親身向我們訴說了一項發人深省的事實。那些容易趨向求神拜佛，對民間迷信抱持虔敬心情的人，大多數是掙扎於中、下階層社會的民衆，他們勤奮地為生活的重擔付出勞力，統治者却仍以殖民支配階級自居，屢屢露出猙獰的面貌，欲刮盡他們的血汗而後快。處在這樣悲慘的境況下，他們唯有迷信那虛無飄渺的神祇，視僵斃的木偶為慰藉創傷的利器了。如此，為了打破民衆心中虛妄的信仰，首先得打倒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賴和於是更加鼓起勇氣，一心願赴這為台灣同胞追求公義、平等的「文化協會」的會議了。

是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襟懷吧！賴和不忍蒼生百姓永遠背負守舊勢力的包袱，勁切的指陳了造成社會迷信的背後原因。同樣的，張深切在「落蔭」中雖未充分展現特權者無端剝削受壓迫者的經濟利益，導致孤苦、無告的生命依賴迷信自求安慰，這樣深具社會批判性的意涵來，但却明白地透露了祈求迷信者，原本也是在蔗田裡勞苦拚命，臉上還留著蔗葉刮痕的農婦。甚至，還在劇本的末尾，特別聲明「本劇的第一義，是藉著在新劇運動的道上，欲使其比較容易瞭解的編法；第二義，是曝露扛落蔭的秘密及破除迷信……」。

這是一齣一幕二場的短劇，時空定在一九三五年，台中州的一處鄉下。欲藉扛落蔭（即

招魂）與死去的生母見面的葉青薇，以焦急而帶羞態的模樣，前來求助進義招母魂。她由於生怕後母知道欲見生母之魂，喘着氣偷偷地走來，連忙由鞋中抽出數張鈔票給進義。在一旁觀望的農民茂生和棟材於是說話了。

茂生：講是十塊錢啦，今減做八塊啦，這八塊真便宜，是同情伊沒錢，真可憐噢，這八塊是伊去剝蔗葉粒粒積積的錢，你知影（即知道的台語）麼。

棟材：偷錢來扛落蔭，這也成拍拚（真賣力），是要扛去看什麼人，你老母麼？

貧困的農婦必然是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溫暖，才心生求助迷信，以獲取心靈安慰的想法。她心懷誠意想回陰間見老母一面，感慨地說：「我爹（與）我老母死去的時候的手指也提去當，先生我合你講，我剝蔗葉合給人做工賺的錢，合的是正有三塊半銀，剩的是當手指的錢，先生我是真有誠意……」

社會環境的封閉，教育措施的蔽陋，是封建主義危害人性的鮮明寫照。在這樣的狀況下，無知的善良百姓，唯一獲取保障的方式，便是祈求上蒼的庇佑了。畢竟，現實永遠像一張網罟吞噬人們幸福的可能。然而，類似青薇這樣的農村少女，當她希望藉迷信來求取寬慰時，一般的狀況便是愈為迷信所誤，在幾經催眠之後，竟然誤以為已經置身奈河橋，見到她的生母了。悲慟與哀苦一時湧上胸頭，尚來不及訴盡內心的酸楚，人已昏迷過去，這看在她後母的眼裡，當然妬恨交加，終至在一場拳打腳踢的凌虐下，結束了她悲苦的生命。

青薇是封建環境下的犧牲者，她的遭遇能



-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台灣文學進入灰暗的皇民化時期，也出現了皇民化示範劇團。

，讓觀眾理解並反省迷信在社會上造成的惡果。這齣戲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反映了當時社會卑微人物的困窘狀況，對現狀也提出了嚴峻的批判。

反帝反封建的戲劇精神

在漫長的五十年又四個月的殖民統治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始終以高壓和懷柔「雙管齊下」的手段，欲置島內人民於永遠受剝削、壓榨的境地，進而，化歸為帝國子民。

經濟政策方面，從金融資本到壟斷資本的形成，說明日帝意圖透過資本帝國主義的遂行，發展獨佔資本，搜刮經濟利益，完成殖民統治的經濟基礎。同時，藉由在殖民地市場、資源、勞動的掠奪，進一步強化總督府在台的政治威權。

日據當局既然有計劃地施行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統治策略，從武裝抗日到非武裝抗議運動，這段台胞英勇的鬥爭歷史，我們並不難看出：這民族解放的行動，恰是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為精神支柱。

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是非武裝抗日階段中，文化啓蒙工作的重要部份。因此，「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便具體而微地表現在文學作品中。詩、小說固然主調鮮明，戲劇也以此為傳達意念的重心。

從早年參與「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到日後從事劇運推展工作，張深切一直是一個以行動和文字抗議殖民體制的作家。以這個角度出發，將更能呈顯他文學乃至戲劇生涯的特色，至少就「遍地紅」和「落蔭」兩部作品所傳達的殖民體制下抗日作家「反帝」、「反封建」精神，是獨具風範和格調的。

以賴和「七星墜地歌」詩中的一段得到旁證。「癩哥廟祀觀音娘 / 廟前一井水湯湯 / 聽說一隻金蜘蛛 / 朝朝結網井中央 / 井水有靈能療病 / 癩人入此身轉強 / 今日井水尚沸泡 / 癩人市上猶徜徉。」在社會、政治氛圍仍停滯不前，甚而牢牢地桎梏著善良百姓愚昧的想法時，迷信便經常取代了理性的運作。一口井水能治人病，幾聲咒語能引人入陰間，還在目前或許不可思議，就那個舊社會秩序仍具有普遍影響力的年代中，却是司空見慣的事啊！賴和以嘲諷的口吻，指陳其弊端。同樣的，張深切也以近似鬧劇的手法，批判了這泯滅人性的現象。

從張氏在劇末附加的排演注意——「本劇致重在舞台效果，對舞台裝置和演員動作，須加以特別注意，才能喚起觀眾的興味」一段話，我們不難得知，作者亟欲透過這齣戲的演出

●日本殖民者開辦「公(日語)學校」推行奴化教育。



◎歷史◎

殖民地的語言傷痕 ■洪彰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汝呀，是清國奴！」

台灣的語言問題，實在是日本強硬實施日語教育（即同化—愚民化政策）過程中所引起的民衆抵抗，從而產生在語言上喪失祖國的問題。對於這問題，日本人本身應有所反省才是。

「陳有三很討厭被看成與他們（沒有教養、低級、骯髒的同胞）是同類。爲什麼呢？由以下之事，可瞧見一斑。偶爾有內地人問陳有三喊『汝呀！』時，他就表現出深鎖眉頭、面露不悅而不回話的樣子，而且他也時常穿著和服，常講日本話。我們可以從他身上看到他

充滿著理想、力爭上游，與他的同胞不同，有一種自我滿足的感覺。」

這是台灣作家龍瑛宗作品「植有木瓜樹的街上」中的一段^①。陳有三是在衆多應徵人員中，被錄取爲役場會計助理的台灣青年。他的前途充滿光明。可是，實際上的陳有三，只不過是月薪24日圓的下級雇員而已。他再怎麼努力工作、進修，絲毫也無法撼動殖民地統治的鐵則。龍瑛宗在「汝呀」這個稱呼上，解釋說：「雖然是『你』的意思，但本島人（台灣人）却有被侮蔑的感覺」。「汝呀」這句話，與「清國奴」是同義語。在台灣的日本人常在言談中夾雜這句話，無意識之中，深以位居統治者爲喜。

註①：「植有木瓜樹的街上」，係「改造」雜誌第9回小說懸賞佳作。作者龍瑛宗，新竹縣竹東人。

以日語教育推行皇民化

1895年中(清朝)日媾和,台灣割讓給日本,自此之後,到1945年10月陳儀軍隊來台接收的50年間,台灣一直淪於日人手中。日本統治台灣,常引以為榮的,不外乎經濟的開發與教育制度的確立,而教育制度確立的基礎就在於所謂的「皇民化」,日語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部份。1932(昭和8)年12月31日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出版的「台灣之教育」提到,以招收台灣子弟而創設的普通教育機關—「公學校」,和以招收日本內地人子弟為主的「小學校」,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每週國語(即日語)教學時數的差別。小學校第一學年每週10小時,公學校則為12小時;二、三、四年級都是12對14小時;五、六年級兩者時數相同,分別是9小時及10小時。做為本島人民族語言的中國語,一概受到忽視。當時雖也有兩個鐘點內的日式漢文選修科,但這是例外,只有兩三個州廳有這種課程。

1895(明治28)年5月2日,台灣總督府制定臨時條例,同日於民政局內設立學務部。自伊沢修二就任臨時學務部部長以來,直到日本戰敗為止,用日語進行同化的策略,一直是日本的一貫政策。這一套政策,不只沒有放鬆過,而且隨著戰局日趨激烈,敗跡日益顯露,反而更加強化。

軍國主義下的教育政策

樺山資紀被任命為台灣第一任總督時,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給他的台灣統治訓令中,關於教育方面,並沒有特別指令,僅言:「由治民部實施一切行政事務,及司掌教育技藝。」數語而已。然而,樺山在廣島大本營時,就接受了伊沢修二所呈的台灣教育意見。在那個時候,伊沢已主張應在台灣實施國家主義的教育。因此樺山就任總督時,自然會啓用伊沢修二。國府種武在〔日語教授實況〕中說:

「當時伊沢先生向樺山提議的詳細內容,如今已無法了解。然而大體而言,可以推測是當時已想用國(日)語教育來教育台灣本島人。說實在一點,甚至可以斷定伊沢先生的想法中除了國(日)語教育外,毫末考慮到其他的教育。」

伊沢修二在頒佈教育勅語之際,即認為不用國家主義來從事教育,是貽誤國家的危險思想。為了普及國家主義立場的教育,伊氏進而創立「國家教育社」,並被推舉為社長^②。這個事實,足以旁證前述引文的正確性。

同年7月12日,伊沢將學務部遷到士林附近的芝山巖,第一步即召集士林一帶(士林讀書人多,文化水準相當高)的讀書人,協同學務課員著手編纂普通用語、軍隊用語、商工用語與教員用語,內容分為單字篇及會話篇。隨後又催使第一期學堂學生柯秋潔等五人開始研究台灣話,「日本語教授書」及「新日本語集甲號」^③就是研究成果的結晶。當時日本人及本島人都推出人選謀求語言問題的解決。日語的教授係採對記法,亦即將意思相當於日語的台語併記一起,令學生死記。結果是,一般台灣人只會使用不太成熟的日本話。

另一方面,1895年10月劉永福逃亡廈門

註②:當時議決的組織章程,第一條即云:「應培養、發揚忠君愛國的精神。」

註③:編纂員擄取道明等6人,在翌年1月為抗日游擊隊所殺。當時大約出版一千部,其內容請詳見國府種武「日語教授實況」,頁32~37。

註④: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 ~ 1935),生於英國格拉斯哥,長老教會傳教士。自1877年起,即住在台南,經營小學及神學校。他是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廈門語的語言學家,頗同情劉永福等人的抗日,對日本採取批評的態度。

，日軍進駐台南後，伊沢在那裡會晤了英國傳教士巴克禮^④。當時，巴克禮跟伊沢提出忠告，並指出向台灣人實施日語教育的不當。巴克禮來台之初，對台灣人實行英語教育有過失敗的經驗，因此，他極力鼓勵英國宣教師實習台灣話，並且用台灣話傳教佈道。當時，台灣人以文盲居多，讀書人只占少數，讀書人是以文言音來讀書，一般民衆只會使用平常會話的白話音，因此，他了解使用漢字的困難，所以才會提倡使用教會羅馬字拼音的台灣話來傳教。

對於巴克禮的羅馬拼音教育以及不該使用日語教育的勸告，伊沢的想法如何呢？他說：「是否可實行日語教育，用二、三年來實驗，便知分曉！」。伊沢所抱持的教育路線，目的是想把台灣人同化成日本人，以利日本的殖民統治，加上懷有日本與台灣「同文同種」的荒謬偏見，促使他採用了以漢字為媒介來教授日語的錯誤方針。他的信念，原封不動地成為台灣總督府文教政策的基礎。日本據台二年後所創辦的總督府直轄學校，便冠上「國語學校」的名稱，很清楚地說明了此中的實情，若再看看明治到昭和年間幾度修正的公學校規則，也可清楚看到，其變化曲綫有逐年加強的趨勢^⑤。

大正8年所頒佈的「台灣教育令」中，「教育勅語」一視同仁地君臨於台灣人之上。大正11年4月1日頒佈的台灣教育令，雖然名為以撤廢日、台差別待遇為根本精神，然而其目的何在，却不言可喻。

從武裝抗日到組織性的鬭爭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基礎，是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尤其是在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的政策下鞏固起來的。後藤以「六·三法」為基礎，漸次頒佈法令剝奪台灣人民自由。再者，透過制定匪徒刑罰令、實施保甲條例與獎勵招降，終將抗日運動鎮壓下去。

1897年到1902年6年間，參加武裝抗日的民衆相當多，光從官方所發表的統計數目來看，戰死者即有7,500人，被捕者8,700人（其中3,000名被判死刑^⑥）。此後抗日運動仍然前仆後繼，如受義和團運動影響的林少貓一派的鬥爭；革命同盟會員羅福星等人所領導的苗栗事件；江定、羅俊與余清芳等人的西來庵事件等等，規模都很大。

然而到1910年代初期，武裝蜂起的大浪已告退潮。但隨著台灣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又逐漸掀起被殖民統治剝削的勞動農民的組織性鬥爭。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在世界民族運動的刺激下，台灣也創立了一些以文化界人士及學生為主的進步團體。1908年梁啓超訪台，林獻堂受其影響，於1913年向當局請願設立專門收容台灣子弟的私立中學。之後，板垣退助來台而有台灣同化會的產生；接著啓發會、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等先後在被鎮壓與解散下，仍然不屈服而繼續成立組織；大正14年（1925年）6月，簡吉在高雄鳳山領導的蔗農組合，宣告成立，是台灣的第一個農民組合。

一次大戰後，緊接著經濟大恐慌，資本開始走向集中化，台灣經濟亦遭受三井、三菱、藤山系等少數獨占資本所支配。各地不斷發生農民運動；穩健自由主義者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有逐漸左傾的傾向。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右派人士林獻堂、蔡培火及民族主義者蔣渭水等人退出該會，另組台灣民衆黨。

註⑤：姑舉幾條公學校規則以資參考。「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的前身）規則第一條云：「以教導國語為日常生活之資，與培養日本國家精神為主旨」。明治31年8月16日府令第78號公學校規則第一條：「公學校以向本島人施德政，授實學以培養國民之性格，同時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大正8年4月1日勅令第1號台灣教育勅語之旨趣，以培育忠良國民為本旨」。

註⑥：據向山寬夫，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史I》，「歷史評論」，1950年11月。



● 台灣人民把子女送進私塾學習中文，抵制「日語學校」。

信奉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蔣渭水，另又建立台灣工友總聯盟，指導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及台灣製糖安平工場的罷工。留在台灣文化協會之中的謝雪紅等人，則與蔡乾等人合作，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台灣人的文字被剝奪

然而，這些革命人士如何抵抗日語的教育呢？如前述，林獻堂起初便反對台灣總督府的

教育方針，而向當局請願設立專收台灣人的私立中學，但是不久在總督府的懷柔策略下改為公立學校。1917-18年以前，台灣人留學日本是受限制的，尤其禁止修習法律與政治，在種種艱難環境下，東京留學生仍先後成立了進步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民衆黨則要求當局實施學制改革，包括實施義務教育、公學校講課時日台語併用、公學校開漢文為必修科目及保障日、台教育機會均等。日共台灣民族支部則高舉「反對奴隸教育，全部教育費用由國庫負擔」

註⑦：蔡培火在板垣退助來台宣揚日台同化論時充任翻譯，爲了這件事，他被開除台南公學校訓導之職。林獻堂出學費鼓勵他前往東京留學，他在林氏的影響下身任新民會的副會長，接著在大正10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擔任領導者之一，因而違反「治安警察法」，被禁錮4個月。蔡氏在文化協會中身居常務理事要職，大正15年2月的第七回請願，簽署人數達2300名，昭和4年第十回請願則有1932名，並於昭和4年的第56次議會（山宣挺身奮鬥的最後一次議會）提出議會運動請願案，然以審議未完成而束之高閣。蔡培火後來立場轉向鼓吹頌揚神國日本的言論，思想墜落。此中情形可詳見岩波書局出版的「東亞子民如是想」。

的風俗習慣，體驗大和魂。如果能這樣，日本人就給予少許的平等權利。」

「然而，在其統治下的我輩島民，係可憐之民。我們不准擁有個性，我們的語言終而無用。——各位！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運命與未來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同化的美名下淪為機械或奴隸了。」

在公學校裡，有位日本老師向上課的七歲台灣兒童教「先生」一語時，在黑板寫著「先生」令學生朗讀，但老師並未用台灣話翻譯該字意義，而僅指著自己胸前告訴學生就是這個意思。孩子回家後，父親問他「今天學到什麼？」，孩子說「先生」，父親進而問「先生」是什麼意思？孩子回答說：「心啦」。這是伊沢修二等人所努力製作的國（日）語教授法的結晶！借用蔡培火的話，兒童「一旦步入校門，便馬上被迫變成同嬰兒一樣」的狀態。「六年之間，他們在家庭中所學到的語言與思想全被拋棄而僅有不能講話的口，不能分辨事務的雙耳，不得不接受教師的指導。」而被如此強迫記憶的國（日）語，除了極少數進入高級學校的富家子弟、官廳的工友及商店徒工等還使用之外，幾乎所有的人，在畢業走出校門後便成無用之物。此外，作為民族語言的台語教育又遭到壓制，「縱使在中等程度的學校有開課，然照例仍以國（日）語中心主義，反而演出更為可笑的悲劇」。強迫實施「基於一視同仁

之旨趣」的國（日）語教育，使得台灣人文字被剝奪，民族語產生了混亂，而出現了日語與台語都講不好的情況^⑧。

殖民統治者的種族歧視

不久之後，為了動員台灣人作為戰爭的消耗品，並使功能更加滑潤起見，殖民當局答應了台灣人的各種政治、文化與經濟要求，作為緩衝劑。1932年採用內台共婚制；1935年改革地方自治制度；1943年獎勵台灣人進出占領地區，並實施義務教育；1944年任命台灣人為帝國議會勅選議員；1945年廢止保甲制度。然而，在這些一連串的措施中，當局同時也於1936年恢復總督武官制；1937年禁止使用漢文，減少寺廟（但相對增加神社）數量、禁止上演中國戲劇；1938年大幅度增加特高警察的名額；1941年成立皇民奉公會；1942年實施改換日本姓名；1944年繼志願兵制度而實施徵兵制。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的語言生活。1941年，全島587萬人口中，大部份為台灣人，日本人數僅31萬，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總督府所在地的台北市，其次是高雄、基隆、台中、台南，人數依次漸減。他們絕大部份都住在各州的重要都市裡。從這個人口分佈，可知日本人幾乎佔據了殖民地的

註⑧：明治38年，從前述6人開始推動的日語教育，經過45年之後，台灣懂得日語的人口僅占53.9%。不過，實際情形，又不完全是那一回事。

註⑨：關於這個問題，邱永漢的「濁水溪」告訴了我們不少事。像「50年之間，日本人在政策上煞費苦心地割斷台灣人與大陸之間的關係，結果使我們只是將中國社會當成憧憬的對象罷了！」或者是「我已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我變成像永遠流浪於地球上的猶太人！」等語，可像一把匕首頓然穿戳了日本50年的同化政策。



- 「皇民化」企圖消滅台灣人民民族意識，永遠奴化台灣人民。

行政中心，而且輕易地位居於剝削台灣人的統治者。台灣人除了買辦資本家與地主之外，是不准接近權力系統的。若從台灣的中、高專、大學等學生人數來看，亦可知台灣人進入上級學校力爭上游，都受到阻礙。公學校畢業，進入中學時，由於國（日）語理解力的障礙，便先碰了一鼻子灰^⑨。縱使中學畢了業，社會之門也不為他們而開，因此只好選擇商、工職業學校，將自己嵌入日本人所大量需求的現場監工之類的下級職員的鑄模之中。這種傾向，很典型地表現在台灣人選擇學校時，大部份以專門學校為主，因此造成的結果是以業醫為志向的台灣人，大多為知識份子，因為業醫是獲得經濟獨立的唯一之途。

站在經濟、社會優勢地位的日本人，對於那些特別鑽狹門而進入小學、中學的台灣人，懷有輕蔑的看法。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常常成為被嘲笑的來源，尤其是講錯話時，特別引起日本人的嘲笑。來台定居的日本人，半數以上來自九州各縣，第一代過的是講九州腔國（日）語、遵守故鄉意識的生活，到了第二代則是講殖民地的標準語言，他們講著奇腔怪調的日本話。同時，在談話中，也無意識地交雜著受台灣人奇特日本話影響的特殊語彙。最初是「幹你娘」、「三八郎」、「垃圾鬼」等低級話

，其次是「好啦、好啦」、「我不知啊」等等……，這些話在日本人之間也使用（尤其是中小學生），不過大部份用來罵台灣人。龍瑛宗作品中所寫的「汝呀」是「汝」與日語「セ」的複合字。像這種非日非台、國籍不明的語言，在我們的周圍四處都可以聽到。

殖民同化政策扭曲了台灣人的意識

語言上所暴露出來的殖民地問題，對統治者的日本人來說並非傷痕而是優越感，也就是產生了「往昔美好日子」的南國樂土之美麗幻想，從而留下了台灣是日語通用的遠方異國之殘缺形像。

而被統治者的台灣人，在天皇一視同仁的名義下實施的同化政策裡，却因此潛伏著一種喪失祖國與白痴化的現象，同時走向了要求從蔣氏政權統治下解放，以及解放後並非回歸中國而是轉向「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條路上來。

這兩種傾向，一方面是統治者日本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被統治民族——中國內部的台灣問題。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正是這個心理背景導致了現今國際政局中日本政府的「兩個中國」觀，以及「台灣獨立這種扭曲的政治運動」^⑩。若一讀「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或「台灣獨立運動」的前領導者廖文毅的文章，就可聞到該運動與「台灣民眾黨」所標舉的口號，都具有相同的味道。這尤以教育層面特別強烈。在天皇制之下崩潰的台語羅馬字化運動，以更明確的形態死灰復燃，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日本對台灣人的錯誤認識，以及台灣人本身對台灣的錯誤認識，都是日語教育所萌生的不幸現象，我們不能不把這個歷史的不幸當做殖民地問題的傷痕認真地加以處理。

（譯自「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

註⑨：關於這個問題，請務必參考西野英禮的「中日關係上的台灣地區——殖民地傷痕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本質，「歷史評論」1961年1月號。本篇論文探討了日本人對台灣的心理糾結，及其與台灣問題基本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等問題。

◎世界思潮◎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導論(下)——

■陳宗文譯

■Anthony Brewer著

■古典馬克斯主義者認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首先取決於其內部結構，尤其取決於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性質。資本主義為了擴大佔有自然資源（礦物、土地等）及取得廉價勞動而擴張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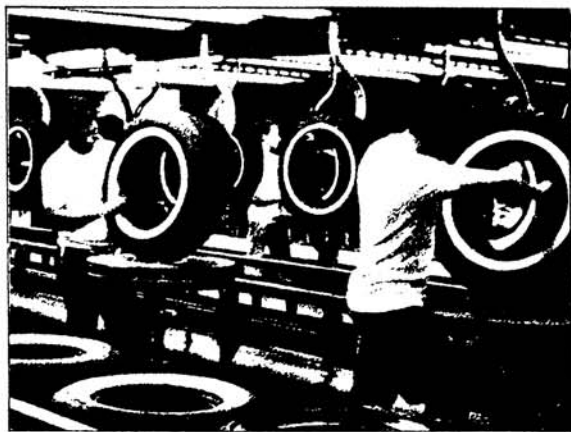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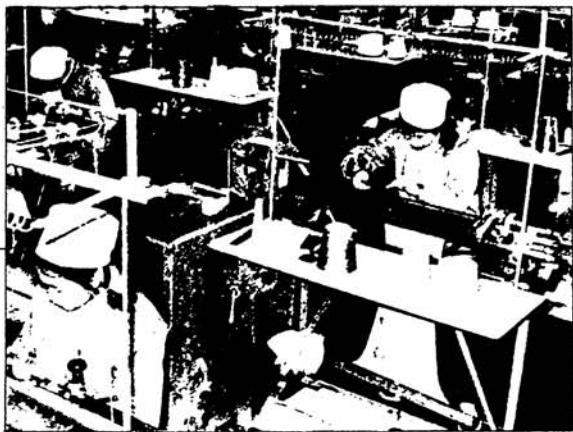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可以分為兩類。有些理論強調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中的進步作用，而與此相反，另一些理論則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類地區剝削另一類地區的制度，所以少數地區的發展是以世界大部分地區內“不發達”的發展為代價的。根據第一種觀點，資本主義為更好的社會（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並且創造了使這個社會實現的階級力量。根據第二種觀點，正好由於資本主義不能引起經濟發展，所以才必須革命。不過，歷史的記載證明，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都含有真理的因素：資本主義造成了大規模的技術和經濟進步，也造成了經濟發展方面巨大的地區性不平衡。

其中的第一種觀點大體上是從馬克思本人到列寧及其同時代的人的“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在最近幾年中，這種觀點有力地復活了。根據這種觀點，每一個國家的

發展首先取決於其內部結構，尤其取決於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性質。資本主義是相互競爭著的廠商僱傭自由的僱傭工人的制度，它導致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其他生產方式則不然。國外力量主要是靠改變生產組織來施加影響的。

資本之間的競爭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的核心。具有最新資本設備的最大的、最有效率的廠商是最盈利的，並且還能夠加強它們的領先地位，而比較弱小的廠商落在後面，最弱小的廠商由於破產或者被接管而被消滅。失敗的威脅迫使所有廠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並將利潤再投資於擴大再生產，迫使它們尋求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市場、新的供應來源，等等。與此相反，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剝削階級首先必須維護他們施加於生產者頭上的超經濟強制的基礎。結果形成由習慣勢力所統治的相對靜止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潛在的可供投資）剩餘重新回到非生產渠道中去。

資本主義的擴張不斷地擴大對自然資源（礦物、土地等）的需求，這是資本主義領土擴張的一個動機。即使需求是靜止的，運輸工具的發展連同對廉價貨品的追求，也會將新的地區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資本積累本身也趨向於擴大勞動力的需求，但節省勞動的方法的



● 尋求廉價勞動是資本主義不斷向外擴張的動機之一

採用，又會把這種趨向抵消。尋求廉價勞動是領土擴張的另外一種動機。

非常粗略地說，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資本主義最初在少數中心出現，並在那裏造成了資本積累和發展，開創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領先地位，而且不一定從那裏取得代價（儘管資本總是取走它所能得到的任何東西）。資本主義開始擴展，使其他地區也開始了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把世界不同地區非常粗略地看作同一競賽中的賽跑者，其中一些人起跑得比其他人早一些。一個人靠犧牲其他人所得到的優勢都是偶然的。

地區資本主義發展失敗的反應，另外一種觀點得到了發展，其著名的代表是法蘭克和華勒斯坦，這種觀念認為，一定要以世界體系為單位進行分析，其中不同區域和民族國家都是組成部分。資本主義的特點不是階級之間的特殊關係，而是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為利潤而進行的生產，以及一些地區對另一些地區的剝削。中心區或核心通過直接榨取利潤或貢賦，通過不等價交換或者對貿易的壟斷性控制，剝削衛星區或外圍。中心區的國家機器在剝削中起了關鍵作用。在外圍，出現了這樣一些統治階級，他們之所以處於這個地位是由於他們在剝削制度中具有中間人的職能，因此他們關心維護這種制度，也關心維護作為其基礎的生產形式。不發達並不是一種本來落後的狀態，而是把一種特定的專業化和剝削形式強加於外圍地區的結果。

在這種世界體系中，可能採取不同的勞動控制形式，比如，強制性勞動、僱傭勞動、奴隸制等等。不同國家的階級結構和生產中特定的剝削形式只是有關地區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後果，而不是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如同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所分析的那樣）。

簡單說來，按照這種方法，資本積累沒有被看作是生產水平和生產方法方面發生真正的質量上的進步的前提，而是被看作是一個固定數量的再分配，即資源從被剝削的外圍向中心的轉移，一些地區的發展和另一些地區的“不

法蘭克和華勒斯坦認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一定要以世界體系為單位。資本主義的特點不是階級之間的特殊關係，而是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為利潤而進行的生產，以及一些地區對另一些地區的剝削。“中心區”通過直接榨取利潤及“不等價交換”或者對貿易的壟斷性控制剝削“衛星區”。不同“國家”的階級結構和生產中特定的剝削形式，只是有關地區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後果，而不是關鍵性的決定因素。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作為對世界許多



- 菲律賓的農民、漢城貧民區及高雄的拆船工人——不發達不是本來落後的狀態，而是把一種特定的專業化、和剝削形式強加於邊陲地區的結果

發達的發展”，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這兩種觀點對歷史的看法也很不一致。古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開始在少數幾個地區出現，然後在資本國際化的過程中擴大到全世界，而且它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連續的階段，其中主要的轉折點是產業革命和大規模資本（不是商品）輸出開始的時期（一九〇〇年前後）。與此相對照，法蘭克和華勒斯坦認為，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時期從十六世紀起就開始了，而且從那時以來這個體系一直持續地存在到現在，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古典馬克思主義者在動態中考察資本主義，而他們的對手則把資本主義看作基本靜止的剝削體系。

儘管這兩種觀點之間確實存在著矛盾，但不應當過分強調。世界經濟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其中，生產關係和剝削關係既存在於“國家”內部，也存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不管我們認為不發達是受國外影響（它也決定著某種階級結構和生產組織）的結果，還是認為不發達起因於某種階級結構的生產組織（它可能部分或全部是國外影響的結果），都是無關緊要的。當我們的分析更深入的時候，許多理論都突破了這種簡單的分類法，總之，我認為這是初步整理材料的有用的方法。

根據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對“不發達”這個術語的定義也是不一致的。古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發達是落後、早期發展階段的同義詞。另一方面，法蘭克及其追隨者認為，一個孤立的國家不能稱為不發達，不發達的定義是：以從屬的地位被合併到世界體系中去。無論採用哪一種定義，要把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歸於那一類中都不會有什麼疑義（儘管如果把加拿大列入不發達國家，會有些猶豫不決）。所以這一般不會導致混亂。我將以描述的方式來使用這個術語：不發達國家是表現出上述第二節中所闡述的不發達的一般結構特徵的國家。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擴張的描述，認為競爭的壓力導致擴

張，以便擴大世界市場，尋找原料和廉價勞動。

雷 (P.P. Rey) 則認為，不根本改變生產方式，商品交換仍然可以進行，所以是否被納入世界市場並非關鍵。要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以暴力入侵和強迫施行“殖民”生產方式。

馬克思在其主要理論著作裏集中論述封閉的和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他以不太正規的形式分析了在一個單獨的民族國家中資本主義的起源與擴張。他的理論對於帝國主義理論的重要意義主要在於他建立了一個基本的分析結構，使其他作家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揮。馬克思在論述印度的一系列文章中清楚地表明，英國的統治，不管如何野蠻，由於為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因而最終起了進步作用。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向其周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擴張的描述。她對這種擴張提出兩種解釋。第一，資本主義經濟被迫忍受著經常性的“實現”問題，即銷售為出賣而生產的產品，因此必須到國外去尋找市場。在帝國主義發展史上，這種思想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我將稱這種理論為“消費不足論”（儘管盧森堡的觀點不完全適合於這個術語）。

我認為“消費不足論”是錯誤的。然而，盧森堡還提出，競爭的壓力導致擴張，以便尋求原料和廉價勞動，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無論在哪種情形下，簡單的市場競爭不可能滲透前資本主義的“自然”（非市場的）經濟，那裏沒有可爭奪的市場，因此必須用強力打開。

最近，雷 (P. P. Rey) 發展了這種思想，他更深入地論述了所涉及到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及其同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結合”）。他認為，不根本改變生產方式，（有些種類的）商品交換仍然可以進行，所以，

被併入世界市場不一定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確立需要以暴力入侵和強迫施行“殖民”生產方式。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紮住根”，這種關係便可以在當地國家的保護下主要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和擴張。但是即使在這種“新殖民”階段，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妨碍著發展，這是不發達地區發展緩慢的原因。

從馬克思時代以來，經濟生活中的主要變化是壟斷的發展，這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見。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寧都強調：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壟斷的形成，以及民族資本集團之間在世界範圍的競爭的激烈化；他們也預見到資本主義在世界落後地區的加速發展。

希法亭 (R. Hilferding)，布哈林 (N. Bukharin) 和列寧是我稱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幾位主要作家（因為馬克思沒有像他們那樣研究“帝國主義”本身），他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和大戰期間寫作的。從馬克思時代以來，經濟生活中的主要變化是壟斷的發展。這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競爭過程不斷地淘汰弱小的廠商，勢必導致壟斷的趨勢。然而對這種發展的結果仍然要進行分析。同時，在主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出現了對殖民地的爭奪和緊張的對抗。這三位作者都強調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壟斷的形成，以及民族資本集團之間在世界範圍的競爭的激化。同時他們預見到資本主義在世界落後地區的加速發展。

希法亭的主要貢獻是金融資本概念，金融資本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融合成為巨大的相互聯繫的集團的產物。這些集團仍然在相互競爭，但不是採取削價的辦法，而是利用國家支持，通過金融和政治手段控制整個工業部門。

希法亭提出了關於帝國主義內部對抗理論中的大部分要素，但他的重點在於單一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發展。

布哈林改造了希法亭的分析，把它放到世界經濟的整體中，其中有兩種傾向在發生作用。一種是壟斷的和金融資本集團形成的傾向，另一種是資本主義在地域上加速領土擴張以及一體化為單一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傾向。由於金融資本集團與國家的聯繫，它們是在國家基礎上形成的。這樣，競爭就成為「國家的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競爭，而競爭鬥爭中的手段則是吞併和戰爭。布哈林理論中的有一點應當加以說明，他認為，由於利潤率下降的傾向（這是馬克思的理論），發達的中心區的利潤率必低於落後地區，從而促使資本外流和不發達地區的發展。這是帝國主義理論中反覆出現的一種說法，然而，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在布哈林的全部理論中似乎並不重要。

列寧論述帝國主義的小冊子在很多方面追隨了布哈林的看法。但他避開了主要的理論爭端。列寧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堅持認為應當把「帝國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即壟斷階段，而不應當看作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政策或者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方面。這個術語引起某種混亂，因為其他作家（按照英語日常用語）用這個術語具體表明統治和剝削的國際關係。在列寧的論述中引起混亂的另一個方面是他對資本輸出的原因所作的解釋不十分清楚，因為可以用利潤率下降或者消費不足論來解釋。總之，對列寧小冊子的尊敬超過了它所應得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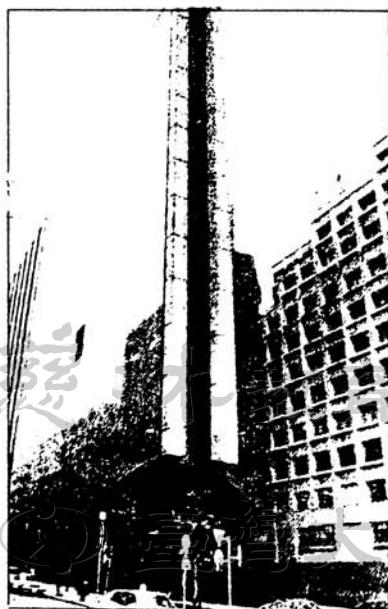
巴蘭（P. Baran）的著作代表著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發展理論的一個轉折點。從馬克思到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主要作家，都曾經預測整個不發達世界在適當時候會完成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種情況仍然沒有出現。巴蘭首先提出，不發達國家的命運顯然不同於那些早期經歷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

巴蘭認為：壟斷限制了產量和投資，導致了低成長。不論在發達或不發達的國家裡，壟斷都將資本主義由發展的力量變成停滯的原因。

艾曼紐爾的「不平等交換理論」開了一條獨有的新思路，他也把資本主義看作通過貿易進行剝削的世界體系，但是，他也提出了剩餘可以通過競爭性的市場貿易（不是壟斷性貿易）得到轉移的機制。

他的主要論述是與壟斷的影響有關，他認為，壟斷限制了產量和投資，因而導致了低增長（在世界所有地區）。在發達國家裏，產量很高，但高額壟斷利潤壓低了工人的消費，使需求長期不足，這個問題（部分地）可以用浪費，尤其通過軍費開支來解決。在不發達國家裏，「剩餘」的一部分被統治階級的奢侈品開支所吸收，但是大部分都被轉移到發達國家（作為利潤），在那裏它加深了吸收不斷增長的剩餘問題。因此，不論在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國家裏，壟斷都將資本主義由發展的力量變成停滯的原因。然而在不發達的國家裏，因為沒有經過競爭階段，它們被「凍結」在生產發展的低水平上。

法蘭克（A. G. Frank）是目前爭論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追隨者很多，甚至他的對手也默認了他的許多觀點，而拉克勞等人對他的著作的批判使理論上有了重大發展。我將指出，雖然他的理論存在著致命的弱點，但是他在迫使馬克思主義者正視不發達問題（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已經闡述過法蘭克關於資本主義作為壟斷性貿易和剝削的世界體系的概念。對這種看法的主要批評是：它忽視了生產關係在決定這個體系的動態和階級結構中所起的作用。



●美國華爾街、日本產業銀行及台北花旗銀行——金融資本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融合而成的巨大集團

有解釋作為其論述基礎的貿易型式。我將在論述法蘭克和華勒斯坦的同時論述“依附論者”。

艾曼紐爾 (A. Emmanuel) 似乎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發展的主綫以外；他的“不平等交換”理論開闢了一種它所獨有的新的思路。他也把資本主義看作通過貿易進行剝削的世界體系，但是，他提出了剩餘可以通過競爭性市場的貿易（而不是通過壟斷性貿易）得到轉移的機制。馬克思關於封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建立單一的平均利潤和一套相應的“生產價值”。在艾曼紐爾提出世界經濟中生產價格決定的理論以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經濟理論沒有分析生產和交換之間相應的聯繫。其主要的假定是：資本可以在國際上流動，而勞動力則不然。我對他的分析的主要批評是：一些關鍵性的變數（專業化型式、生產率、工資）仍然沒有得到恰當的解釋。艾曼紐爾對世界經濟理論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只是他為他的理論要求得太多了。

阿敏 (S. Amin) 把對國際交換的正常分析納入對世界範圍內積累的論述中。他認為，已經發達的資本主義對不發達的或者前資本主義地區施加影響，把一種限制進一步發展的專業化型式強加在他們頭上。他的論述與巴蘭、“依附論者”和艾曼紐爾有許多共同之處。然而他直率地討論“不平等的專業化”，回答了對他們的著作提出的許多異議（這些異議我已經提出）。但是在他的理論中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弱點。不同地區生產率發展的決定因素仍然不清楚。我認為，他對待需求所持的“消費不足論者”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還有一些就更加專門的問題展開的爭論，這些爭論一般是圍繞著法蘭克——華勒斯坦觀點和新近復活的古典馬克思主義觀點之間的分歧進行的。爭論的一個主要領域是關於生產方式的概念及其在當時不發達國家的應用。這個問題的中心論點是：不發達國家的內部機構是否可以概括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持續存在，如果這樣說是可以的話，那麼這是這些國

家落後的原因還是結果呢？爭論的第二個領域涉及各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地位的趨向。戰後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傾向於假定：美國將保持或擴大它作為主要帝國主義強國的統治地位，而不發達國家只要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便不可避免地變得相對的貧困（如果有絕對的貧困的話）並更加徹底的處於從屬地位。資本主義被看做一種穩定的、自我加强的不平等的世界體系，目前對這種觀點進行挑戰的是復活的列寧——布哈林預言，即認為相互平衡的帝國主義中心會相互對抗，而同時不發達世界的資本主義會得到發展。

總而言之，我認為，本文所考察的著作提供了構成關於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發展的系統理論的大部分材料，但這種理論還有待於詳盡闡述。下面是我對這種理論可能採取的形式的設想。這祇是一種嘗試性的大綱，如果再進一步發揮就會超出本書的範圍。

人們預期在發展中將會出現新的兩極分化以及清除弱小的競爭對手。所以，並不能推論，第三世界能夠實現完全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同時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由此產生的失業，則降低了工資水平。前景是各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伴隨著工人階級的貧困。

「重商」時期的特點是：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是非常鬆散的，因此世界不同地區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每一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那時，運輸費用很高，遠距離的貿易主要要經營奢侈品，而且資本和技術都相對穩定。歐洲向前發展了，因為歐洲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的。在其他地方，歐洲軍事強國發生影響的主要途徑是改變生產方式，或者建立新的前資本主義方式（如在拉丁美洲），或者為將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開闢場所（如在北美洲）。

十九世紀是一個轉折時期。正在興起的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仍然是非常鬆散的，而且在那些國內條件成熟並且國家樂意給予堅決支持的地方，仍然可能出現新的中心。同時歐洲和北美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打破了商業壟斷，降低了運輸費用，發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發達的工業中心具有巨大的優勢，因為生產率水平正在提高，而工資仍維持在相對的低水平上。結果，它們在工業生產的所有主要的行業中具有壓倒一切的成本優勢，而相對落後的地區被限於與自然資源有關的活動。比較發達地區的優勢是不會輕易轉移的，因為技術主要掌握在工人手裡，而資本有流向資本集中的地區的趨勢。對專業服務和供應網的需要具有類似的效果。這些「外在經濟」在競爭性資本主義時代是特別重要的。在這個很長的時期裡，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有使其他地區不發達的傾向，但是外圍的「不發達的發展」對中心的發展有多大貢獻，這一點並不清楚。

然而，壟斷資本傾向於接管局外的供應廠商並且整理技術，使之規範化，從而將這些局外經濟「內部化」。現代跨國公司能將較低的追加成本將技術轉移到新的場所。同時，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正在上升，這樣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業中心的成本優勢在這兩方面都下降了，目前明確存在著生產向不發達國家的低工資地區轉移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要遍布全部工業部門，還需經過很長時間。

由此並不能推論，整個第三世界能夠實現完全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因為人們預期在發展中會出現新的兩極分化以及對弱小的競爭對手的清除。同樣，新的發展中地區的人民大眾在長期內可能不會得到很多利益。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法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由此產生的失業，則降低了工資水平。前景是各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伴隨著工人階級的貧困——很像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之前所預言的那樣。

◎文 藝◎

■高準

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 (下)

(三) 寥寥

《傳略》

寥寥的《我們無罪》，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五月號《詩刊》上。據詩中所述，他大概生於一九五〇年左右，在「文革」時是紅衛兵的一員，他這名字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似乎沒有在其他地方再出現過，也沒有與他年齡相仿的那些「崛起的詩群」相連繫，也許是偶爾「客串」的寫了一首而已。但這詩却有其一定的代表性意義。

《詩選》

我們無罪

我們這一代青年
（怎麼劃分呢？）
從二十歲到三十歲吧
真可憐。

畸形和變態嗎？

請原諒

十年前

還是兒童和少年的

我們自己

鑽過了林彪、「四人幫」的絞肉機

至今

身上還留着

恥辱的傷痕。

當魔鬼

還戴着面紗的時候
我們受騙了
在受騙中
我們詛咒
可是失去了的是
我們的熱情
理想
和誠實的童貞。

我們把幻想
從心中拋棄
像是舊日的孤兒院
扔出死嬰。

我們耕田、種地、做工

罵街和起哄

無論什麼時候

從臉到心

永遠冰冷

就連戀愛

也帶着猜疑和驚恐

怕無意露出心中的哀怨

怕被對方

告密

心像海岸的礁石

陰暗而沉重。

我們的

兄弟姊妹中

凡是敢於吶喊的

都被腥穢的手

扭進地獄

那帶鹹味的

不是海水啊

那雙手上滴嗒着的

是青年的血

這血的味道
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為什麼？
要喝那劣等的酒
臉像白痴一樣麻木
那隱藏在心靈深處
「真」、「善」、「美」的琴弦
一根一根
被撥斷
在刑車從眼前駛過時
在那腥風血雨中。

當堆集的書本
燃燒的時候
我們寧願自己
是文盲
對人間的文明
再也無所希求了
無論是嘴裡還是心裏
即使
還有衣服遮體
但在精神倉庫中
找不到一條
褲子。

他們把生活變革
對於我們
沒有溫暖
只有冰
我們對冰
毫無興趣
他們叫我們
為一根雞毛的代價
殺人致命
又使我們

為了一片蒜皮
被拉出去
匆匆槍斃。

面對世界
我們一無所有
是的
以往十年
三千六百五十天
動亂日子的唯一收穫
就是
不再相信明天。
把唾沫吐在我們身上吧
我們肩負着
整整十年的
社會垃圾。

是的
曾經有過
善良的歌聲
吹進我們的耳朵
如同長霧的胸中
燃起了一把大火
我們
被感動了
世故的眼睛中
流出了淚。

這淚不值一個小錢
但它
卻是我們付出的
最深的代價。

百年之後
給我們這一代人
立個碑吧！

請刻上下面的話：

「我們無罪
我們也憎厭
無為的身體」。

將來的人們啊
當你們咒罵
我們留下的
一無所有的遺產之時
我們也在另一個世界
同聲詛咒
和你們一樣
我們也厭棄走過的
邪路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
在將來
唯一可以稱道的
血和淚的
虛榮。

尾聲

十年來
我一直想要有一支槍
用它殺死那些
扼殺了青年靈魂的「人」
現在我仍想要一支槍
用它打碎攫住我們不放的
十年來的
陰影。

(選自《詩刊》一九七九年五月號)

《作品簡說》

這詩是寫曾經做過「紅衛兵」，充當過殘殺破壞的工具的青年對那文革十年動亂期間所為、所見、所感的生動回憶。是「懺悔錄」，也是「辯白書

」。它寫的不是此詩作者一個人的生命經歷，而正是代表着與此詩作者年齡相近的整整「這一代青年」。這一類青年，為數不下數千萬，當年人人頂着「最最革命」的旗號，到處「打、砸、搶」，批這鬥那，焚書坑儒，而後又慘烈的自相殘殺。然而，正如詩中所寫出的，他們無非是在無知中被一只巨大的魔掌所利用，以至既成了害人的工具，而自己也成了慘遭犧牲的受害者。

曾經當過「紅衛兵」的，大致基本上是生於一九四七——一九五一年間的青年，也就正是「崛起的詩群」中較年長的一半所屬的年齡組。然而那些「崛起的詩群」的詩人們好像個個都是純粹的受害者，紛紛寫下了他們的傷痕，却只有寥寥這詩坦然的寫出了他自己也參與的暴行與痛悔。即此一點，此詩就有了與眾不同的意義與歷史價值。

就詩而論，它雖然很長，却並不鬆散，語言仍當得上相當洗煉，結構也具有高潮迭起的戲劇感。而以白描的手法，却活生生的勾畫出了驚心動魄的暴行慘況與血淚的斑痕，不能說不是一首動人的作品。

(三) 舒婷



《傳略》

舒婷（一九五二—）本名龔佩瑜，福建泉州（晉江）人。大陸從一九五〇年以後，幾乎找不到女詩人，到七九年起的「崛起的詩群」這一代，才終於出現了幾個，舒婷是其中最受矚目的佼佼者。

舒婷生於廈門，一九五七年五歲時，父親被打成右派，送往山區勞改。隨後，母親因生活所迫而改嫁離去。她由姨媽收養。她從小學三年級起，就把全付精神放在閱讀課外書上。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她正讀初中，次年畢業，無學可升。

一九六九年，被分配到閩西上杭的一個小山村插隊落戶，在農村三年，流浪一個又一個山村，目睹了中國農村的貧困落後。一九七一年開始練習寫作。七二年底，獲照顧回城，做臨時工，當過爐前工與泥水匠。一九七五年，安排到織布廠作學徒，當染紗工和擋車工。這時開始努力寫詩。一九七七年，調到燈泡廠作工人。這時還沒有任何人知道她。

到一九七九年四月，巖辰主編的《詩刊》上刊出她的《致橡樹》一詩，立刻受到注目，同年，又續在《詩刊》發表《這也是一切》與《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等詩，均受重視，後者於一九八一年獲列為「1979—1980 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得獎作品。八一年起，她也獲調到福建省文聯工作。一九八二年，出版了詩集《雙桅船》，同年，又有《舒婷·顧城詩選》出版。

《詩選》

這也是一切

——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不是一切大樹
都被暴風折斷
不是一切種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裡；
不是一切夢想
都甘願被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說的那樣！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燒自己
而不把別人點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僅指示黑暗
而不報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聲
都掠過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說的那樣！

不是一切呼籲都沒有回響；
不是一切損失都無法補償；
不是一切深淵都是滅亡；
不是一切滅亡都覆蓋在弱者頭上；
不是一切心靈
都可以踩在腳下，爛在泥裡；
不是一切後果
都是眼淚血印，而不展現歡容。

一切的現在的都孕育着未來，
未來的一切都生長於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為它鬥爭，
請把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1977.5.25

(選自《詩刊》一九七九年七月號)

《作品簡說》

舒婷的出現，以及與她差不多同時登上詩壇的其他青年女詩人如傅天琳、李小雨、王小妮、才樹蓮（均一九八〇年開始登場）與馬麗華（一九八一年開始登場）等的紛紛出現，標誌着中國大陸政治空氣與社會空氣的進一步轉變。我在一九七四年寫的一篇文章裡曾指稱：「二十餘年來大陸中國的文化面貌，基本上是陽剛的、男性的；台灣的文化面貌則基本上是陰柔的、女性的。」這情況（從一九五〇年）直到七十年代末基本上仍是如此。陰柔到超過限度，就成為萎靡腐化；而陽剛到超過限度，則成為暴虐僵化。但約從一九七七年中起，兩邊已各自開始有了向反方向發展的苗緒。台灣從七七年夏天的「鄉土文學論戰」前後起，現實主義的、比較陽剛的、男性的風格開始抬頭；而大陸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宣告「文革」正式結束之後，也開始逐漸「解凍」，到七八年底至七九年初的「北京之春」發生後更加緊了腳步，而終於使比較柔和而溫婉的風格得到了茁長的機會。所以一方面儘管許多所謂「傷痕」文學與要求民主、變革的詩篇仍然發出着剛烈昂強的聲音，而較具溫柔本質的女詩人也開始紛紛脫穎而出，並且受到青年讀者群的歡迎。而所謂「朦朧詩」竟以「朦朧」為標誌而流行（其實很多都並不朦朧），也可說正是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針對「僵化」而產生的對於「柔化」的普遍心理需求。

舒婷的詩之所以廣受當前大陸讀者的喜愛，與其說是由於她煥發的才華，毋寧是由於她絕大部分作品中所包含的一種母性的柔情所給人的溫暖。就如這首《這也是一切》，雖然本是寫給一個「朋友」的，却使人感到正像一個母親在對她受到嚴重挫傷與委曲的孩子作着安慰與鼓舞般的親切而感動。儘管母親自己也遭受着災難，而她却更要首先撫慰她的孩子，為他裹血療傷，讓他能繼續在人生的道

路上奮鬥。一種溫柔的母性光輝不自覺的浸潤着全詩。

這詩是讀了北島的《一切》之後所寫的回應，北島的原詩作於一九七七年初，全詩如下：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烟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愛情都在心裡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一切希望都帶着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着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可以看到，舒婷這首《這也是一切》粗看下句句在反駁北島，而讀完後却令人感到句句是深切的安慰。舒婷在大陸的詩雜誌《詩探索》的一次「筆談會」中說：「人們常常把我的《這也是一切》和一位朋友的詩《一切》比較，給後者冠予『虛無主義』的『美稱』。我認為這起碼是不符合實際的。不用說那首詩寫在四人幫時代（按：應該是四人幫方打倒時），他總結了當時社會上一些令人髮指的畸形現象。就是現在，當我們讀到『一切交往都是初逢』，我們仍然會感到震動的。我笨拙地想補充他，結果就思想和藝術來講，都不如他的深刻、響亮而且有力。」（見《詩探索》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舒婷的態度是謙虛的，說北島的《一切》是「深刻、響亮而且有力」也不算過譽。但北島這《一切》正與他的《回答》一樣，整個氣氛是悲鬱憤激，而舒婷的這首却是在悲情中充盈着溫柔，在淚眼中寄托着敦厚，在苦難中燃點着希望的火花，而這正是博愛與人性的伸張。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完稿 於台北）

讀者來函

核三廠排水管含致命毒物

海峽編輯部：

在張國龍、洪田浚、黃立禾三位先生合編的「天火備忘錄」這本書中的一文：“核能政策的犧牲者”裡，提到當年（民國74年）三名台電核三廠工人的離奇死亡原因。就這一個問題，日本名古屋大學河田昌東先生在芝加哥大學台灣研究會的報告中提出：台灣方面認為三人死亡原因是因感染輻射過量，但經他的研究死因是TBTO（bis-Tribupylt Oxide）的中毒而死亡。主要是三人的共同死亡症狀：腰部、手脚痠痛或發麻、頭暈現象（三位家屬的證言），清掃回家後一身有一股怪味（TBTO 具有一股強烈臭味）。

TBTO在日本又稱為海中的除草劑，日本漁業界常在漁網上塗上含有TBTO的塗料，主要是為了防止漁類、海草類、貝類的沾著，最廣泛的使用是養殖魚貝類業者，而核能電廠的排放出入水口管也普遍使用含TBTO塗料。日本近幾年因養殖魚出現“變形魚”而追查，進一步地證實是漁網上的塗料中毒而引起，也是最近環境廳的頭痛問題，今年二月已下令禁止使用。

TBTO對神經毒性強，體重60公斤的致死量是3.3 gram。

筆者希望台灣這一方面的專家學者能為這三名死者的死因做進一步的研究，更希望各界人士能支援三名家屬向台電要求人命的合理賠償。有關上述內容，如有讀者希望進一步資料或意見，歡迎大家來共同討論，地址如下：

日本名古屋市名古屋大學

工學部 吉村 功 氣付
名古屋大學 災害研究會

黃妮娜於7月29日名古屋

熱烈希望中國統一

敬啓者：

偶逛書局，信手翻閱，發現本刊內容與我的意念接近再看封面，才知是「海峽」雜誌，購回家後，從頭到尾，細細閱讀，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一本雜誌，我將每期詳閱。

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支持二黨政治，反對台灣獨立，我反對國民黨的隔離海峽兩岸的三不政策，也反對民進黨有台獨傾向的自決說詞。

我希望中國強大富足，大陸台灣合併統一。

我父親是一識字不多的工人，幼年從雲林落籍高雄，他沒多少學問，但却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據我所知，這種人非常多），我不知這種想法是如何進入他的觀念。他說，中國人都有統一的理念，這種理念早已深深的銘刻在每個人的遺傳因子裡面。所以我以及全家都有這種遺傳因子。

我熱烈的支持貴刊。

中國統一萬歲，萬萬歲

（請原諒，沒簽名，怕有政治麻煩）

期待《海峽》再接再厲

『海峽』一期比一期好，本人期待它再度發出『夏潮』的光芒，在此獻上最大敬意，請再接再厲，為台灣的命運再前進。

李榮善 1987, 8, 11